

# 东普鲁士与中国

## ——追溯一段不解之缘

托马斯·海贝勒 著

向开

刘靓 译

谨以此书

献给我祖籍萨尔茨堡，定居于东普鲁士的先辈们，

献给我的外祖父理查德·克莱茵

（1882-1949，生于东普鲁士斯塔卢波嫩县施特利什肯）

和

我的母亲弗兰西丝卡·奥蒂莉厄·海贝勒

（1908-2002，本姓克莱茵）

## 目录

第一章	为什么写这本书？
第二章	家族史：与东普鲁士的渊源
第三章	“历史故园”之旅
第四章	我的职业：通往中国之路
第一节	凯绥·珂勒惠支、作家鲁迅与中国艺术
第二节	青岛蜜月之旅：邂逅普鲁士-德意志遗迹
第五章	东普鲁士与中国：从普鲁士东亚政策到纳粹灾难
第一节	普鲁士的东亚政策与普鲁士东亚远征
第二节	“哲人国王”腓特烈大帝与中国
第三节	“义和团战争”与“黄祸”
第四节	陆军元帅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男爵：未来在中国
第五节	德国“保护区”青岛简史
第六节	东普鲁士需要劳动力：有关招募和安置中国人的争论
第七节	最早飞往中国的航线：东普鲁士对全球化的早期贡献
第八节	中国艺术与中国风：东普鲁士王宫，施洛比滕宫和宫内 中国藏品阁的结局
第九节	“记忆文化的伦理层面”：纳粹主义与东普鲁士犹太人 逃亡上海
第十节	朱敏事件与东普鲁士集中营
第六章	东普鲁士、汉学与传教活动：汉学领域与传教史上的记 忆形象
第一节	作为文化中间人的东普鲁士汉学家
第二节	来自东普鲁士的传教士及其在华影响

第七章	回忆文化与康德、赫尔德对中国的接受：中国与 中国形象
第一节	伊曼努尔·康德：“中国——世界上最明礼的帝国”
第二节	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中国，“涂着防腐香料的木乃伊”
第三节	记忆文化的矛盾：康德、赫尔德与欧洲人眼里的中国形象——理想化与妖魔化
第八章	东普鲁士与中国关系中丰富多样的记忆形象
第一节	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地球围绕太阳运行
第二节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和托马斯·曼在东普鲁士：文坛巨匠
第三节	尼达艺术家之村
第四节	融入中国接受记忆的东普鲁士作家
第五节	数学家克里斯蒂安·哥德巴赫（1690-1764）、大卫·希尔伯特（1862-1943）、赫尔曼·闵可夫斯基（1864-1909）和“柯尼斯堡桥问题”
第六节	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阿诺德·索末菲：量子物理学与相对论
第七节	阿瑟·齐默尔曼：被免职的外交官
第八节	汉娜·阿伦特（1906-1975）：伟大的政治哲学家
第九节	王安娜（1907-1990）：两个世界的生活
第十节	来自东普鲁士的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亚瑟·埃韦特与亚瑟·伊尔纳（别名理查德·施塔尔曼）
第十一节	来自东普鲁士的女政治家和作家利亚·拉宾
第十二节	建筑师福尔克温·玛格与中国现代城市建设
第十三节	雕塑家和装置艺术家胡拜图斯·凡·登·高兹在黄浦江畔

第十四节 现代欧洲神话的批判者：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奥斯卡·内格特

第十五节 演员、音乐家、画家和作家阿明·缪勒-斯塔尔

第十六节 来自蒂尔西特的电子（蓝调）摇滚音乐家们：埃德加·弗勒泽的“橘梦乐团”和约翰·凯（约阿希姆·弗里茨·克劳雷达特）的“荒原狼”乐队

第十七节 中国对东普鲁士接受认知的多极化

第十八节 东普鲁士商人和对华贸易

第十九节 苏联将军在东普鲁士和中国：中国人认知储备与东普鲁士、中国和俄罗斯回忆文化的一部分

第九章 结语：作为集体记忆组成部分的回忆与接受文化

关于作者

附录

## 第一章 为什么写这本书？

如果我作为研究中国的学者就东普鲁士与中国的关系撰文，绝不纯粹出于历史研究的学术兴趣，母亲家族与东普鲁士的渊源是我人生和身份的一部分，尽管我并不是在那里看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缕光亮。母亲对东普鲁士的记忆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强化了我对自己这一层身份的认同，下文对此还将详述。

家族记忆是记忆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一个家族里它以这样的形式世代传承，影响着族人们的世界观和个人行为。（因萨尔茨堡新教流亡者身份而）遭人排挤的体验，祖父为了认识更广阔的世界冲出东普鲁士村庄那一方局促天地的决然之举，还有东普鲁士人对东部（与其接壤各国）依然保有的真挚坦率等等，都是这份家族记忆和认知储备的一部分，只是这样的东普鲁士仅留存在某些人的记忆里，他们要么曾经与此有所关联或者尚有关联，要么在那里出生，又或是探究到其家族与东普鲁士之间的渊源。

德国前总统约阿希姆·高克 2016 年 9 月 3 日出席“被驱逐者联盟故土纪念日”活动时的一段演讲促使我动笔写这本书，他在讲话中呼吁：

“今天，我希望通过这些同祖籍地多方面的联系，重新将东部的前德语文化区更加深刻地烙进我们的民族记忆，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建筑、文学、哲学、音乐，乃至整个东部历史所影响的不仅仅是东部的那些地区，而是全德意志民族！在此，我们应该纪念伊曼纽尔·康德、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斐迪南·拉萨尔、埃里希·门德尔松、约瑟夫·封·艾兴多尔夫，还有古斯塔夫·弗赖塔格、赫尔曼·松德曼、恩斯特·魏舍特、韦尔勒·贝尔根戈林，以及戈埃尔克·德西奥和玛丽·冯·艾伯纳-艾辛巴赫。

我讲的这些概括起来就是：对传统的回忆、纪念和维护不应仅限于各团体内部，当年各德语区的历史和文化是属于全民族的集体记忆。”<sup>1</sup>

撰写此书是为了追忆这个曾经的德国东部省份以及当地人民为中德关系所作出的贡献，但同时这也是对德国乃至欧洲“集体记忆”的一次纪念。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对文化、艺术、科学、哲学、政治及经济各领域演进过程的回忆，都是记忆文化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它们被扬·阿斯曼称为具体的“记忆形象”，回忆与集体记忆正是固着于这些形象之上并受其引领，围绕它们又形成所谓文化记忆。<sup>2</sup>其中也包括“伦理记忆文化”，这里主要从牺牲者的视角关注事物，即对国家与社会罪行，例如对东普鲁士犹太人，这些为本地区乃至德国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公民的迫害、驱逐、流放和谋杀，进行批判性的研究。<sup>3</sup>回忆有助于整理往昔岁月，平复曾经的心灵创伤。<sup>4</sup>记忆文化则有利于群体与身份意识的创建。<sup>5</sup>

谈到中国，其国人集体记忆里基于本民族数千年繁衍形成的记忆文化和历史记忆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们赋予该群体一致的身份认同。这或许是一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何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人们似乎对曾经的东普鲁士表现出特别的关注，还会提出诸如来自当年东普鲁士地区的名人（比如康德，赫尔德等）究竟算是俄国人还是德国人，或者今天的德国人为什么不再对这一地区感兴趣这样的问题。对中国人而言，地域来源一直都扮演着

---

<sup>1</sup> 关键词：联邦总统/演讲/被驱逐者联盟故土纪念日，<http://www.bundespraesident.de/SharedDocs/Reden/DE/Joachim-Gauck/Reden/2016/09/160903-Tag-der-Heimat.html> (2019年11月9日查阅)。

<sup>2</sup> 阿莱达·阿斯曼，扬·阿斯曼：《文字、传统与文化》，收录于沃尔夫冈·莱博尔（主编）：《节日与日常生活之间——论“口头性与文本性”论文十篇》，1988年图宾根出版，第29-30页；扬·阿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出处同上；托尼奥·霍尔舍：《文化与记忆》，1988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12页。“集体记忆”、“记忆文化”与“记忆形象”的概念同样在中国学界引发讨论，参见陶东风：《从集体记忆到文化记忆》，2011年，[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348be01017dzi.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348be01017dzi.html) (2019年6月18日查阅)。

<sup>3</sup> 参见阿莱达·阿斯曼：《记忆文化的新痛楚——一轮干预》，2016年慕尼黑出版，第32页起。

<sup>4</sup> 阿莱达·阿斯曼(2016)：同上。

<sup>5</sup> 记忆文化在当年的东普鲁士各地，如鲁厄河畔温森地区的皮尔卡伦（施洛斯伯格）和斯塔卢波嫩（埃本罗德）的地方志陈列馆均有迹可循。

重要角色，来自同一区县、城市和省份的人之间常常会产生某种“温情”，那是一份亲近和信任，与现居地无关，主要是因为先祖有相同的籍贯。我夫人的父母是山东人，其父系家族传承至今的族谱可追溯至12世纪，一场瘟疫令当年居住地的大部分居民丧生，其先祖也因此由中国西北部省份山西迁徙至山东。当我打听此前的族谱何在时，夫人的一位堂兄回答说，有可能留在了祖籍地山西。又如，几年前我们去印度尼西亚旅行，途中遇到一位在当地定居的华人酒店老板，他对我们说自己来自中国南部省份广西某县，我们问他是否去过老家，他表示没有，其祖辈早在18世纪便已离乡移民到印尼，但即便是过去了这么久，他仍将远在广西的那座县城视为自己的原籍。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中国人在对外国名人的出身进行说明时通常都会提及其出生地，也正因如此，“东普鲁士”这一概念在中国是同那些具体的人物和地点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东普鲁士在许多中国人的接受认知<sup>6</sup>和接受记忆里的存在，而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里这个曾经的省份倒是已渐行渐远，甚至被忘却。一位中国学者的态度也印证了这一点：当我首次向她提及撰写此书的打算时，作为一位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她认为有必要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因为在中国会有对此抱有强烈兴趣的读者，而她所任职的高校也很快表示，这项翻译工作很有意义。

德国关于东普鲁士的记忆文化，书中出现的“记忆形象”以及中国与此相关的接受认知和接受记忆构成本书的内容框架。全书以东普鲁士与中国的深远关系为切入点，将笔者的个人经历与职业背景紧密结合在一起。有意思的是，在对历史痕迹的追寻中笔者的生活居然与各位主角也产生了令人意外的交汇与重合：在北京初闻凯绥·珂勒惠支；和美国蓝调摇滚歌手约翰·凯一样，都是美国摇滚歌星小理查德的粉丝，他的作品是我们音乐梦想的起点；在德中友好协会与王安娜和她第一任丈夫王炳南的合作；与出生在青岛的地理学家威廉·马扎特愉快友好的定期交流；女作家莉

---

<sup>6</sup> “接受”这个概念指的是对有关人物和事件信息，本文指的是对东普鲁士相关信息的接收与接纳。

塔·古金斯基的岳父，经济史学家尤尔根·古金斯基的著对于我整个学术生涯的价值；受阿明·缪勒-斯塔爾提携的中国钢琴家金麦克，他在北京的导师与我相识，而导师的姐姐也是我的至交好友；在我对彝族研究以及2006年在杜伊斯堡城市历史博物馆组织举办的彝族文化展中，汉学家米和伯（中文又名米松林——译者注）有关彝族的著述功不可没；还有哲学家、社会学家奥斯卡·内格特，早期我求学于法兰克福大学时便知他是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助手；最后要提到的是汉学家、史学家凯琳·托玛拉，我们之间也曾有过热切的交流，至今仍偶有合作。

我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杜伊斯堡与东普鲁士之间也一直存在某种特殊的关联。这座城市不仅是以“普鲁士”命名的历史社团所在地，1952年还在出生于柯尼斯堡的企业家赫尔穆特·比斯基的提议下，成为这座前东普鲁士首府的友好（帮扶）城市。上世纪50年代，杜伊斯堡的多所高级文理中学曾为原柯尼斯堡的学校提供对口支援，其中有兰德菲尔曼高级文理中学（我的一双子女都毕业于这所学校），1955年该校与当时的弗里德里希学校结成帮扶对子，而伊曼纽尔·康德正是这所学校最杰出的学生，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是这里最有名望的老师。1958年杜伊斯堡墨卡托高级文理中学也与当年的柯尼斯堡伯乐高级文理中学结对。

全书共分九章，导言之后的第二至第四章主要涉及以下内容：首先是作为家族记忆文化一部分的家族东普鲁士背景（埃本罗德与施洛斯伯格）和家族在东普鲁士的生活史；其次是我对2017年前往埃本罗德和施洛斯伯格（东普鲁士）的寻根之旅的一些思考；然后将讲述我的中国之路、我的职业和在中国最初接触到的那些与东普鲁士或普鲁士有关的人与事（周恩来、凯绥·珂勒惠支、当年德国的殖民地青岛）。第五章探讨的是东普鲁士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究竟是什么将它们联系了起来，这里将谈到普鲁士的亚洲政策、腓特烈大帝的中国情结、德国留在中国的“遗产”（亦或说德国镇压义和团运动及殖民青岛所犯下的“罪行”更为合适？）以及东

普鲁士王宫之内所谓“中国热”的意义。这一章还将特别关注纳粹主义带来的灾难，它迫使大量原本生活在东普鲁士的犹太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逃往上海，也导致中国传奇元帅朱德之女朱敏被拘禁于东普鲁士的一所集中营，这两个事件都是我前文所界定的“伦理记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六章主要讲述东普鲁士作为德国汉学发源地的问题和东普鲁士在华传教士的活动。对思想“先贤”康德和赫尔德及其与中国的渊源，以及他们对现代中国和中国形象的形成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本书也将专章论述（第七章）。最后在第八章将谈及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东普鲁士名人，包括自然科学家、作家、政治理论家、艺术家以及商人，他们当中有历史人物，但也不乏出生在东普鲁士，却并没有在那里成长的当代名人。本章提到的历史名人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尼古拉·哥白尼，数学家、物理学家克里斯蒂安·哥德巴赫，大卫·希尔伯特，赫尔曼·闵可夫斯基和阿诺德·索末菲，女版画家、雕塑家凯绥·珂勒惠支，女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女革命家王安娜，还有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共产国际代表亚瑟·埃韦特和亚瑟·伊尔纳（别名理查德·施塔尔曼）及其在中国的活动，以色列女政治家、作家利亚·拉宾，外交家阿瑟·齐默尔曼也在此列；当代名人则包括建筑师福尔克温·玛格，雕塑家、装置艺术家胡拜图斯·凡·登·高兹，电子音乐的先锋人物、“橘梦乐团”创始人埃德加·福乐斯以及美国传奇蓝调摇滚乐队“荒原狼”主唱约阿希姆·弗里茨·克劳雷达特（约翰·凯）等。出现在本书中的还有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和托马斯·曼的东普鲁士岁月，著名的尼达艺术家之村，以及多位在中国曾经或依然被关注研究（接受）的东普鲁士名人，他们当中有同中国有生意往来的商贾，也有二战中既在东普鲁士又在中国抗日战场参战的苏联元帅。部分苏联军队在东普鲁士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与其1945年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相似，这一切分别存留在德国和中国民众的集体记忆里，或许正是这些使许多中国人在面对东普鲁士平民的悲剧时多少有些感同身受。

总体而言，收录在本书中的东普鲁士人物与事件都是基于他（它）们同中国的关联，这里一方面关注东普鲁士其地其人同中国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也关注那些声名远播的东普鲁士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及其在中国受到的景仰。最后，本书还探讨了德国一些关于中国的历史性话题，如“黄祸论”，19世纪末东普鲁士的中国劳工移民事件等（第五章第三节和第六节）。所有这些“记忆形象”都是东普鲁士对华关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对东普鲁士接受记忆的一部分。

本书并不着力探究普鲁士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对此学者们已有著述，<sup>7</sup>这里更多关注的是与那个曾经属于德国，如今分属俄罗斯、波兰和立陶宛的省份，以及与此相关的记忆形象和他（它）们与中国的缘分，既包括与中国有联系的人物、中国问题学者、高级军官、外交官、传教士、建筑师，也包括出生在东普鲁士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诗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还有那些研究解读他们思想精神的中国人，以及当地犹太人逃亡中国的历史等。本书无意全面探究所有这些联系，对笔者而言关键是对这些记忆形象的收录整理，不拘泥于细节，本来写作初衷就是以勾勒轮廓框架为先，勘明趋势与特征，并非还原事件经过。全书内容嵌在传记式的家族记忆框架里，读者可由此窥探笔者同中国、同东普鲁士之间的渊源，进而了解在探究这一主题过程中笔者的个人追求、兴趣和希冀，这些传记性内容见于本书第二章，第三章则是在此框架下对“故乡”概念的简短反思——探讨究竟何为“故乡”。总之，撰写这本书是一次尝试，尝试记录东普鲁士乃至德国的一段历史，一段至今仍未受到足够重视，未足够曝光的历史，寄望以这种方式去丰富东普鲁士的记忆文化。

读过本书，人们会发现东普鲁士绝非过去惯常认为的那样，是“落后”或者说“土里土气”的，相反那里曾孕育出一大批胸怀世界、勇于创新

---

<sup>7</sup> 参见本恩特·艾伯斯坦：《普鲁士与中国——一段艰难的关系史》，2007年柏林出版；罗梅君，史通文，徐凯（音）等：《普鲁士、德国与中国——发展脉络与参与者（1842-1911）》，载于《柏林中国研究》第53期，2014年柏林出版。

、学识渊博、受人景仰的伟人，其首府柯尼斯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自由民主之城，是开放之风和开明资产阶级的象征。无论是 19 世纪普鲁士的一次次改革，还是 1848 年的民主运动都由此发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亦称保罗教堂议会）首位议长、德意志第一部宪法之父爱德华·冯·西蒙就出生在柯尼斯堡的一个犹太家庭。<sup>8</sup>长长的“柯尼斯堡名人录”昭告世人，柯尼斯堡这座 1938 年仅 37.2 万人口的城市孕育了多少活跃在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及艺术家、作家、作曲家、政治家和高级军事将领（其中也不乏纳粹国防军和党卫军将领）。<sup>9</sup>

东普鲁士不仅是普鲁士王国的发源地，整个王国还承袭其“普鲁士”之名。在王国内东普鲁士地位卓然，概因勃兰登堡马克伯爵（亦称勃兰登堡藩侯）虽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却非公爵或国王，而且东普鲁士公国不在帝国管辖之下，所以出生于柯尼斯堡的普鲁士公爵、选帝侯腓特烈三世 1701 年得以在柯尼斯堡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同时仍保有是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对身份。<sup>10</sup>

东普鲁士在其历史上既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移民国家。条顿骑士团（亦称德意志骑士团）东征前，西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生活着古普鲁士人。在骑士团间或野蛮的殖民过程中，来自德意志帝国的拓荒者不断涌入，此外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瑞士人、波兰人、俄罗斯人、捷克人、法国人和受洗的立陶宛人，他们与当地原住民聚居融合，14 世纪又有不少马祖里人、立陶宛人和鲁提尼人迁居于此。随着 15 世纪条顿骑士团历经一系列损失惨重的战役走向没落，来自波兰、俄国和立陶宛的移民在此安家落户。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欧洲第一个新教国家普鲁士公国建立，更广泛

---

<sup>8</sup> 参见尤尔根·曼泰：《柯尼斯堡——世界公民共和国史》，2005 年慕尼黑、维也纳联合出版。

<sup>9</sup>

[https://de.wikipedia.org/wiki/Liste\\_von\\_S%C3%B6hnen\\_und\\_T%C3%B6chtern\\_der\\_Stadt\\_K%C3%B6nigsberg](https://de.wikipedia.org/wiki/Liste_von_S%C3%B6hnen_und_T%C3%B6chtern_der_Stadt_K%C3%B6nigsberg)（2019 年 4 月 13 日查阅）；

亦见 <https://www.ostpreussen.net/ostpreussen/orte.php?bericht=1057&gl1044=8#gl1044>（2019 年 5 月 11 日查阅）。

<sup>10</sup> 参见克里斯托弗·克拉克：《1600-1947 普鲁士的兴衰》，2008 年慕尼黑出版。

的宗教自由吸引了整个欧洲的新教和加尔文教派信徒，他们不仅来自德意志帝国，还从波兰、立陶宛、荷兰、法国（胡格诺教派信徒）、苏格兰、俄国、奥匈帝国迁徙而来，甚至还有主要由俄国而来的犹太人。

17 世纪塔塔尔族人的袭扰和 1709 年至 1711 年间泛滥的鼠疫造成东普鲁士全境人口锐减，于是普鲁士国王着力推动瑞士加尔文派信徒以及萨尔兹堡的新教流亡者来本国定居，这两大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熟练工匠。此举造成东普鲁士居民来源复杂多样，使建立德语教育机构和使用德语授课成为促进这些移民群体统一与融合的手段，这个目标遂成为腓特烈·威廉一世 1713 年引入普通义务教育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当地非德意志的原生民族，还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都为东普鲁士增添了新的元素，对它产生了影响，进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各自的印迹，为其发展和多元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sup>11</sup>此外，在东普鲁士的历史上，该地区始终与波兰、俄国和波罗的海诸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和深入的交流。对此阿明·缪勒-斯塔尔是这样说的：交织在一起的关系网“层层叠叠，密密实实”，在造就多元文化精英方面功不可没。<sup>12</sup>

从另一个角度看，东普鲁士还有一处显得与众不同：与德意志其他邦国相比，东普鲁士的子民似乎更加命运多舛，悲剧和苦难总是更多地降临到他们身上。17 世纪塔塔尔族人入侵，这片土地被无情蹂躏，居民遭到劫掠驱赶；18 世纪初期鼠疫肆虐，中期“七年战争”（1756-1763）各方混战之时俄军趁乱而入，两次事件影响叠加，导致当地人口大幅减少；拿破仑战争中，法、俄、普各国在东普鲁士驻军长达数年，本已贫困交加的当地百姓不得不为他们提供给养；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伊始俄军便攻占了这里的大片土地；再加上与帝国本土之间遥远的地域距离，尤其是 1919 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令东普鲁士成为一块飞地。于是当时既遥远

---

<sup>11</sup> 有关此主题可参阅安德里亚斯·克瑟特一部很有意思的专著《东普鲁士——历史与传奇》，2005 年慕尼黑出版。

<sup>12</sup> 此语出自我们 2019 年 5 月 26 日的电话交谈。

又落后的中国在这种处境之下的东普鲁士人看来，或可成为天然盟友和未来伙伴，当“黄祸论”在西欧仍盛行时，许多东普鲁士人似乎已经更早地认识到蕴藏在中华大地上的巨大机会和发展潜力（参见第五章第四节陆军元帅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男爵的相关叙述）。

当然，我们也不应忽略东普鲁士曾经是纳粹主义的一座堡垒，这不仅体现在选举结果上，多数贵族阶层支持纳粹政权亦是事实，还有大量小农也曾寄望纳粹党能够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sup>13</sup>

本书表明，无论东普鲁士还是柯尼斯堡（亦称哥尼斯堡）在中国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伊曼纽尔·康德、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汉娜·阿伦特、凯绥·珂勒惠支、尼古拉·哥白尼等诸多先贤以及他们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所产生的影响。<sup>14</sup>

2018年6月，笔者出席斯塔卢波嫩（埃本罗德）与皮尔卡伦（施洛斯伯格）东普鲁士地区联盟在鲁厄河畔的温森市举办的年会并作报告，同年11月在西格兰市赫尔德图书馆和杜伊斯堡市“普鲁士”历史协会又以相同主题作报告，此书正是在这一系列报告的基础上，对内容作了大量扩充后定稿完成的。如果没有互联网，搜寻汇总文中提到的所有信息无疑会很艰难，所幸现代科技为此提供了极大便利。起初我曾认为有关东普鲁士与中国关系的论述会是相当有限的，但对相关信息的深入查询很快就令我改变了看法，查询得越多，有关这段关系的提示就越纷繁，所得到的结果也就越丰富。我无法再放下这个主题，开始不断从新的角度去探究它，有时甚至彻夜难眠。这部书稿所呈现的正是这些搜寻与探究的成果。

---

<sup>13</sup> 相关文献：安德里亚斯·克瑟特：《东普鲁士——历史与传奇》，2005年慕尼黑出版；克里斯蒂安·罗勒：《东普鲁士的纳粹政权》，2006年慕尼黑出版；哈尔穆特·布克曼：《东欧德意志史——东西普鲁士》，1992年柏林出版；布鲁诺·舒马赫：《东西普鲁士史》，1959年维尔茨堡出版。

<sup>14</sup> 2019年2月在中文搜索平台“百度”上输入“东普鲁士”，共有102万个条目弹出。在中国人与该地区相关的接受认知和接受记忆里，东普鲁士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概念。2014年3月一位中国博主甚至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忘记了东普鲁士的领土呢？”见：<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062534-1.shtml>（2019年2月24日查阅）。中国历史学者周思成在其《决战柯尼斯堡》一书中详细描写和追溯了二战之前的柯尼斯堡以及该城受战争所累被毁的情况，非常值得一读。该书2014年由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

在此，我要感谢埃本罗德（斯塔卢波嫩）地区联盟的地区负责人格哈特·库巴尔特博士，是他的提议让我关注到这个主题；感谢普鲁士历史协会主席汉斯-约克·弗洛斯先生，是他的鼓励让我由最初的一场报告开始最终完成了这部书稿。我还要向对书稿提出大量重要的根本性建议和意见的可敬同事，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罗梅君博士，以及仔细审读全书原稿并提出大量建设性意见的克莱门斯·亨勒先生致以特别的谢意！

对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鲁尔都市孔子学院，特别是（前任）中方院长刘靛副教授和执行院长乐苏珊女士，以及普鲁士历史协会及其主席弗洛斯先生，埃本罗德与施洛斯伯格地区联盟在此书出版过程中给予的精神和经费支持，在此谨表谢忱。同时，感谢武汉大学及该校德文系副教授刘靛博士在此书中译本翻译出版过程中给予的支持。

最后，我要向所有以访谈和信（邮）件的方式，或以提供照片、图片的方式为此书出版提供帮助的人表示感谢，他们是：凤梅·海贝勒，莉塔·海纳赫，胡翔凡（音）先生，哈罗德·克雷厄，约翰·凯，莉塔·古金斯基（又译库钦斯基——译者注），格哈特·库巴尔特，鲁特·莱泽洛维茨，罗梅君，阿尔文·马格，马提亚斯·马扎特，阿明·缪勒-斯塔尔，卜松山，乌铎·施密特（立本责信义会），胡拜图斯·凡·登·高兹和 Zhou Yuying 女士。

## 第二章 家族史：与东普鲁士渊源

我的外祖父理查德·克莱茵 1882 年在其母伊丽莎白·瑞德家位于施特利什肯（1938 年起改称施德劳）的农庄出生，成长在尤克尼什肯（1939 年起改称佛伦赫斯特）这座小村庄（两地均位于斯塔卢波嫩县<sup>15</sup>境内，自 1918 年起隶属贡宾嫩行政大区，1938 年改称埃本罗德），在那里他的父亲路德维希·克莱恩（1835 年出生于斯塔卢波嫩县施雷尼肯，后被俄国士兵掳掠至西伯利亚，1915 年在那里去世）和母亲（1854-1883）经营着一座农庄。我的外曾祖母育有两子（理查德和弗里德里希），在外祖父一岁去世，外曾祖父后再婚，再婚妻子又为他生育了两个子女（奥古斯特和贝尔塔）。

外祖父的祖父母，卡尔·路德维希·克莱茵（1808-1892）和露易丝·克莱茵（本姓洪德里斯）来自施雷尼肯（海瑙）。瑞德与洪德里斯家族都是从萨尔州迁徙而来的“萨尔兹堡宗教流亡者”<sup>16</sup>，1732 年由于萨尔兹堡主教利奥波德·安东·冯·菲尔米安（1679-1744）的一纸驱逐令，他们被迫和其他大约 2 万名新教徒一起背井离乡。

---

<sup>15</sup> 斯塔卢波嫩，1818 年至 1945 年东普鲁士的一个县，和当地许多县郡一样在 1938 年改名，称埃本罗德（俄语涅斯捷罗夫/Несрепов，立陶宛语 Stalupėnai，波兰语 Stołupiany）。1938 年这座位于东普鲁士北部的城市约有人口 4.1 万，2010 年仅有居民 4600 人，城市取名涅斯捷罗夫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史蒂芬·库斯米什·涅斯捷罗夫的上校，他在红军 1944 年 10 月 20 日对东普鲁士发起的第一轮进攻中牺牲。来自当年贡宾嫩地区的赫尔塔·诺依曼在 1990 年第 75 期《贡宾嫩家书》第 12 页解释了“埃本罗德”一名的来源：“1937/38 年间，柏林下达一道命令，要求所有非德语名称的城市、村庄和郡县改名，于是贡宾嫩行政专区主席罗德博士指示所有县郡向政府提交其拟用德语名称的建议，每地允许提交三个。1932 至 1939 年，我的丈夫任政府部门负责人（县长暂时居家），他和一位我已记不清名字的土木工程监督官得到一项任务，从各地提交的三个建议中挑选一个作为各县郡最终的名称。有一天，来自斯塔卢波嫩的建议摆在了两位先生面前，看着它们那位监督官突然笑起来，推了推我丈夫说：‘诺依曼先生，您看这个，就选它吧——埃本罗德（Ebenrode）。’迟疑了一会儿，我先生明白同事为何发笑了。‘罗德’与行政专区主席的名字（Rohde）同音，他和专区副主席，一位老先生，两人都爱说‘正是，正是！！’（德语里‘正是’一词写做‘eben’，发音为‘埃本’——译者注）就这样斯塔卢波嫩拥有了自己新的德语名字（埃本罗德，谐音可作‘正是罗德’解——译者注）”。亦见 <http://genwiki.genealogy.net/Stallup%C3%B6nen>（2019 年 5 月 9 日查阅）。可惜这是否真是城市的得名原因，还是另有原委，已无从考证。”

<sup>16</sup> 在历史学界“宗教流亡者（Exulanten）”多指 16 至 18 世纪的基督新教信徒，因其宗教信仰而被驱逐离乡。



萨尔兹堡主教利奥波德·安东·冯·菲尔米安

整个 16、17 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各地总共约有 10 万新教徒被驱逐或迁居他地（如特兰西瓦尼亚）。<sup>17</sup>我的祖辈属于最后一批被驱逐者，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接纳了这些难民，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定居于东普鲁士。

这里有一段对普鲁士如何接纳“萨尔兹堡宗教流亡者”的简要记述：

“1732 年 4 月 29 日，第一批流亡者抵达波茨坦，恰好在此的国王即刻召见了他们，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并反复安抚他们：‘你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孩子们，你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柏林被作为收容地，一年之内接纳了约 15000 人，从这里他们再被分流到立陶宛境内贡宾嫩、因斯特堡、蒂尔西特、斯塔卢波嫩、皮尔卡伦、拉格尼特和达克门等郡县的新居住地。部分流亡者在斯德丁登上已为他们备好的船只，另一部分自己赶着车的人则经马林韦尔德尔继续他们的旅程。1732 年 6 月中旬，第一批移民抵达他

---

<sup>17</sup> 有关萨尔兹堡驱逐异教徒的内容参见：《宗教改革、流亡与萨尔兹堡的新教徒》，1981 年萨尔兹堡出版；乔治·特纳：《带上故乡——一部萨尔兹堡新教徒的流亡史：从 1732 年离乡，定居东普鲁士到 1944/45 被驱逐》，第 4 版，2014 年柏林出版。

们新的家园贡宾嫩。两年后的统计表明，共有 11989 名来自萨尔兹堡的移民在此定居。为了在立陶宛给这些被驱逐者打造新家园，一向节俭的国王至少花费了 350 万塔勒。这里的每一个移民都能重操旧业：农民得到几乎和老家一样大小的土地，此外还有住宅，包括必要的杂用建筑和器具；[...]短工可获得免费的住所、花园和一小块耕地；手工业者则大多被安置在城里。”<sup>18</sup>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接见萨尔茨堡宗教流亡者，右侧为柯尼斯堡城，左侧是萨尔兹堡

新教捍卫者、矿工约瑟夫·赛特贝尔格（1658-1733）所作的《宗教流亡者的慰藉歌》不仅是被驱逐者当时心声的表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也被视为定居东普鲁士的萨尔兹堡人的颂歌。歌词全文如下：

---

<sup>18</sup> 摘自埃米尔·格雷沙特：《我们的家园——1922年斯塔卢波嫩地理与历史考论》，载于《卡塞尔-埃本罗德（斯塔卢波嫩）1915-2015百年史——地区联盟纪念帮扶伙伴关系周年特刊》，2015年伦茨堡出版，第19-20页。

## 《宗教流亡者的慰藉歌》

我是悲惨的宗教流亡者，这就是我的名字，  
有人以上帝之名将我驱离故国，  
但我知晓，我主耶稣，你也曾历此劫。  
如今我要步你后尘；行动吧，主啊，循你所愿。  
此刻的我也是那朝圣者，不得不踏上陌生的路途，  
我请求你，我的上帝我的主，不要离我而去。  
请护佑我，全能的上帝，我已将自己交付于你，  
不要将我遗弃在困境里，那是会令我失去生命的时刻。  
我坦承我的信仰，从不为此羞愧，  
称我为异端，或是夺去我生命，谓我何求。  
绳索于我为荣耀，为了耶稣我要忍耐，  
这是信仰的传承，不是恼人的负累。  
就算撒旦和尘世掠去我所有，  
只要我还有此珍藏：上帝和真正的信仰。  
主啊，如你所愿，我把自己交给你，愿长伴你左右。  
我愿虔诚遵从你的意志，  
哪怕走向苦难，从不抗拒，  
惟愿彼处上帝亦赐我良友。  
我愿尊上帝之名前行——倾我所有，  
我相信，终有一日将得到天堂的荣冠。  
今天我被迫弃子离家，  
上帝啊，踏上那陌生的路途，我不禁泪流。  
愿上帝引我入城，去往那可以倾听你教诲的地方，  
为此我时刻振奋精神。  
即使潦倒于尘世，岁月漫漫，  
上帝终将在天堂予我美居华帐。  
作此短歌者无心留名，  
他鄙视教皇的说教，宣告对耶稣的自由信仰。<sup>19</sup>

---

<sup>19</sup> <http://www.exulanten.com/trostlied.html>（2019年3月6日查阅）。



约瑟夫·赛特贝尔格

2017年我们在当年的贡宾嫩（今古谢夫）停留期间，特地参观了重建的“萨尔兹堡教堂”。这座教堂最初于1752年为来自萨尔兹堡的新教流亡者所建，1838年因年久失修被拆除，1840年经由普鲁士建筑设计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规划重建，1931年再次进行了修缮。然而，因为战火1945年时教堂已损毁严重，战争结束后破碎的瓦砾用作他途，铺在了重建的道路上。1995年，在“贡宾嫩萨尔兹堡教育慈善基金会”的资助下，教堂在今天的古谢夫得以重建，自此这座建筑成为贡宾嫩地区新教路德宗信徒的教堂和集会场所。



贡宾嫩重建的萨尔兹堡教堂（2017）

有趣的是，在教堂对面的一幢房屋外墙上居然有这样一幅壁画，让人回想起萨尔兹堡宗教流亡者初到贡宾嫩的场景：



古谢夫（贡宾嫩）萨尔兹堡教堂对面房屋外墙上的壁画（2017）

19 世纪，我的先祖们也曾在皮尔卡伦（即施洛斯伯格县）的希尔文特和库森，斯塔卢波嫩（即埃本罗德县）的拉蒂兹和施雷尼肯（海瑙）等地生活。对外祖父而言，东普鲁士村庄的天地太小，作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前往柏林附近的贝利茨镇，在伯父奥古斯特·克莱茵的制革厂当制革学徒。出师之后他便在当年的皮革工业中心，美茵河畔奥芬巴赫开了一家工厂，成为自主经营的皮革制造商，并在那里与我的外祖母奥缇俐（本姓布特维克）成婚。我没见过外祖父，他在 1949 年我两岁时就去世了。



来自东普鲁士的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1909）

外祖父留给我唯一的“遗产”和信物（战争中他的全部家当毁于一枚燃烧弹）也是将我和中国联系起来的第一件物品。小时候我就在奥芬巴赫家中地下室的一只箱子里发现了这件小小的皂石刻品，它应该来自中国（制造于1900年前后），是用来盛装墨汁的。物件本身并不值钱，却是对外祖父的一份怀念，自孩提时代起就一直摆在我的书桌上。母亲告诉我，这是一位在外祖父那儿为自己太太买皮包的中国商人赠予他的礼物。



外祖父的中国皂石摆件

在家族史这件事上，我的母亲（1908-2002）绝对是一位孜孜不倦的老师。孩提时代她曾两次去过自己父亲在东普鲁士的家，吸引她的不仅是那里美丽祥和的风光，关键还有巨大的财富。年少时她就梦想嫁入“豪门”，然而最终却成为我父亲，奥芬巴赫一个面点师的太太。父亲经常开玩笑说，母亲到底还是如愿嫁给了“富家子”，因为面包店也卖糖果，而在黑森方言里“糖果”和“财富”是同一个词（Guts），“糖果所有者”自然也是“财富所有者”（Gutsbesitzer）。

萨尔兹堡新教流亡者的家族身世在母亲的思想意识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教育子女在对驱逐历史的祭奠中珍视新教信仰，感恩普鲁士国王对流亡者的接纳。虽然成年后母亲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东普鲁士，但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始终牵挂着那里，那是一片令她魂牵梦绕的土地。

母亲对自己父亲的东普鲁士故土那份深刻眷恋，以及与此相关的家族记忆也烙印在我和三位年长许多的兄姊格奥尔格、安娜玛丽和阿尔布雷希特的脑海里。对“向往之地”东普鲁士和埃本罗德的那些记忆令我无法释怀，也不断与我的生活交缠在一起。上世纪90年代，我就曾前往东普鲁士寻亲，而母亲几十年来也从未放弃寻找曾经生活在尤克尼什肯（佛伦赫斯特）的表姐艾丽和表兄维利·梅尔霍恩，他们是母亲当年在故乡的玩伴，她十分珍惜这份情谊。非常巧合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特里尔大学东亚政治系任教期间，认识了一位来自埃本罗德的历史学家，他建议我联系地区联盟并给了我保罗·海纳赫的地址。我给他写了信，很快便从他那儿得到艾丽·梅尔霍恩的地址，1944/45年间被驱逐离乡后她嫁给（勃兰登堡州）利兴镇一个鳏居的农场主，并在那里定居。通过这种方式，我终于重新和失散的东普鲁士亲戚们取得了联系。早在1992年，为了亲眼看看和亲身感受一下那个曾经的德意志行省，我就去过如今已归属波兰的原东普鲁士地区，2015年我又踏上去往奥地利蓬高的旅途，希望在那里也能找到一些线索。



蓬高地区圣约翰县（蓬高曾是一些宗教流亡者的故乡）

在阿尔腾马克特的地方志陈列馆里，我偶然发现一座已有 250 年历史，带机械装置的古老的“格鲁德微缩景观雕塑”，里面居然也有反映萨尔兹堡宗教流亡者命运的元素。因此我认为，在当地民众的意识里驱逐新教徒的历史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当年由于 20000 名新教徒被驱赶离境，这个地区几近空城，而且流亡离去的主要是手工业者、有经验的农场主和专业人员，此后一段时间这几类人才明显缺乏，据我们所住酒店的主人说，驱逐行为令当地陷入了极度贫困。

在蓬高地方志陈列馆戈尔德格宫，我发现一处反映新教流亡者命运的小型展览，并偶然看到了洪德里斯这个外祖父先祖的姓氏。而在阿尔腾马克特，海纳赫这个姓氏也被我找到，其家族同样是在 1732 年被驱逐，后流亡至施特利什肯（施德劳）并在那里定居。<sup>20</sup>

---

<sup>20</sup> 参见尤里安·施莱普米勒：《东普鲁士之行——从埃本罗德海纳赫家族看萨尔兹堡新教徒的流亡》，彼得·海纳赫博士自费出版，2005 年雷尔。



(蓬高) 阿尔腾马克特的格鲁德微缩景观雕塑

### 第三章 “历史故园”之旅

在家族记忆文化的熏陶下，东普鲁士于我而言成为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故园。为什么说是“历史故园”呢？东普鲁士是我们家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2017年我同埃本罗德和施洛斯伯格地区联盟的成员一道第一次踏上这片故土。外祖父曾经生活过的村庄尤克尼什肯（佛伦赫斯特）已不复存在，原址上找不到任何显示曾有人在此繁衍生息的痕迹。不过祖辈们的故园（施雷尼肯，即海瑙）依然屹立，在那里驻足冥想是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的时刻。总体而言，我惊羨于故土深远宁静的景致和充满野性之美的大自然，但同时也对村庄和民众的贫困处境甚感讶异。



像尤克尼什肯（佛伦赫斯特）这样的村庄已踪迹难觅（2017）

这不由得让我思考故乡、传承与责任这三方面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故乡是和记忆、情感联系在一起的，它远非纯粹的地域概念，更多的是一种内心感受，人们往往是在离开或者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才会感知这份情怀。



作者和夫人在施雷尼肯（海瑙）尚存的一幢德式房舍前（2017）

东普鲁士哲学家约翰·哥特弗雷德·冯·赫尔德曾有这样一句名言：“家乡是一个不需要解释说明的地方”。这里他想表达的是，人们通晓明白家乡的人、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因此自然就会有家的感觉，那是一个人的成长之所，是保留着孩提和青少年时代记忆的地方。遇到老乡，听到乡音，人们会产生温暖之感，不由得想去亲近。但家乡其实有很多层面，绝非一个静态概念。我出生在美茵河畔的奥芬巴赫，所以是黑森州人、德国人、欧洲人，但同时我也是杜伊斯堡人，从历史上看（还）是东普鲁士人。以今天的眼光看，故乡和“对某个地区的出身认同”是紧密结合在一

起的，<sup>21</sup>也就是和家族历史相联系，同某个虚拟的“故乡共同体”反倒是鲜有关系。此外，一个人还会有精神上的故乡，是指在思想和价值观上同那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于我而言，中国也可以算是故乡，因为我曾长期、多次在那里驻留，会说那里的语言，熟悉那里的一切。

只要有情感上的联系，人们其实可以将许多不同的地方视为“故乡”。故乡不一定非得是某个具体的地点，掌握一门语言，说着它就好像“在家”一样，也会有“故乡”的感觉，就好比我说中文的时候。

东普鲁士被许多德国人视为故乡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从地域上看，曾经的东普鲁士今天是俄罗斯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的故乡。战后被驱逐的东普鲁士人的后代没有在那里成长，只能从讲述和报道中认识古老的东普鲁士。我以为，传承历史，保持对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怀念，或者在此过程中提供帮助，应该是各地区联盟组织的任务。在施洛斯伯格，有这样一位普通的俄罗斯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在自己并不宽敞的房子里收集保存德意志时代的日常旧物——一个不折不扣的博物馆，令我惊讶无比。通过这种方式，记忆文化不单保留在东普鲁士地区联盟的各地方志陈列馆里，还得以在今天居住在那里的民众中流传。

---

<sup>21</sup> 参见延斯·科尔福坎普、赫尔曼·史特拉斯：《何为故乡：排除原则还是未来故事？》，载于《今日社会学》，2017年8月，第19页。



早年施洛斯伯格的私人“博物馆”一隅

在埃本罗德也有一座小型的“历史博物馆”，但这里主要收集的是战争时期和（苏联）红军的物品，没有或者仅有少量和前东普鲁士相关的文物，因为绝大部分都已毁于战火。德意志历史文化是当年东普鲁士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各地区联盟能够，也理应在维护和规划这些遗产的工作中发挥作用。未来那些现居于此的民众的后代或许会问：是谁在俄罗斯人迁入之前在此地修建了教堂、宫殿和商铺？出于何种目的？他们的命运如何？即便这片归属俄罗斯的领土当前政治形势复杂，我仍认为与今天在此生活的人共同构建这段记忆是一项关键性工作。无论是德俄联手修葺柯尼斯堡大教堂（如今多被用作纪念场所和音乐厅，拥有俄罗斯最大的管风琴），还是在贡宾嫩重建萨尔兹堡教堂，毫无疑问都是德俄合作的积极典范，是具有榜样作用和前瞻性的项目。

东普鲁士之旅令我的心情五味杂陈，一方面我看到俄罗斯境内许多小城市的衰败，正如克里斯蒂安·奈德对前蒂尔西特（现称苏维埃茨克）的一段描写：

“造访者突然之间就站在了俄罗斯最丑陋的广场上，可这里曾是东普鲁士蒂尔西特最美丽的广场。就在这个位置，宏伟的条顿骑士团教堂拔地而起，八个球形底座托起教堂的塔尖——如此壮美，让拿破仑甚至想将它搬回巴黎。它后方的德意志大街，今天的加加林大街，曾是沙皇亚历山大1807年赴蒂尔西特与法国人签署和平协议时下榻的地方。普鲁士露易丝王后住过的小楼不复存在，蒂尔西特弗莱彻广场另一侧的楼宇也片瓦不存，现在那边矗立的是边境检查站，将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与立陶宛分隔开。未粉刷的灰色苏式建筑围绕着广场，人们晾晒的鱼挂在阳台的晾衣绳上……苏联解体后，生活在德国当年东普鲁士省北部的近百万俄罗斯人曾梦想这里会成为‘波罗的海的香港’，然而这片土地至今仍然只是欧洲中部的一座荒岛。”<sup>22</sup>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消除对德意志的记忆，以新事物取而代之，战后有很一部分德国旧物被毁，诸如施洛斯伯格（皮尔卡伦）县类似希尔文特这样的从前德国最东部的市镇不复存在。<sup>23</sup>而施洛斯伯格（皮尔卡伦），或者埃本罗德（斯塔卢波嫩）这些曾经的县府如今也显得荒凉贫瘠，死气沉沉。所幸不是看不到希望，在加里宁格勒（柯尼斯堡）、切尔

---

<sup>22</sup> 克里斯蒂安·奈德：《和解——边界之间》，载于线上《明镜周刊》，2012年1月12日，<https://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83588378.html>（2019年5月12日查阅）。

<sup>23</sup> 在希尔文特河对岸的立陶宛小城库迪尔科斯-瑙梅蒂斯（新城）人们倒是很注重对希尔文特的纪念。2017年我们在东普鲁士北部旅行时曾参观过安塔纳斯·施普那纳耶蒂斯在这座立陶宛小城建立的“希尔文特博物馆”。

尼霍夫斯克（英斯特堡）、古谢夫（贡宾嫩）这些城市的居民依然怀念德意志遗风，并试图恢复保留，这当然也得到了来自德国的支持。



被视为贡宾嫩象征的驼鹿立雕（1912年立于沿堤大道）在苏联统治时期被移至加里宁格勒动物园，20世纪90年代初期迁回古谢夫

不过在维护历史方面当地民众的兴趣日益增强，立陶宛和波兰的一些地区已然呈现出不同的景象：焕发生机的城市与村庄，对东普鲁士历史文化的重建与传承，在立陶宛的希卢泰（海德克鲁格）、克莱佩达（梅梅尔），亦或是波兰的弗龙堡（弗劳恩堡）和奥尔什丁（阿伦施泰因）这一切都有迹可循。它们也表明本书所勾勒的东普鲁士历史，以及东普鲁士同中国的关系不单单涉及德国，或者德中两国关系史，这其实是更宏大的欧洲背景下历史面貌的一部分，包含了俄罗斯、波兰和立陶宛各国在这一地区的历史，以及当地历史进程中德国、中国、波兰、俄罗斯和立陶宛之间

错综复杂的紧密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讲述的也是今天俄罗斯、波兰和立陶宛境内前东普鲁士地区历史的一部分。<sup>24</sup>

---

<sup>24</sup> 有意思的是 2015 年曾有一位中国网友在网上提问，康德究竟算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见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675546>（2019 年 4 月 13 日查阅）。

## 第四章 我的职业：通往中国之路

在母亲向往的旅行地点里，（无法企及的）东普鲁士占据着一席之地。或许正是这份向往令她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总是将地理方面的书籍作为礼物送给我，这些书深深吸引了我，也让我产生了去世界上遥远的地方旅行的渴望。八岁生日我得到的是《有生命的地理学——关于我们所处世界的彩页图册》，书中以大量的插图和简明的文字对世界各地进行了介绍。其中对亚洲的描述（最多的人，最高的山，“世界上若干最古老，却最不为人知的民族”，戈壁大漠，荣华富贵与贫瘠苦难的共生共存等等）唤起了我巨大的好奇心，我想成为发现者和航海家。卡尔·迈是我青少年时代便广受欢迎，至今仍热度不减的一位旅行作家，其作品以（虚构的）探索世界的冒险之旅为主题，也给了我许多启示。作为一个少年我不禁自问，各民族和文化间究竟区别何在，又有何共同之处，在巨大的差异之下它们如何能和平共处，又如何互鉴。

1967年中学毕业后，我先后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哥廷根、美因茨和海德堡等地大学就读民族学、哲学、政治学和汉学专业，我学习中文，并将研修重点放在中国及其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在此期间我注意到，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的瓦尔特·谢尔1972年访问北京时（筹备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听中国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提到自己只知柯尼斯堡，而不知加里宁格勒，因为留学柏林和哥廷根期间他曾周游欧洲，1930年到过这座城市。<sup>25</sup>我的表兄汉斯-约阿希姆·哈里尔那时正任职外交部办公厅，恰好随瓦尔特·谢尔出访，在回忆录中他写到，周恩来“热情洋溢地谈到了美丽的东普鲁士”。<sup>26</sup>

---

<sup>25</sup> 参见卡尔·格罗贝，关于当代史他曾有关键性的著述。周恩来是一位睿智的实用主义者，他将毛泽东思想成功运用于政治实践。《法兰克福周报》，1976年1月10日。

<sup>26</sup> 汉斯-约阿希姆·哈里尔：《在远东和梵蒂冈之间》，1999年圣奥提利安出版，第167页。

1973 年，实业家、克虏伯集团掌门人贝托尔德·贝茨（1913-2013）曾率领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北京，返德后他说，周恩来谈起自己曾有一次坐飞机从莫斯科经柯尼斯堡前往柏林，并重申前文已提及的表述，对他而言只有柯尼斯堡，没有加里宁格勒。<sup>27</sup>



前中国国家总理周恩来（1898-1976）

---

<sup>27</sup> 《理想主义者在中国——汉斯-奥托·埃格劳与贝托尔德·贝茨谈德国实业家的中国之旅》，载于《时代周刊》，1973 年第 24 期，<https://www.zeit.de/1973/24/als-idealist-in-china>（2019 年 5 月 2 日查阅）。针对此文贝托尔德·贝茨的外孙克莱门斯·亨勒先生（也是本书的校阅者）曾致信笔者：“谁知道呢，要不是外祖父认为加里宁格勒的现状明显对德国人不公，故而多次情绪激动地谈到他当年与周恩来的见面，或许我不会有这么坚定的学习中文的想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还是孩童的贝托尔德·贝茨曾和父母短暂生活在东普鲁士的安格堡，其父所在兵团曾在那里驻扎。

1975年，尚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我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这个国家还相当封闭，在欧洲鲜有关于它的消息。这次旅行让我意识到，若想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我需要在那里生活和工作数年。于是回国后我便前往中国驻波恩大使馆了解相关途径，要想长期留在中国，只有在高校任德语教师，在外国文学出版社做翻译和编辑，又或者在北京国际广播电台做编辑这几种可能，他们建议我完成博士学业后再联系中国使馆。

1977年初提交博士论文后我开始行动，经过一轮翻译测试我得到了《北京周报》的工作合同，这是一份德文周刊，从中国的角度报道中国。在那里我作为翻译和编辑工作了四年多，一直到1981年秋天。



1978年作者（后排右二）和《北京周报》的中国同事们在北京

那时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直到1978年底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种状况才逐步发生改变。由于有了“开放政策”，我们这群被称之为“外国专家”的人同中国人的联系也随之多了起来，这让我有机

会在北京认识了 my 夫人王静，并于 1979 年 8 月与她结婚。起初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因为我是那时候（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个申请同中国人结婚的外国人，我们不知道是否会得到批准，也不知道这可能会给我俩，特别是给我的夫人带来怎样的后果。经过一段状况频出的漫长等待我们终于还是被批准结婚。



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当时还称“革命委员会”）手持结婚证的作者与夫人王静（1979）

### **第一节 凯绥·珂勒惠支、作家鲁迅与中国艺术**

婚后不久我和夫人一起在北京参加了东普鲁士版画家、画家和雕刻家凯绥·珂勒惠支（1867-1945）作品展的开幕式。珂勒惠支出生在柯尼斯堡，并曾就读于当地的艺术学院。她作为艺术家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便在中国声名远播，中国著名文学家鲁迅（1881-1936），同时也是一位版画和木刻收藏家，曾托人在德国购买她的作品并编印过多本介绍其艺术的画册。

1932 年 6 月，上海的一家书店组织了一场有关珂勒惠支的展览，出席开幕

式的人当中就有鲁迅。<sup>28</sup>他曾经写道：“在女性艺术家中，[···]现在几乎无出于凯绥·珂勒惠支之上——或者赞美，或者攻击，或者又对攻击给她以辩护。”<sup>29</sup>在鲁迅眼里，她的作品“是以诗歌的方式照出穷人的悲痛”，这表明“她自视为受压迫者中的一员，满腔愤怒地反抗不公”。<sup>30</sup>鲁迅认为珂勒惠支的作品非常理想地契合了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时代精神，中国艺术家应以她为榜样，用作品来表现那个时代中国存在的压迫、剥削、苦难和贫穷。1931年，鲁迅的一名学生兼友人和另外五位年轻人一起因在中国传播“左翼”外国文学和艺术被处决，凯绥·珂勒惠支是公开提出抗议的人士之一。对此鲁迅写道：“这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母亲的联盟。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虽然现在只能守着沉默，但她的作品，却更多地在这远东的天下出现了。是的，为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sup>31</sup>

时至今日凯绥·珂勒惠支的艺术仍对中国的木刻及其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当年在中国西北部（1949年以前）中共政治中心（陕西省）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鲁迅提出的“以凯绥·珂勒惠支、乔治·格罗兹（1893-1959）这样的现代西方艺术家为楷模，为传统的中国木刻艺术重新注入生命力”的建议曾占据重要地位。<sup>32</sup>2015年，中国美术馆在北京以《黑白的力量》为题，对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作了相当全面的展示。

---

<sup>28</sup> 托马斯·康蓬：《凯绥·珂勒惠支，乌尔苏拉·汉堡格和鲁迅在上海》，[https://www.academia.edu/35770564/K%C3%A4the\\_Kollwitz\\_Ursula\\_Hamburger\\_und\\_Lu\\_Xun\\_in\\_Shanghai](https://www.academia.edu/35770564/K%C3%A4the_Kollwitz_Ursula_Hamburger_und_Lu_Xun_in_Shanghai)（2018年12月19日查阅）。

<sup>29</sup> 米莉亚姆·尼霍尔斯：《凯绥·珂勒惠支在北京——生物性，存在性，社会性》，载于：国际在线，2015年11月18日，<http://german.cri.cn/3105/2015/11/18/1s243438.htm>（2018年12月19日查阅）。

<sup>30</sup> 出处同上。

<sup>31</sup> 《鲁迅与德国版画》，载于：《今日中国》，2002年8月，<http://www.chinatoday.com.cn/chinaheute/208/kk81.htm>（2018年12月9日查阅）。关于凯绥·珂勒惠支在中国的影响亦见《凯绥·珂勒惠支》，<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AF%E7%BB%A5%C2%B7%E7%8F%82%E5%8B%92%E6%83%A0%E6%94%AF/1614197>（2019年3月18日查阅）。

<sup>32</sup>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1973年汉堡出版，第65页。



凯绥·珂勒惠支



鲁迅

## 第二节 青岛蜜月之旅：邂逅普鲁士-德意志遗迹

1979年8月结婚后，我们前往德国当年的殖民地山东青岛度蜜月，并事先在王子饭店，也就是曾经的亨利王子饭店预定了房间。1899年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1862-1929）曾作为德国皇家海军总监造访青岛，这座饭店就是专门为他而建。



蜜月之旅：在青岛至北京的列车旁

晚上抵达饭店后，我们表示已经预订房间，并出示了结婚证，经理却拒绝为我们提供房间，因为他认为外国人不可能和中国人结婚，在他们饭店没有可供中国人和外国人同住的房间，而且酒店客房已经全部订满。经过近两小时的讨价还价他终于同意让我们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住一晚，之后得另寻住处。第二天一早我上楼向客房服务员打听还有哪些房间是空着的，却发现不仅没有一个房客，甚至连预订都没有。我拎起箱子，挑了一个最漂亮的房间对经理说，我们要留下，我们是合法夫妻，如果他不想让我们入住就打电话给公安局，最终他妥协了，让我们住进了客房。

房间里的设施和卫浴设备全都还是德意志时代的，向外望去胶州湾的美景尽收眼底，可以想见亨利亲王下榻在此会有多么心旷神怡。



当年青岛的亨利王子饭店（1911）

2017年我们故地重游，来到青岛王子饭店，据地理学家威廉·马扎特所述，上世纪90年代末人们曾将饭店拆除重建，因此我们已然辨认不出它的模样。<sup>33</sup>

---

<sup>33</sup> 关于饭店历史参见威廉·马扎特：《亨利王子饭店简史》，载于：《青岛——青岛历史文集 1897-1953》，<https://www.tsingtau.org/short-history-of-the-prinz-heinrich-hotel-in-qingdao/>（2019年4月1日查阅）。



2017年改建后的王子饭店



作者和夫人在饭店前合影（2017）

1981 年底我返回德国后，先后就职于不莱梅海外博物馆（筹建常设的中国部，并为博物馆编撰中国藏品目录）和不莱梅、特里尔等地的高校。1998 年我受聘为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教授，2013 年起成为中国政治与社会学资深教授，并自 2009 年起担任杜伊斯堡-埃森大学鲁尔都市孔子学院德方院长。每年我都前往中国调研，常常一去数月，造访不同的地区，研究不同的课题。<sup>34</sup>

---

<sup>34</sup> 笔者在中国调研的课题主要包括民族政策（1981-1984），私营经济的地位（1985-1988），腐败问题（1990-1992），农村地区的城市化（1993-1996），私营业主的社会政治角色（1996-1998），知识分子的意见对政策制定的影响（1998-2000），民族企业家（1999-2003），城市社区的功能（2003-2005），治理改革（2007-2007），环境治理（2008-2012），农村现代化（2008-2011），农村干部的作用和组织（2012-2017），私营业主的群体与组织行为（2012-2017），政治形象：互联网与私营业主（2016-2019）。定期在中国进行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与中国学者开展合作是我研究工作的基础，研究经费主要来自德国研究联合会、大众基金会、联邦教育与研究部，汉尼尔基金会等机构。



在四川省彝族地区作田野调查（2001）

在后续章节，我会将（有关东普鲁士的）家族记忆和多年研究中国的学术积累结合起来，介绍评述东普鲁士同中国的历史联系及东普鲁士那些同中国有关的人物。

## 第五章 东普鲁士与中国：从普鲁士东亚政策到纳粹灾难

通过与埃本罗德地区联盟，特别是与其主席，也就是前文曾提到的邀请我就东普鲁士与中国的关系做报告的库巴尔特博士的交流，加之后续对这个领域相关课题的研究，我认为东普鲁士在德国对华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章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普鲁士的第一个东亚使节团，“哲人国王”腓特烈大帝及其与中国的渊源，19世纪末有关招募中国劳工为东普鲁士效力的争论，以及所谓的“义和团战争”，普鲁士陆军元帅冯·德·戈尔茨对亚洲问题的立场，第一条通往中国的空中航线，德国的“保护区”青岛，风靡东普鲁士各王宫的“中国热”，犹太公民逃亡上海的历史以及20世纪40年代朱德元帅之女被关押在东普鲁士一座集中营的经历。

### 第一节 普鲁士的东亚政策与普鲁士东亚远征

一直到19世纪中国的大多数人都不知晓“普鲁士”这个国名，只因一些欧洲商船悬挂的国旗上有一只鹰便称其为“单鹰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它在哪里，或者确切的名称是什么，不过是以这种方式“双鹰国”，即哈布斯堡帝国的旗帜加以区别。<sup>35</sup>

正如博恩特·埃伯斯坦所指出的，普鲁士的对华贸易可回溯至“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冯·勃兰登堡的统治时期（1640-1688）。选帝侯曾授命一位来自荷兰的海军上将成立东印度公司，由柯尼斯堡附近的东普鲁士波罗的海港口皮劳出发开展业务。同时，他还在宫廷广纳贤才，这些出谋划策的专家智囊当中有出生于波美拉尼亚，研究中国语言和历史的学者安德烈亚斯·穆勒（1630-1694），以及来自柏林附近菲斯滕瓦尔德的御医

---

<sup>35</sup> 埃伯斯坦（2007），第9页；又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5%E9%B0%E5%9B%BD>（2019年5月6日查阅）：单鹰国。

兼顾问克里斯蒂安·门策尔（1633-1701），他曾在柯尼斯堡学医，60岁习得汉语后不仅编纂了一部汉语-拉丁语词典，还撰写了一部《简明中国编年史》。<sup>36</sup>此外，选帝侯还建立起一个图书馆，收藏中文以及与中国有关的作品和著作。<sup>37</sup>



“大选帝侯”肖像，克里斯蒂安·门策尔 1785 年创作，汉字围绕在肖像四周，初衷应是向中国介绍选帝侯，但可能从未派上过用场。肖像周围汉字表达的主要意思是此画像人物为“睿智的选帝侯平思（肖像中：平思重武圣帝——译者注）”，这是汉语里对腓特烈的称谓，意为“和平统治者”（平思），以此传达和平之意

由于无法为选帝侯的计划寻找到合适的投资人，加之皮劳作为港口貌似也并非特别合适，首次尝试以失败告终。<sup>38</sup>

普鲁士在获得东弗里西亚城市埃姆登及其港口后，终于拥有了一个适合开展东亚贸易的港口，这也促成了贸易公司的成立。国王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从对华贸易中看到了巩固普鲁士在欧洲优势地位的机会，于是让人扩建和修缮埃姆登的港口。1731 年普鲁士皇家亚洲贸易公司成立之际，他专程前往埃姆登，意图向投资者表明他对该计划的大力支持，而

<sup>36</sup> 参见余德美：《汉语初探：莱布尼茨与大选帝侯身边的中国研究学者》，收录于罗梅君、余德美（主编）：《汉语在德 300 年——走近一个遥远的国度》，《柏林中国研究》第 51 卷，2013 年明斯特出版，第 89-116 页；亦见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卡尔·阿恩德（1838-1902）与汉学的发展》展览手册（2017）。

<sup>37</sup> 同上，第 13 页。

<sup>38</sup> 埃伯斯坦（2007），第 14 页。

这家贸易公司享有的特权包括免税经营，唯一每年可向广州派出两艘商船的公司，为期 20 年。<sup>39</sup>

1752 年，这家受到国王扶植的贸易公司派遣“普鲁士国王”号轮船从皮劳出发经埃姆登首航中国，主要目的地便是广州港。大约一年半之后，这艘船满载茶叶、瓷器、景泰蓝、布料为主的各类货物返回埃姆登。<sup>40</sup>然而，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七年战争导致了普鲁士短暂的东亚贸易的终结。尽管普鲁士自 18 世纪 80 年代起恢复了与东亚的贸易往来，但直到派出所谓的“奥伊伦堡使节团”（1859-1862）之后，普鲁士与中国的关系才活跃起来。普鲁士首次远征东亚就派出了一支舰队前往中国、日本和暹罗（泰国）。该使节团由东普鲁士贵族，后来出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楚·奥伊伦堡伯爵（1815 年出生于柯尼斯堡，1881 年去世）率领，因此也有人称其为东普鲁士奥伊伦堡远征。许多学者和艺术家参加了这次远行，包括画家威廉·海涅和阿尔伯特·贝格，农业专家赫尔曼·马龙，植物学家马克斯·维奇尔，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还有萨克森商会的代表古斯塔夫·施皮斯。对曾在亚洲游历的旅行家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1833-1905，生于上西里西亚奥佩伦县的卡尔斯鲁厄）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前往中国。<sup>41</sup>

---

<sup>39</sup> 凯·弗里穆特：《腓特烈大帝与中国》，2012 年大布尔格韦德尔出版，第 99 页起。

<sup>40</sup> 埃伯斯坦（2007），第 1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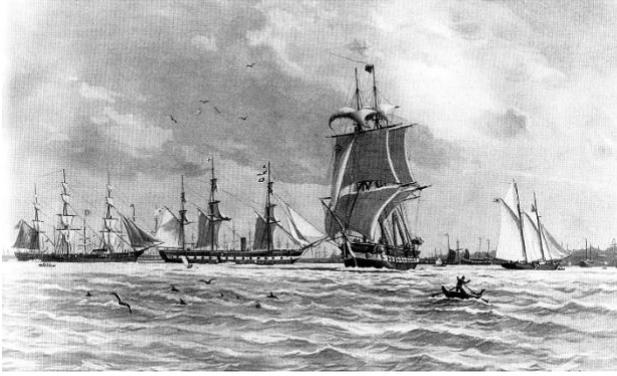
<sup>41</sup> 汉诺·贝克：《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那个时代中国研究者的典范和最著名的地理学家（1833-1905）》，收录于汉诺·贝克：《伟大的地理学家——先锋，异类，学者》，1982 年柏林出版，第 149-16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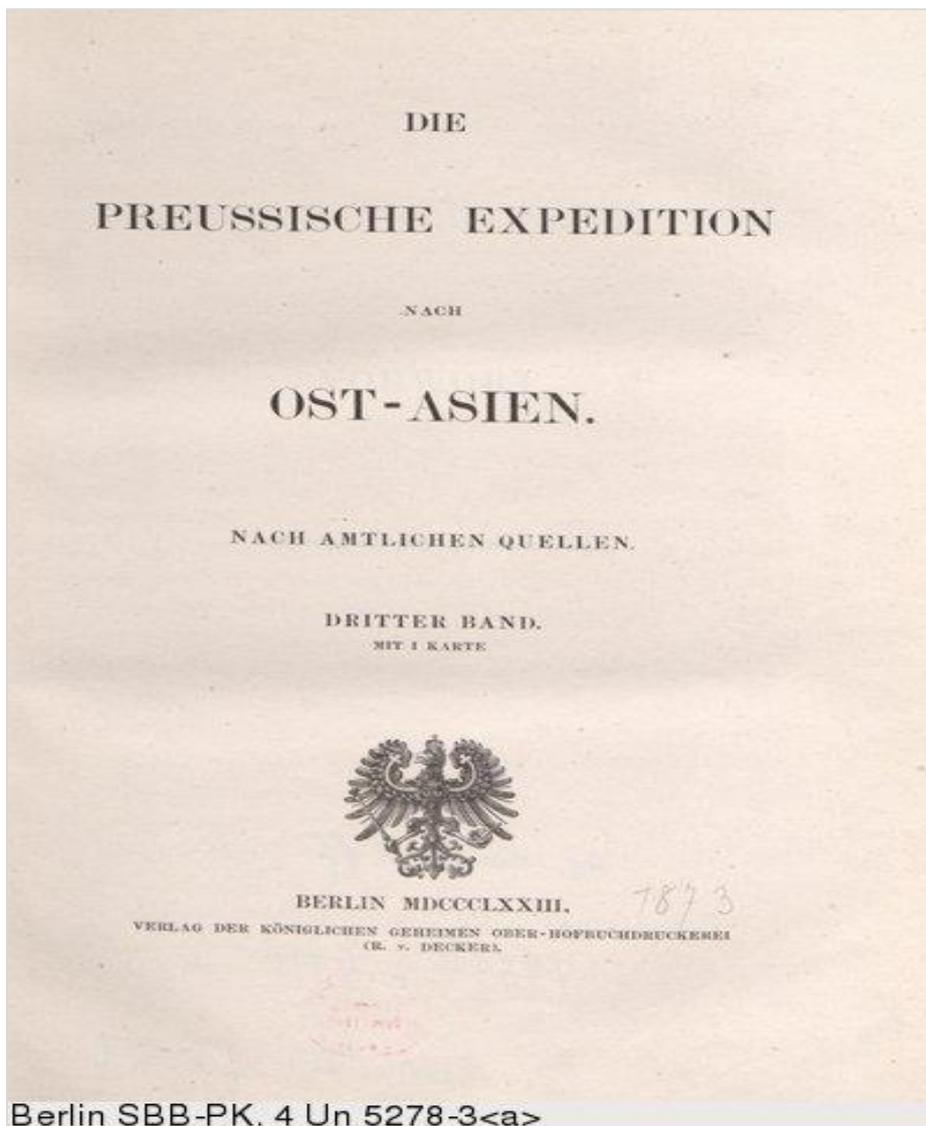
阿尔伯特·冯·奥伊伦堡伯爵



参加普鲁士东亚远征的成员（译者注）



远征舰队



Berlin SBB-PK, 4 Un 5278-3<a>

《普鲁士东亚远征》，官方文献，第3卷（译者注）

这次远征由普鲁士的一支小型海军舰队护卫，目的在于缔结贸易、友好和通航合约。此行最初还图谋占领中国台湾岛作为普鲁士殖民地，但最后证明就此项任务而言，舰队力量太弱，而且这样的行为可能导致无法与中国缔结合约。在法国领事的斡旋下，使节团获得了与英法在鸦片战争后攫取权力同等的待遇和类似的特权，那些载入史册的被视作“不平等”，是为帝国主义施以中国的耻辱的各项协约中国人至今仍记忆犹新。随着《天津条约》（1861）的签订，普鲁士在数个中国港口获得通商权，并在北京设立公使馆，享有领事裁判权，即由德国领事官员对其在华侨民行使法律权利。与此同时，不仅普鲁士，该条约还保障德国关税同盟内所有邦国的对华自由贸易权。<sup>42</sup>

《天津条约》开启了德意志各邦国与中国的官方交往，<sup>43</sup>也标志着德国在这个国家殖民活动的开端。后来出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奥伊伦堡伯爵自东亚归来后就大力主张在中国攫取殖民地。

## 第二节 “哲人国王”腓特烈大帝与中国

普鲁士与中国的关系绝非只带有单纯的经济色彩。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腓特烈大帝或民间俗称的“老弗里茨”（1712-1786），对有关评鉴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执政体系的哲学讨论兴致勃勃，尤其是将中国视为“政治理性之地”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1694-1778），还有因极为推崇中国哲学和“那里的执政智慧”，并将中国作为典范提出国王理当是哲学家的观点而被腓特烈二世的父亲驱逐出哈勒的德国哲学家克

---

<sup>42</sup> 有关东征的文献见古斯塔夫·施皮斯：《1860-1862 普鲁士东亚远征记》，1863 年莱比锡出版；菲利普·楚·奥伊伦堡-赫尔特菲尔德伯爵（主编）：《从弗里茨·楚·奥伊伦堡伯爵的书信看 1860-1862 年的东亚》，1900 年柏林出版。有关东征背景见博尔特·马丁：《普鲁士远征东亚之中国行——1861 年 9 月 2 日缔结之友好、通商与通航条约的由来》，收录于郭恒钰、罗梅君（主编）：《19 世纪至今的中德关系》，《柏林中国研究》第 19 卷，1991 年柏林出版，第 209-240 页；亦见埃伯斯坦（2007），第 175-200 页。

<sup>43</sup> 早期中国关系史参见乌韦·G·法布里泽克：《黄龙与黑鹰——中德关系史》，1973 年慕尼黑出版；博尔特·鲁兰德：《北京德国大使馆——中德百年命运》，1973 年拜罗伊特出版。

里斯蒂安·沃尔夫（1679-1754），对这位普鲁士国王的中国印象及其“哲人国王”的自我设定产生了影响。<sup>44</sup>他理性施政和成为“哲人国王”的构想，不仅归因于对父亲的否定，尽管腓特烈·威廉一世不啻为成功的国家领导者，创建了一个运转良好，繁荣兴盛的国家，但他不是也并不想成为“哲人国王”。另一层原因则在于腓特烈大帝的母亲索菲·多罗特娅·冯·布伦瑞克-吕内堡（1687-1757）收藏于柏林附近蒙比茹行宫的大量远东瓷器，如此氛围下的艺术熏陶激起了他早期对美好艺术和遥远东方的兴趣。腓特烈大帝日后命人在无忧宫的花园里建造了一座“中国楼”，后者可能是原因之一。

这座宫殿以及众多普鲁士王宫里的中式装潢引得17、18世纪普鲁士和东普鲁士贵族们纷纷仿效，用中国的手工艺品，特别是瓷器、彩陶、漆器、漆制家具、丝绸和壁纸（总之关键词就是“中国风”）装饰自己的庄园（参见本章第八节）。这一切无疑要归功于普鲁士的东亚贸易，正因为有了这个渠道，这些货品才越来越多地被运往欧洲。

---

<sup>44</sup> 见凯·弗里穆特（2012）。



波茨坦无忧宫花园里的“中国楼”

腓特烈大帝心目中“哲人帝王”的形象不单源自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哲人为王”的理想，亦或罗马“哲人皇帝”马尔克·奥列里乌斯，而且更多受伏尔泰和沃尔夫所塑造的中国形象的影响。但是，这位国王也绝不会混淆“艺术哲学的中国……与地缘政治中的现实中国。对于后者，他所谋求的并非文化交流，而是商业上有利可图的贸易往来。在腓特烈的意识里由始至终都很明确，有关中国的表述其实是在欧洲当时的理念竞争中表明一种立场，而并不是要从种族角度对一个陌生民族发表令人信服的见解。”<sup>45</sup>

基于上述原因，这位“哲人国王”赋予对华贸易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寄望通过中国以及同这个国家的贸易让普鲁士上升为欧洲的主导势力。<sup>46</sup>

自腓特烈大帝和伏尔泰、沃尔夫两位哲学家起，从积极的哲学视角去看待中国，对普鲁士是一种启迪，使它得以用不同的方式，从多样化的角度去分析研究中国及其文化、思想流派和统治体系。

---

<sup>45</sup> 弗里穆特（2012），第 12 页。

<sup>46</sup> 弗里穆特（2012），第 99 页起。

### 第三节 “义和团战争”与“黄祸”

在1900-1901年的“义和团战争”中，<sup>47</sup>八国列强在德国率领下占领了中国的部分地区。来自东普鲁士达克门的普鲁士将军卡尔·尤利乌斯·冯·格罗斯（1812-1881）之子，尤利乌斯·卡尔·冯·格罗斯，人称冯·施瓦茨霍夫（1850-1901），出任德国远征军总参谋长，负责镇压（义和团——译者注）暴乱，1901年他丧生于北京大本营的一场火灾。任陆军需长的是一位姓葛茨的斯塔卢波嫩人，来自森茨堡的奥托·克罗斯塔（1844-1925）则担任远征军医护事务长。



帝国的宣传：“德国人上前线”

<sup>47</sup> 埃格贝尔特·齐泽：《中国觉醒之时——义和团起义》，1984年埃斯林根、慕尼黑联合出版；又见罗梅君、余凯思（主编）：《对华殖民战争——1900-1901镇压义和团运动》，2007年柏林出版。

“义和团”是一场反抗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不断干涉中国内政行径的运动。这个概念（这里指义和团，亦称义和拳——译者注）起源于参与反抗的民间武装所习之拳术。因针对外国人和外交使节的袭击日益频繁，致使1900年八国联军（德国、俄罗斯、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奥匈帝国）在德国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海因里希·卡尔·路德维希·冯·瓦德西伯爵（1832-1904）的统帅下实施军事干涉。这次军事行动以中国的失败告终，中国因此不得不向各列强作出大量让步。

当年列强对中国的蔑视，在威廉二世著名的“匈奴演说”中可以说是一览无遗，这是1900年7月他在不莱梅港为前去镇压“义和团起义”的德国军队送行之际发表的一段讲话：“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就像一千年前[……]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名也应广布中国，威震千年，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sup>48</sup>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黄祸”的概念应运而生。<sup>49</sup>

---

<sup>48</sup> 引自德国《西北日报》，1900年7月28日。

<sup>49</sup> 关于这个概念见海因茨·戈尔维策：《黄祸——一个流行词的发展史》，1962年哥廷根出版。



“义和团战争”期间的战地明信片

#### 第四节 陆军元帅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男爵：未来在中国

来自东普鲁士拉比奥县比尔肯费尔德（后来的戈尔茨豪森）的威廉·莱奥波德·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男爵（1843-1916），是一位普鲁士陆军元帅、军事理论家和军事作家。1877/78年土耳其人在俄土战争中战败后，德意志帝国派他前往土耳其协助重建和整顿土耳其武装力量。冯·德·戈尔茨前后在奥斯曼帝国生活了十二年，在那里他发现了自己对亚洲的热爱，并判断欧洲将在20世纪丧失其主导地位，让位于美国、日本和中国等新的强权国家。他对日本在日俄战争（1904/05）中取得的胜利印象极为深刻，认为胜利的意志对于一场战争及其结果最终具有决定意义。他反对德意志帝国关于“黄祸”的宣传，屡屡表达自己对亚洲民族的尊重。

自 1897 年起，冯·德·戈尔茨更加关注远东地区的政治发展，多次批评欧洲强权在这一地区的行为，其中包括反对德意志帝国对中国城市青岛的占领，因为这将导致中国的分裂及进一步被削弱。1900 年戈尔茨有意执掌在华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远征军领导权，尽管他在媒体上呼声很高，但指挥权后来还是落入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伯爵之手。戈尔茨对前文提到的德皇送别德国远征军时的“匈奴演说”持异议，同时他批评外国，也包括德国军队在中国的野蛮行为，并认为其企图“值得怀疑”。<sup>50</sup>在他看来，这场战争的首要目的是要在“海外地区”积累军事经验。

1905 年戈尔茨还写道，东方开始觉醒，不会再次陷入沉睡。他推测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像日本及其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一样，给欧洲列强“带来类似惊喜”。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日本、中国和蒙古这些“黄种人”与代表盎格鲁撒克逊强权的美英必有一战，无论德国还是土耳其都无可避免地要加入这场战争。因此，德国有必要了解正在崛起的东亚各民族，从他们的天赋异禀中学以致用。<sup>51</sup>

今天看来，冯·德·戈尔茨相当有远见，因为早在那个年代他就预言了东亚的未来地位，但他又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不单由于他的军国主义思想，更主要是他参与制定了重新安置亚美尼亚人的计划，对驱逐亚美尼亚人持赞同态度，因而成为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民族清洗行为的共犯。

---

<sup>50</sup> 更多细节见卡尔·亚历山大·克雷特洛夫：《陆军元帅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男爵传》，2012 年帕德博恩等地联合出版，第 299-301 页。

<sup>51</sup> 克雷特洛夫（2012）：第 299-308 页；亦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mar\\_Freiherr\\_von\\_der\\_Goltz](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mar_Freiherr_von_der_Goltz)（2019 年 4 月 1 日查阅）。



*Carl von Goeben*

陆军元帅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男爵

### 第五节 德国“保护区”青岛简史

德国帝国主义要求对两名德国传教士（因命人焚毁祖庙等行为）遭（义和团——译者注）“拳民”杀害事件作出补偿，于是中国东海的胶州地区以及港口城市青岛被作为“保护区”于1987年“租让”给德意志帝国，租期99年，成为德属殖民地（“保护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占领青岛，少量德国守军面对英日两国的优势兵力几乎无力抵抗。1914年11月7日，他们在打光最后一发子弹后投降。日军俘虏了大量德国士兵，其中很多来自东普鲁士，这里仅举几例，作为来自斯塔卢波嫩和皮尔卡伦县的兵士代表：威廉·凯迪斯（马利森），弗兰茨·塞昆德（米卢嫩），奥古斯特·帕普克（特雷克纳），威廉·弗里德里希（艾德库嫩）和弗里德里希·维施纳特（以上均来自斯塔卢波嫩县）；还有埃米尔·佩尔勒（威斯伯利嫩，1893-1976）和弗兰茨·普勒威（施图尔门），他们来自皮尔卡伦县。德国战俘（共4700人）被关押在日

本的各个战俘营，直到 1919 年才重获自由。<sup>52</sup>不过大多数德国平民得以留在青岛，继续他们的生意。

埃本罗德地区联盟前任区代表保罗·海纳赫（1925-2012）的一位叔辈，也叫保罗·海纳赫，为了去看看大千世界，1885 年加入德国海军，早在 1911 年，也就是战争前几年因患痢疾在青岛病逝。<sup>5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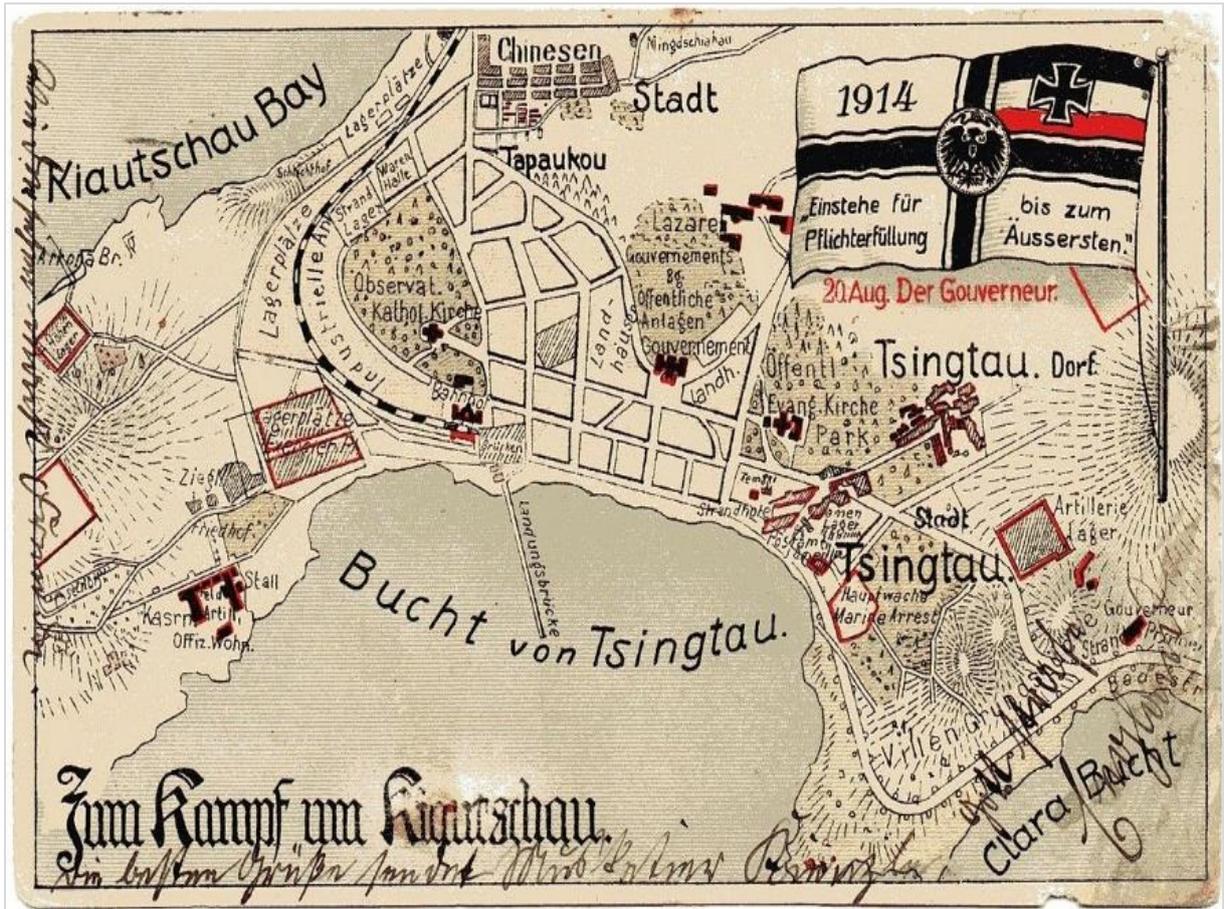


今青岛德国总督官邸旧址

---

<sup>52</sup> 详细名单见《青岛卫士和他们在日本的拘禁岁月（1914-1920）》，汉斯-约阿希姆·施密特历史人物传记项目，<http://www.tsingtau.info/index.html?tsingtau.htm>（2018 年 11 月 28 日查阅）。

<sup>53</sup> 傅丽达·谢勒：《为妻则刚》，收录于赫尔加·特德（主编）：《做杏仁泥的艺术——东普鲁士女性生活故事和她们的烹饪秘方》



1914 年青岛围城图



1914 年德国宣传明信片

说到青岛这座中国城市，克莱佩达，也就是原东普鲁士梅梅尔（今属立陶宛）与它也有渊源，2004年两市结为姊妹城市。

## 第六节 东普鲁士需要劳动力：有关招募和安置中国人的争论

值得一提的是，1894年一位名叫施密特的东普鲁士农场主曾向德意志帝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呈文，提议向东普鲁士“引进”大约20000名中国劳工，以填补农业劳动力向德国新兴工业中心转移后留下的缺口，呈文称中国人是“一个清心寡欲，朴实勤劳的民族”。他随后还向帝国驻北京公使馆发了一封类似的信，请其告知中国人是否适应东普鲁士的气候和那里的工作要求。德国外交部拒绝了这项令人难以接受的要求，可是直到1908年，来自东西普鲁士的相关呈文一直源源不断。据1906年西普鲁士农业协会一项招募中国工人的决议称，此举一方面看起来确属无奈，但另一方面又是绝对必要的，不过内政部最终还是表示，向东普鲁士“引进”中国劳工很“困难”，因此不予考虑。<sup>54</sup>关于“引进”中国劳工的讨论发生在人们就“黄祸论”展开争论的背景下，故而被许多人以种族主义的理由予以拒绝。<sup>55</sup>如弗兰克·奥利弗·索比奇所述，不仅高额的运输成本等因素成为拒绝的理由，还因人们对“中国帮会”心怀恐惧而不免将中国劳工视为“黄祸”。<sup>56</sup>

显然，关于引进中国劳工的社会争论是如此深刻，以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1907年国会选举中以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方式警告不要向东部地区

---

<sup>54</sup> 参见塞巴斯蒂安·孔纳特：《德意志帝国的全球化与民族》，2006年慕尼黑出版，第170-171页。

<sup>55</sup> 见塞巴斯蒂安·孔纳特：《全球化影响：帝国内的流动性与民族》，收录于斯文·奥利弗·米勒、科内柳斯·托普（主编）：《矛盾中的德意志帝国》，2009年哥廷根出版，第415-416页。

<sup>56</sup> 弗兰克·奥利弗·索比奇：《从儒士民族到黄祸——1919年之前德国人所想象的中国人》，载于iz3w（第三世界信息中心）第305期（2008），第42-45页。

“引进”这些劳工，警告人们提防“不讲究的、肮脏的亚洲人，他们将带来各种恶习和疾病”，比如“中国鼠疫”，又或是“杀婴习俗”。<sup>57</sup>

### **第七节 最早飞往中国的航线：东普鲁士对全球化的早期贡献**

1926年由柏林出发经柯尼斯堡和莫斯科到中国的新航线建立之前，中德之间最初的航空邮政往来可追溯至1924年由瑞士经柯尼斯堡、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到中国的这条邮路。柯尼斯堡德瓦机场（建于1919-1921年）是德国第一座民用机场。对东普鲁士而言，航空运输意义非凡，因为《凡尔赛和约》将该省与德国其余领土分离，成为一块东部飞地。

在现有的西伯利亚航线之外，航空先驱埃伦弗里德·君特·冯·洪费尔德男爵（1892-1929，出生于柯尼斯堡）一直想要寻找一条经由印度通往东亚的新航线。1928年9月19日，飞往东亚的飞机由柏林始发，首站加尔各答。由于燃油计算错误和恶劣的天气条件，这架飞机经河内、广州和上海抵达东京，比预计时间有所延迟。<sup>58</sup>身体状况本就不佳的冯·洪费尔德在飞行途中病倒，无法继续飞越太平洋前往美洲，一年后去世。

1937年，在德国和中国之间建立起第一条航空邮路十年后，卡尔·奥古斯特·冯·盖布伦茨男爵与机长罗伯特·翁图赫特、高级无线电技师卡尔·基希霍夫一道，驾驶一架容克 Ju 52/3m 运输机凭借高超的飞行技术发现了一条通往东亚的新航道。途中他们飞越兴都库什和帕米尔山脉，最终将飞机降落在中国古老皇城西安（中国西北省份陕西的省会）。

### **第八节 中国艺术与中国风：东普鲁士王宫，施洛比滕宫和宫内中国藏品阁的结局**

---

<sup>57</sup> 弗兰克·奥利弗·索比奇、塞巴斯蒂安·毕硕夫：《东普鲁士的“中国鼠疫”——1907年的“野蛮选举”中社民党人如何在东部省份争夺选票》，收录于乌尔里希·范·德·海登、约阿希姆·策勒：《这个国家的殖民主义》，2008年埃尔福特出版，第190-194页。

<sup>58</sup> 埃伦弗里德·君特·冯·洪费尔德男爵：《我的东亚航程——柏林-东京世界首飞》，亚历山大·洛西林根据洪费尔德的记录及K.G.林德乐的报道完善编辑，1929年柏林出版。

“中国风”代表的是一种 17、18 世纪早期风靡欧洲，以效仿中国或日本艺术模式为主的艺术潮流，在当时的许多宫殿里都可见以中国或中式艺术品和手工艺品（墙纸、地毯、瓷器、丝绸、漆器、家具等）做装饰的“中国厅”。这种对中国艺术的仰慕某种程度上来自那个时代盛行的对中国抱有的幻想，那是一个遥远、文明却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知的帝国，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社会成员和官员。欧洲以及普鲁士的对华贸易就是要将中国艺术和最精美的奢侈手工艺品带到欧洲市场。由于真品价格昂贵，加之需求庞大，17、18 世纪人们转而在欧洲开办工坊，仿造中国艺术品，或者干脆只是简单地模仿。



“中国风”：欧洲人发挥自由想象创作的中国皇帝像

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除了中国的异域风情，应该还有马可·波罗（约 1254-1324 年）等耶稣会传教士，以及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0-1754），法国的让-雅克·卢梭（1712-1778）和伏尔泰等哲学家对中国政治社会状况一定程度上的理想化。伏尔泰曾在腓特烈大帝的宫廷供职数年，无疑影响到对后者心中的中国形象。<sup>59</sup>

东普鲁士的那些王宫，一方面是普鲁士国王们前往东普鲁士时与其身份相当的下榻之所，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东行的理由，吸引他们的一部分原因就是那里的中国手工艺品收藏和中国风情：例如拉斯滕堡附近原大沃尔夫斯多夫的登霍夫施塔特宫就有一间很出名的“中国厅”；冯·多纳-施洛丁庄园的施洛丁宫内建有中式茶舍；还有原罗森伯格县（东西普鲁士交替管辖）境内的芬肯斯泰因宫，它的“中国大厅”里摆放着中国古董家具，装饰有皮质壁纸，金色的背景上绘制着中式图案。<sup>60</sup>

这些宫殿中，马祖里（原普属荷兰行省）多纳伯爵的巴洛克式施洛比滕宫曾是东普鲁士早期最美的宫殿之一，因有一处“中国藏品阁”而尤其出名。这座宫殿是后来成为陆军元帅的亚历山大·楚·多纳（1661-1728）的授意建造的，工期长达 40 年（1696-1736），极尽奢华。室内装饰由多位著名艺术家操刀设计，有来自但泽的雕塑家和石膏造型师约瑟夫·安东·克劳斯（1721 年前后去世），他主要在东普鲁士从事创作，并曾为著名雕塑家和建筑师安德烈亚斯·施吕特（1659 年前后出生于但泽，1714 年在圣彼得堡去世）工作（施吕特曾在柏林城市宫的设计和建造中发挥重要作用）；另外还有画家乔万尼·B·沙尼斯（1719 年去世）以及荷兰雕塑

---

<sup>59</sup> 参见马来科·孟勒：《辩论与装饰——17 至 19 世纪中欧对中国的接受》，2018 年比勒菲尔德出版；马丁·沃斯勒：《在异域风情，中国中心主义与中国风/欧洲风之间》，第 3 次修订版，2006 年波鸿出版。

<sup>60</sup> 《被遗忘的东普鲁士宫殿》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影片，运用虚拟复原手段，辅以时代见证者的讲述，向观众展示宫殿原貌。<https://www.planet-schule.de/sf/filme-online.php?film=10376&reihe=1505>（2019 年 8 月 2 日查阅）。

家约翰·布罗门德尔（1650 至 1707 年前后），据说施吕特也亲自参与过房间的装饰设计。这座宫殿是普鲁士国王莅临东普鲁士期间一处合适的下榻地，因其富丽堂皇的彩色壁毯和天顶绘画，尤其是“中国藏品阁”而闻名遐迩，阁内陈列的大量中国瓷器、丝绸绘画和刺绣以及中式物件，是德国最丰富的收藏之一。1945 年 1 月，宫殿在苏联红军点燃的大火中付之一炬，仅余断壁残垣，所收藏的艺术珍品部分被转移，现分散陈列于柏林夏洛滕堡宫“多纳厅”等多家博物馆，而中国藏品阁的艺术品仅有很少一部分得以留存。<sup>61</sup>

曾经批判伊曼努尔·康德的著作，在中国也鼎鼎有名的大哲学家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1768-1834）曾在这座宫殿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1790-1793）。<sup>62</sup>

## 第九节 “记忆文化的伦理层面”：纳粹主义与东普鲁士犹太人逃亡上海

纳粹掌权后，大量犹太公民——只要还有可能——都被迫离开东普鲁士逃往中国。<sup>63</sup>东普鲁士与中国之间的这段渊源是德国，也是东普鲁士记忆历史及其记忆文化伦理层面的核心组成部分。

---

<sup>61</sup> “中国厅”数字复原影像见 Facebook 网站

<https://www.facebook.com/Ostpreussen/posts/10153466045931014>（2019 年 4 月 11 日查阅）及 Youtube 网站 [https://www.lr-online.de/serien/lausitzer-geschichte/einblicke-ins-ehemalige-schloss-schlobitten\\_vid-8192481](https://www.lr-online.de/serien/lausitzer-geschichte/einblicke-ins-ehemalige-schloss-schlobitten_vid-8192481)（2019 年 4 月 12 日查阅）；又见卡尔·格罗梅尔特、克里斯汀·冯·梅尔滕斯：《多纳的施洛比滕宫》，第 2 版，1962 年斯图加特出版。

<sup>62</sup> 参见君特·梅肯施托克：《决定论伦理与批评神学——1789-1794 施莱尔马赫早期对康德与斯宾诺莎的研究》，1988 年柏林、纽约联合出版。

<sup>63</sup> 阿夫拉罕·奥特曼、伊莲娜·埃伯共同撰写的《1938-1940 逃亡上海：一次大规模人员安置》一文立足德国犹太人逃亡上海的史实，对政治背景与各种纠葛作了很有意思的分析，[https://www.yadvashem.org/download/about\\_holocaust/studies/altman\\_eber\\_full.pdf](https://www.yadvashem.org/download/about_holocaust/studies/altman_eber_full.pdf)（2019 年 4 月 3 日查阅）。

尽管总体而言东普鲁士的犹太公民占比相对较小（仅占居民人口的0.5%），但在柯尼斯堡有德国举足轻重的一个犹太社区，那里生活和活跃着一大批著名的犹太学者和商人。<sup>64</sup>

与德国或欧洲其他地区不同，柯尼斯堡的犹太人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因为 1812 年的《普鲁士犹太敕令》至少规定犹太人在普鲁士的部分地区（包括东普鲁士）享有部分平等地位，1847 年的《犹太人状况法规》使他们有机会担任公职（司法、警察和行政职位除外）和应聘教授，同时保障他们的居住自由，这是他们迈向平等公民权的重要步骤。<sup>65</sup>因此，许多犹太家庭最初认为，鉴于自身的“德意志性”，他们不会像德国其他地区的犹太人那样受到迫害，但很快就证明这是一个谬论。出生于德国的女哲学家里夫卡·霍维茨（1926-2007，去世于耶路撒冷）在其主编的一本书中这样写到：

“面对（纳粹的）这种排挤，德国犹太人只是更加积极地加深他们对德意志文化的认同和坚定自己的德意志信念。因此，1930 年 6 月在国会前举行的一次反对纳粹主义兴起及其在图林根州的种族政策的抗议示威上，中央协会的法律顾问阿尔弗雷德·维纳能够坚定自豪地宣称：‘如果有诺贝尔德意志信念奖，德国犹太人应当当之无愧。’当然，德国犹太人所坚守的是一个特定的德国形象：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文化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德国，是古典诗人和思想家在愿景里构建的德国，无论在正统派还是自由派犹太人的心目中，树立对都是这样的形象。世界大战期间，康德之城科尼斯堡曾有一次处于沙皇军队的威胁之下，犹太教正统派领袖伊萨克·布罗伊尔满怀爱国主义情怀地在日记中写道：‘你怎愿

---

<sup>64</sup> [http://www.judeninostpreussen.de/front\\_content.php?idcat=440](http://www.judeninostpreussen.de/front_content.php?idcat=440)（2018 年 11 月 28 日查阅）。柏林犹太启蒙运动的领导者大卫·弗里嫩德（1750-1834）就来自这里。

<sup>65</sup> 参见安娜格雷特·赫蕾娜·博拉莫：《1812-1847 年普鲁士的犹太人政策与犹太人立法及对 1869 年北德联邦〈平等法〉的展望》，1987 年柏林出版。

意，又怎能愿意让俄国沙皇和他的哥萨克骑兵闯入那座神圣的城市？那座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你的康德的印迹的城市？当歌德和席勒的子民为了生存而艰苦奋战时，你能袖手旁观吗？’ ”<sup>66</sup>

然而，对“德意志”的告白完全于事无补，到1941年已约有18000名欧洲犹太人逃往上海，因为这座城市不需要签证。<sup>67</sup>“德国犹太人帝国联合会”在东普鲁士各地专门组织报告会，提供信息帮助有需要对人作逃亡准备。<sup>68</sup>“哈尔滨-上海远东犹太中央情报局”还为那些想尽快离开德国前往中国的人介绍工作，其中也有不少来自东普鲁士的犹太人。<sup>69</sup>

此外，日本曾在当年的科尼斯堡设有一个领事馆（1941-1945），迫于东普鲁士犹太人的压力，领事杉原千亩（1900-1986）违反日本签证条例，为他们签发了可以前往日本或中国日占区的签证。<sup>70</sup>有意思的是，上世纪30年代末，当时的中国政府曾考虑要为欧洲的犹太难民提供帮助，但由于人数众多，打算将他们安置在西南部云南省的中缅边境附近。<sup>71</sup>

---

<sup>66</sup> 引自里弗卡·霍尔维茨：《犹太思想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抗之声》，载于《利奥·贝克学院年鉴》第33卷第1期，1988年1月，第244页。经克莱门斯·亨勒提示笔者查阅此文献，谨表谢忱。

<sup>67</sup> 见《1938-1947 流亡上海——犹太人的流亡生活》，格奥尔格·阿尔穆布吕斯特、米歇尔·科尔斯特鲁克、荣亚·米尔贝格整理编辑，并首次发行收录有日本外事警察厅提供的外国人名单的CD光碟，共14800条记录（柏林阿克提斯博物馆系列出版物），2000年特兹出版；亦见弗兰西斯·克莱斯勒：《流亡上海：疑问与主要话题》，收录于郭恒钰、罗梅君（主编）：《19世纪至今的中德关系》，《柏林中国研究》第19卷，1991年柏林出版，第293-314页。

<sup>68</sup> 露特·莱泽洛维茨：《“要是这场丑陋的战争能过去”——东普鲁士犹太人的生活（1939-1943）》，发表于《这里曾经是我们的家乡……》，逃亡、驱逐及和解基金会、欧洲被杀害的犹太人纪念碑基金会2011年11月2日至3日柏林国际会议论文集，2013年柏林出版，第115-124页，

<https://jewsineastprussia.de/wp-content/uploads/2018/11/Juden-OP-Provinz-Holocaust.pdf>（2019年1月27日查阅）。历史学家露特·莱泽洛维茨撰写发表了大量关于东普鲁士历史和当地犹太人生活的文章，如：《失而复得——1945年之后的东普鲁士》，2000年海德堡出版；（合著）《梅梅尔手册：战后50年史》，2002年柏林出版；《从东普鲁士到屈里茨：去往勃兰登堡的野孩子们》，2003年波茨坦出版；《野孩子：梅梅尔河畔的偷渡者》，2004年第4版（扩展版）；《1944-1948东普鲁士命运之年》，2004年柏林出版；《安息日烛台与战争协会：1812-1942东普鲁士与立陶宛边境地区的犹太人》，2010奥斯纳布吕克出版。

<sup>69</sup> [http://cahjp.nli.org.il/webfm\\_send/597](http://cahjp.nli.org.il/webfm_send/597)（2019年4月22日查阅），该网页提供人名及地名名单供查询。

<sup>70</sup> 海因茨·埃伯哈尔特·茂尔：《日本与犹太人——1933-1945纳粹时期日本帝国的犹太人政策考》，波恩莱茵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哲学学部博士论文，2000年波恩，第174-176页，<http://hss.ulb.uni-bonn.de/2000/0225/0225.pdf>（2019年1月27日查阅）。关于杉原千亩其人见

[https://de.wikipedia.org/wiki/Chiune\\_Sugihara](https://de.wikipedia.org/wiki/Chiune_Sugihara)（2019年4月22日查阅）。关于日本在上海的涉犹政策见茂尔（2000），第102-113页。

<sup>71</sup> 见阿龙·夏伊：《中国曾有意拯救欧洲的犹太人》，载于《明镜日报》，2017年10月8日，<https://www.tagesspiegel.de/wissen/nationalsozialismus-china-plante-die-rettung-der-juden-europas/20418446.html>（2019年1月27日查阅）。

2019年3月，我与妻子曾前往非常值得一看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参观。上世纪50年代初，几乎所有难民都离开上海前往以色列、美国或澳大利亚等国，纪念馆通过陈列他们遗留下来的物品，或其子孙后来捐赠的遗物，加之影像记录，对当事人的采访资料 and 大量文献照片，展现了难民抵达上海后的艰难处境。当年，他们离开德国时不允许携带超过十帝国马克的钱财，这使他们抵沪后的生活极为窘迫。

在纪念馆内的小书店，我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历史爱好者，上海人，是引导中国旅游团参观纪念馆的志愿者。在攀谈中我告诉他自己在写一本关于东普鲁士与中国关系史的书，其中也涉及到东普鲁士犹太人被驱逐，有一部分人来到上海的历史。令人惊讶的是，他对东普鲁士，对那里的犹太公民遭驱逐和被上海收容接纳的情况非常熟悉。至于我提到的问题，尽管不是了解所有细节，但有许多他都知道。他对我说，东普鲁士很伟大，在中国广为人知——这再次说明在中国人的接受认知里东普鲁士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欧洲犹太难民在上海的旧居（2019）

从东普鲁士流亡至中国的犹太公民有：

- 蒂尔西特著名妇科医生和慈善家塞加尔之子赫尔伯特·塞加尔，他是蒂尔西特城市乐团的小提琴手，20世纪30年代末流亡中国。
- 还有许多举家逃亡到上海的犹太人，已知姓名的有来自因斯特堡的尤利乌斯·马尔科夫斯基和阿图尔·马尔库斯，来自格罗斯库恩的所罗门·埃希特家族，来自蒂尔西特的阿图尔·罗韦尔斯基家族，来自贡宾嫩的林登斯特劳斯家族，以及经营皮货生意的亚伯拉罕·莱泽洛维茨家族。此处所列不过是因纳粹迫害而失去家园的犹太家庭中的寥寥数例，<sup>72</sup>从东普鲁士北部著名贸易城市蒂尔希特也有许多犹太人逃到了上海。<sup>73</sup>

华沙德国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博士教授露特·莱泽洛维茨女士（1958年出生，本姓基贝尔卡）在我询问其丈夫的家族与上文提到的亚伯拉罕·莱泽洛维茨之间是否有关系时回信写道：“亚伯拉罕·莱泽洛维茨是我丈夫的叔祖。生活在蒂尔西特的一家人1939年和两个已成年的孩子一起流亡到上海。艾丽卡·莱泽洛维茨当时已嫁给柏林的皮肤科医生瓦尔特·赫尔特，据说他1944年曾使用过以下地址：中国上海，昆平路305/10号。她的弟弟，钢琴演奏家赫尔伯特·莱泽洛维茨据说（家族传说）还给蒋介石（1887-1975，时任中华民国总统，1949年内战兵败后被迫撤退到台湾岛——作者注）的（某个）儿子上过钢琴课。”<sup>74</sup>

---

<sup>72</sup> 参见杰瑞·林登斯特劳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从东普鲁士经上海到哥伦比亚，再到纽约：1929-1999 犹太家族史》，1999年康斯坦茨出版。

<sup>73</sup> 2011年基尔和苏维埃茨克（原蒂尔西特）曾举办过一场《犹太人在蒂尔西特》的展览，目的在于重拾这座城市曾经被抹去的犹太面貌。见 [https://kehilalinks.jewishgen.org/sovetsk/Tilsit\\_Jews\\_files/Tisit-Juden.pdf](https://kehilalinks.jewishgen.org/sovetsk/Tilsit_Jews_files/Tisit-Juden.pdf)（2018年11月28日查阅）。有关蒂尔西特的犹太人历史见露特·莱泽洛维茨教授的详细报告：《蒂尔西特和这里的犹太人》，[https://kehilalinks.jewishgen.org/sovetsk/Tilsit\\_Jews.html](https://kehilalinks.jewishgen.org/sovetsk/Tilsit_Jews.html)（2019年3月28日查阅）。

<sup>74</sup> 信息来自莱泽洛维茨教授2019年4月2日邮件。赫尔伯特·莱泽洛维茨在20世纪40年代给蒋介石之子钢琴课的传言不太可信。蒋公之子蒋经国（1910-1988）1937年从苏联回到中国后先是在江西省政府任职，1943年调任重庆中央政府。且不说其所在地与上海距离遥远，繁忙的公务也令他无暇学习钢琴。若确有其事，那么跟随莱泽洛维茨习琴的可能是蒋经国的儿子，他们当中倒是有一人20世纪40年代初在上海生活。

现居加利福尼亚的英格丽特·鲁本斯 1939 年年纪尚小，也不得不随父母一起从东普鲁士逃到上海，在她的记忆里，日本占领者设在上海的犹太人区“没人清运垃圾，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日本人也总找麻烦，令我们举步维艰”。<sup>75</sup>尽管如此，犹太难民们仍然对上海这座城市心怀无尽感激，因为这是第一个，起初也是唯一一个允许欧洲犹太难民进入的城市。<sup>76</sup>

艾伦·艾斯纳-威斯（1945 年出生于上海）的祖辈世代居住在科尼斯堡，她母亲的家族成员里有好几位是富有的大农场主。如前所述，鉴于自身与“德意志性”之间紧密的联系，柯尼斯堡的许多犹太人认为他们能够免遭迫害，可最终证明这是谬论。艾斯纳-威斯家族也曾长期对此深信不疑，直到他们意识到柯尼斯堡不会是个例外，才迫不得已离开东普鲁士逃往上海。由于临行前艾伦的父母不得不将所有财产都留下，在上海父亲只能靠修理无线电设备和自行车养家糊口。日本人战败上海被解放以后，他为美军工作。对这个家庭而言，姐姐因患病疾病亡无疑是又一场悲剧。出生在上海的艾伦“没有国籍”，也因为她的出生全家推迟了离开上海的时间，直到 1948 年才得以前往旧金山。2008 年，艾伦终于成功恢复了自己的德国国籍。<sup>77</sup>

索尔道（今贾乌多沃，原东普鲁士内登堡县）奥奇茨基家族的马克斯和瓦尔特两兄弟的经历同样再现了纳粹统治下德国，更确切地说是东普鲁士犹太人坎坷的生活与苦难史。

马克斯·奥奇茨基 1903 年 5 月 18 日出生在东普鲁士的索尔道，父亲是大卫·奥奇茨基，母亲是莉娜·奥奇茨基，他有五个兄弟姐妹和一个异

---

<sup>75</sup> 人民网《加州犹太人社区回忆二战期间的中国避风港》，2019 年 1 月 28 日，<http://en.people.cn/n3/2019/0128/c90777-9541882.html>（2019 年 3 月 12 日查阅）。

<sup>76</sup> 同上。更多关于东普鲁士犹太公民及其历史的内容见《东普鲁士的犹太人——历史与文化社会》，<https://jewsineastprussia.de/>（2019 年 3 月 14 日查阅）。

<sup>77</sup> 《犹太难民在上海》，明尼苏达大学，艾伦·威斯主编，<http://confucius.umn.edu/jewish-refugees-in-shanghai/minnesota-connection/>（2019 年 3 月 16 日查阅）。

母（也可能是异父，原文表述不详——译者注）的姐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索尔道成为波兰的一部分，因其父母希望在德国生活，他们举家迁往柏林。马克斯·奥奇茨基在那里接受训练成为一名打击乐手。上世纪20年代末，他接掌了自己的乐团，主要在柏林的舞会和一些著名的小型歌舞剧院登台演出。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被帝国音乐协会除名，并被禁止从业。马克斯·奥奇茨基和随他学习打击乐器的弟弟瓦尔特（1912年出生于索尔道），在热那亚登上一艘轮船，于1939年4月抵达香港后暂居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马克斯被港英政府当作“敌方外国人”拘留，虽然两个月后获释，却因其德国国籍于1940年被驱逐至上海。由于工作机会稀少，他生活无着，还患上心脏病。纳粹政府的一纸公告令他连德国公民的身份也失去了，作为一名无国籍难民，他不得不栖身于与贫民窟无异的虹口犹太人区。1944年马克斯曾在当时华德路（今长阳路）的帝国咖啡馆做过一段时间鼓手，战争结束后其职业状况略有改善，曾在威赛路（今霍山路）的吉祥甜品餐厅与不同的乐队合作登台演出。马克斯·奥奇茨基是“上海音乐家协会”多年的成员，1948年被任命为这个职业协会的副主席。一年后，他携妻儿先是去了美国，却因未能获得那里的永久居留又前住意大利，同年被以色列的一所难民营接纳，直到1950年获准移民加拿大，其时他的弟弟瓦尔特已经在那里定居。马克斯·奥奇茨基，到美国后自称马克斯·奥斯本，1988年4月7日在佛罗里达去世，他的弟弟瓦尔特早在1973年就已在美国去世。<sup>78</sup>

1938年被毁的柯尼斯堡犹太大教堂后来在加里宁格勒重建，2018年重新隆重开放。<sup>79</sup>据当年的统计，加里宁格勒地区（原东普鲁士北部俄属区

---

<sup>78</sup> 见《纳粹时期受迫害的音乐家名录》，汉堡大学，[https://www.lexm.uni-hamburg.de/object/lexm\\_lexmperson\\_00002116](https://www.lexm.uni-hamburg.de/object/lexm_lexmperson_00002116)；同上，[https://www.lexm.uni-hamburg.de/object/lexm\\_lexmperson\\_00006749](https://www.lexm.uni-hamburg.de/object/lexm_lexmperson_00006749)（2019年4月22日查阅）。有关犹太难民在生活的的生活见杨内斯特·G.赫普纳：《逃亡地上海：回忆1938-1948》，1998年波恩出版。

<sup>79</sup> 参见罗尼·卡布斯：《东普鲁士的犹太人》，吕纳堡东普鲁士国家博物馆主编，1998年胡苏姆出版；布丽吉特·耶格-达贝克：《东普鲁士犹太人的生活——一个伟大文化的历史与没落》，Kindle电子书，2013。

域) 大约又生活着 5000 名犹太人, 其中 2000 人居住在加里宁格勒市(原柯尼斯堡)。<sup>80</sup>

## 第十节 朱敏事件与东普鲁士集中营

朱敏(1926-2009)是中国红军具有传奇色彩的创始人、后来的人民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朱德元帅(1886-1976)的独生女, 而朱敏事件也是记忆历史伦理层面的一个特别案例。1941年, 她与另外 20 名中国孩子一起来到莫斯科以北 300 公里的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疗养学习。因患哮喘她在 1941 年被送往明斯克疗养。德军占领明斯克后, 她先是和其他女学生一起被关进一所孤儿院, 一年后又连同另外 5 个孩子被德军投入东普鲁士的一座集中营(幸而未被认出是朱德的女儿), 被迫做苦役, 直到 1945 年(苏联)红军攻占东普鲁士后被解救。<sup>81</sup>

在回忆录中朱敏这样写道:

“但对我们来说……鞭打、流血和死亡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 不会再对我们有什么触动。经常遭受暴行, 使我们变得越来越麻木, 最终我们既不知痛苦, 也不知快乐, 不知生, 也不知死。自从离开明斯克的孤儿院, 我就失去了生存的感觉。在所有的痛苦中, 饥饿是最糟糕、最难以忍受的。尤其因为我们还是孩子, 还在成长……如果问集中营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饥饿。”<sup>82</sup>

---

<sup>80</sup> 《德语区犹太族群历史考——柯尼斯堡》, <http://www.xn--jdische-gemeinden-22b.de/index.php/gemeinden/k-l/1093-koenigsberg-ostpreussen> (2019年6月5日查阅)。

<sup>81</sup> 《朱德之女朱敏: 纳粹集中营里死里逃生的“红樱桃”》,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617/c85037-25158652.html> (2018年11月28日查阅); 又见朱敏: 《“活着离开集中营, 好像一个童话”——回忆在东普鲁士纳粹集中营做苦役》, 载于《柏林中国期刊》, 2002年第21期, 第74-94页。集中营具体名称不详。

<sup>82</sup> 朱敏(2002): 第80页。



朱敏和另两名被关押者，一名看守摄于东普鲁士集中营

她还要忍受集中营医生的野蛮行为和他的种族歧视：“你从哪里来？”集中营医生问朱敏，她继续写道：

“‘我是中国人，来自……’我的解释被冷冰冰的声音打断了。‘哦，中国人，黄皮肤的中国人，东亚病夫……哈！哈！’……在这个恶魔的眼里，我的实验价值甚至还不如一只小白鼠，我不过是来自‘东亚病夫之国’的尚在呼吸的动物。”<sup>83</sup>

---

<sup>83</sup> 朱敏（2002），第 88 页。



朱敏和父亲朱德元帅

最终朱敏能这座地狱死里逃生，真是万幸。

## 第六章 东普鲁士、汉学与传教活动：汉学领域与传教史上的记忆形象

### 第一节 作为文化中间人的东普鲁士汉学家

在汉学（中国学）发展史上，不乏出类拔萃的东普鲁士学者，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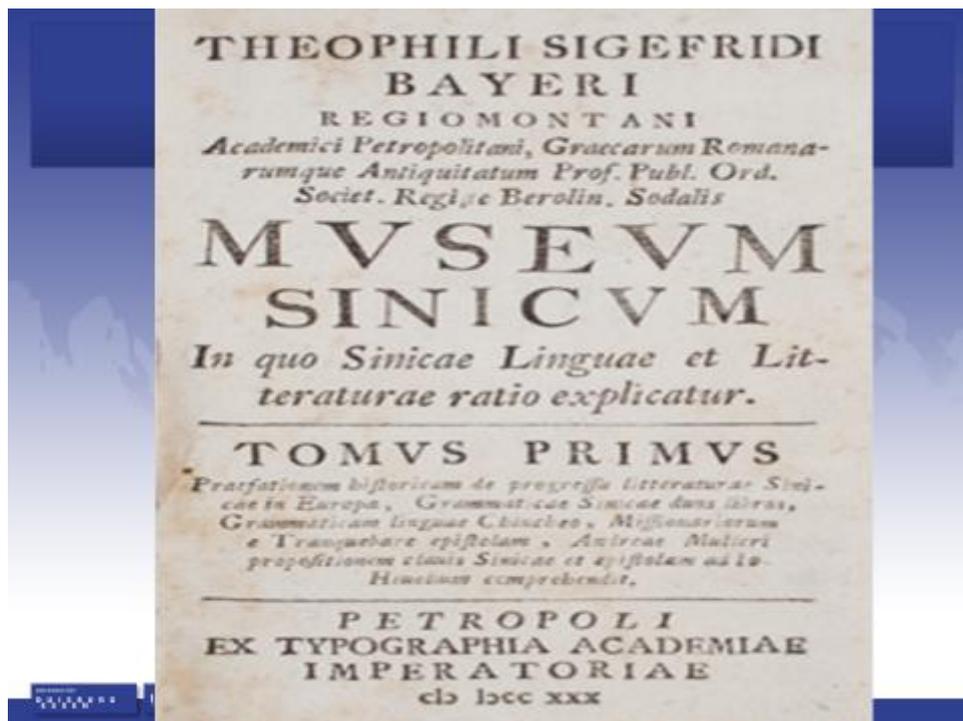
- 哥特利布·希格弗里德·巴耶尔（1694-1728），出生于柯尼斯堡，1717年起在柯尼斯堡大学任图书管理员，后在圣彼得堡任古代文化研究与东方语言教授。巴耶尔被视为“那个时代的第一位汉学家”，也是撰文介绍中国发展等状况的第一人，因此可以算是欧洲汉学的奠基人之一。巴耶尔不仅当选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自1730年起还是普鲁士科学院的编外院士。<sup>84</sup>



哥特利布·希格弗里德·巴耶尔

---

<sup>84</sup> 约翰·W·福克：《哥特利布·希格弗里德·巴耶尔》，出自《新编德国人物传记》，第1卷，1953年柏林出版；龙伯格：《汉学先驱巴耶尔（1694-1738）》，1986年伦敦、马尔默联合出版（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所专著系列，第54卷）。



巴耶尔的文章

- 卡尔·阿恩德教授（1838-1902）出生于柯尼斯堡一个皈依了基督教的古老犹太家庭。作为 19 世纪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阿恩德是首位在德国大学，即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今洪堡大学（1887）研究现代汉语的教授。他编撰了首部德文汉语教材，创造出一套自己的音标体系，还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官话手册》里对标准汉语的语音作了全面研究。同时，他也是引领汉语教学及当代中国研究走上专业化道路的学者。转向学术研究之前，他在一位中国学者的帮助下通过实践掌握了这门语言，后作为领事和翻译在中国任职长达 22 年之久。<sup>85</sup>1865 年阿恩德在北京普鲁士驻华公使馆担任翻译，但很快他就跻身中德关系的重要缔造者之列，因为涉及两国关系的文稿，他不单是译者，还是起草者之一。

<sup>85</sup> 参见罗梅君：《殖民政策与知识生产：卡尔·阿恩德（1838-1902）与汉学的发展》，《柏林中国研究》第 55 卷，2017 年柏林出版；罗梅君：《卡尔·阿恩德与现代汉语课程的专业化》，载于罗梅君、余德美（主编）：《汉语在德 300 年——走近一个遥远的国度》，《柏林中国研究》第 51 卷，2013 年明斯特出版，第 89-116 页；亦见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卡尔·阿恩德（1838-1902）与汉学的发展》展览手册（2017）。



卡尔·阿恩德教授

- 哲学家、印度学家和汉学家李华德教授（1886-1982）也出生于柯尼斯堡的一个犹太家庭，他是最早重点研究中国佛教历史和哲学的学者之一，并将大量中文哲学著作译成德语。在研究工作中他形成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中国各佛教派别并非建立在对印度佛教观点的简单接受之上，而是很大程度地受到中国道教的影响，因而实现了本土化。<sup>86</sup>

20 世纪 20 年代李华德接触到佛教，这促使他先后在柏林、马尔堡、海德堡、哈勒和布雷斯劳等地研习帕利语、梵语、藏语和汉语。1933 年博士毕业后，因其犹太出身最终无法在德国大学谋得教职，被迫流亡中国。1934 年，李华德先是在享有盛誉的北平燕京大学中印研究所工作，后经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胡适（1891-1962）举荐在北京大学教授梵语和德语。日本占领中国部分领土后，北大迁往

---

<sup>86</sup> 《李华德及其中国佛学研究》（网易佛学），  
<http://foxue.163.com/16/1018/21/C3MLGN2I03240LQR.html#>（2019 年 4 月 3 日查阅）。

长沙和昆明，他也随迁至云南省会昆明，和家人一起在城郊一座村庄生活了两年。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随学校重返北京，并出版其重要译著《肇论》。<sup>87</sup>1952年，李华德离开北京，前往位于印度圣迪尼克坦的维斯瓦-巴拉蒂大学（又译印度国际大学——译者注），担任中印研究所所长，继续深入研究中国佛教。其夫人去世后，他于1958年回到欧洲，执教于巴黎索邦大学，随后以77岁高龄定居图宾根，并在当地大学任教直至去世。1965年图宾根大学授予李华德，这位20世纪最重要的佛学研究者之一，“中国佛学”荣誉教授称号。<sup>8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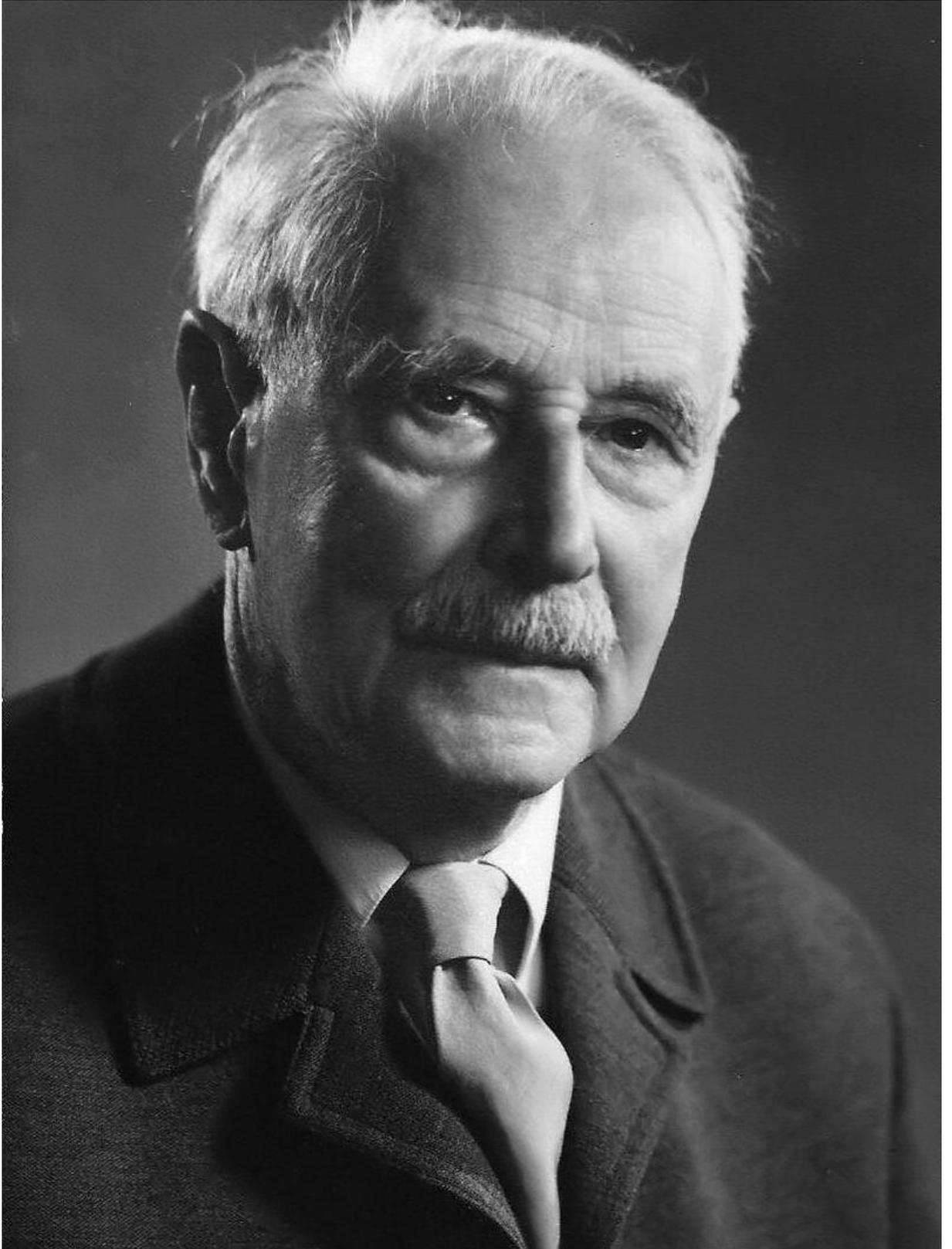
李华德的家族是一个努力融入德国主流社会（但最终还是徒劳无功的）的实例。其父罗伯特·列本塔尔娶基督徒为妻，皈依新教，并让子女受洗，与犹太社区决裂。可纳粹掌权后，这位律师兼公证人被禁止从业，并同所有犹太人一样遭到排挤与迫害，后在流放前不久去世。<sup>89</sup>

---

<sup>87</sup> *The Book of Chao*, 李华德译, 《华裔学志》专著第13卷, 1948年北京出版。

<sup>88</sup> 参见罗梅君等（主编）：《李华德和他的中国佛教研究：浪迹天涯的学术人生》，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展览手册，2015年柏林。

<sup>89</sup> 罗梅君等：《李华德和他的中国佛教研究》，出处同上。



李华德教授

- 出生于梅梅尔县普列库莱的恩斯特·柏石曼教授（1873-1949，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皮尔卡伦居住）多次来华，是首位对中国建筑

进行考察记录的人。他曾就读于柏林夏洛腾堡技术大学建筑专业，1902至1904年任驻华德国东亚远征军建筑督查。在华期间，他对中国建筑产生兴趣，多次借旅行之机对此进行勘考记录。1904至1906年柏石曼在约翰尼斯堡县奥日什任建筑督查。1906年，他以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顾问”的身份开启第二次考察之旅，足迹遍布当时18个省中的14个，积累了大量关于中国建筑的资料。<sup>90</sup>他所搜集的这些资料后来都被纳入其首部著作《中国人的建筑艺术与宗教艺术》（三卷本，1911至1931年间出版）。此外，柏石曼还竭力想要在中国建立一所德国研究机构，以促进德国的在华研究工作。<sup>91</sup>一战期间，他任柯尼斯堡部队建筑管理局局长，1921年赴柏林任职，1925年获得在夏洛腾堡技术大学任教的机会，1927年被聘为教授。1933至1935年，为了丰富现有资料储备，他第三次前往中国。二战结束后，柏石曼在汉堡大学汉学系代理教授一职，直至正式人选到位。去世后，他的部分图书收藏被科隆大学艺术史研究院接收，纳入大学与市立图书馆馆藏书目，其学术遗产被保留于科隆大学档案馆。<sup>92</su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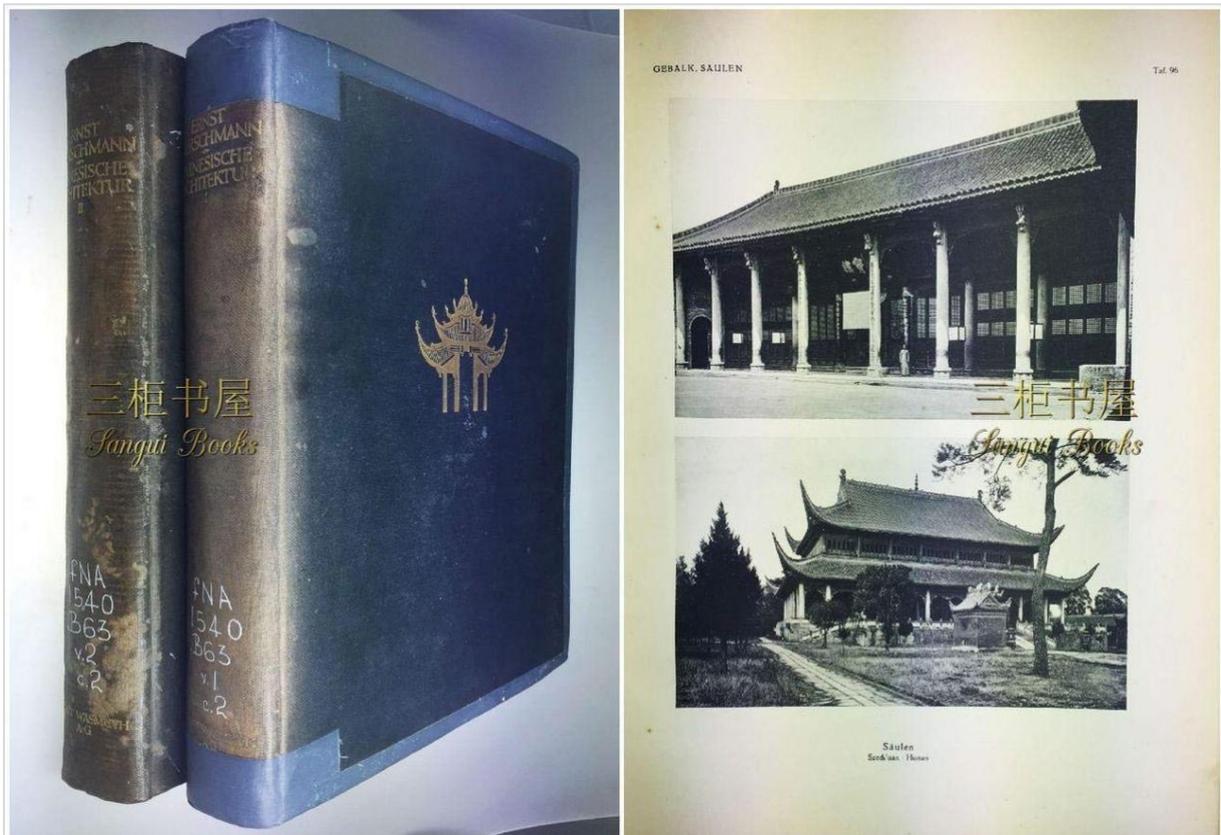
<sup>90</sup> 有关柏石曼在中国旅行的内容见哈尔特穆特·瓦拉拉温斯：《一家德国在华研究机构》，《东亚文化研究协会通讯（NOAG）》171-172期（2002），第114页起，<https://www.oag.uni-hamburg.de/noag/noag-171-172-2002/noag2002-6.pdf>（2019年6月4日查阅）。

<sup>91</sup> 哈尔特穆特·瓦拉拉温斯（2002），第110页。

<sup>92</sup> 恩斯特·柏石曼的代表作有：《中国建筑》，两卷本，1925年柏林出版；《中国建筑艺术与风景——穿越12省的旅行》，第2版，1926年柏林出版；又见哈尔特穆特·瓦拉拉温斯：《恩斯特·柏石曼（1873-1949）：中国建筑研究》，NOAG，189/190期（2013/2014），第151-199页；瓦拉拉温斯：《恩斯特·柏石曼：中国的塔——未出版的著作〈塔（第二卷）〉》，由遗稿整理编辑而成，并配历史图片，2016年威斯巴登出版。



恩斯特·柏石曼教授



柏石曼教授著作

- 出生于东普鲁士北部县城拉格尼茨的瓦尔特·布鲁诺·恒宁（1908-1967）不是汉学家，而是一位著名的中亚研究学者，其学术工作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在中国发现的相关历史文献。高级文理中学毕业后，他先在哥廷根学习数学，但最终转至古东方学和伊朗语言文化专业，重点研究摩尼教。<sup>93</sup>1932年，因整理、翻译和出版柏林民俗博物馆在（1902-1914年间的）数次所谓“吐鲁番探险”中（吐鲁番是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的一座城市）搜集的摩尼教文献的需要，恒宁在普鲁士科学院谋得一职。这些文献部分以伊朗语，部分以回鹘语写成，恒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集结成册，分为三卷发表。因其夫人的犹太出身，1936年他流亡至英国，先在伦敦东方学院，后又在剑桥和牛津大学任讲席教授。此外，恒宁对吐火罗人<sup>94</sup>以及在新疆发现的有关这个民族的史料也有研究，这些史料中还有一部分是关于佛教的回鹘语卷轴。<sup>95</sup>为了能够阅读汉语文献，恒宁学习过汉语文字，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至今仍得到中国学术圈的认可。
- 汉学教授梅蕙华 1933年出生于柯尼斯堡，原名爱娃·门策尔，1951年高级文理中学毕业后在莱比锡外语学院学习汉语，并在莱比锡大学东亚学院旁听来自南京的诗人赵瑞蕙的多门讲座。正是这些课程激发了梅蕙华对中国文学的兴趣，1954至1960年她就读于北京大学，其间曾聆听著名哲学教授冯友兰先生授课。回到德国以后，梅蕙华以助理研究员身份在洪堡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同时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后被聘为该研究所汉学教授。由于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导致民主德国同中国的关系也出现问题，直到80年代她才

---

<sup>93</sup> 摩尼教是自近古代起一直存续至中世纪的启示性宗教，由罗马帝国一路传播至中国境内。

<sup>94</sup> 吐火罗人据推测是曾经生活在中亚地区的民族，属斯基泰人一支，在汉语文献中被称为“月氏”，其居住范围延伸至中国甘肃省西北部。

<sup>95</sup> 见 <https://zflprojekte.de/sprachforscher-im-exil/index.php/catalog/h/250-henning-walter-bruno>（2019年5月24日查阅）：瓦尔特·布鲁诺·恒宁。

得以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梅蕙华是中国文学、文化和语言方面的专家，其研究的重点领域是中国文学里的妇女形象以及中德文学交往。<sup>96</sup>

- 汉学教授凯琳·托玛拉博士出生于柯尼斯堡（1940-2014），在前民主德国长大。她在多篇回忆录中提及，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风靡民主德国的中国热潮，以及与之相关的学习中文和获得奖学金前往中国深造的前景，唤起了她对这个国家的兴趣。鉴于已有的基础，托玛拉被东柏林洪堡大学汉学系录取，在那里学习汉学、哲学和历史。1963年，她从该校亚洲研究所毕业。然而，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起华沙条约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致使赴华留学的计划化为泡影。

大学毕业后托玛拉作为中文与俄文翻译入职民主国外交部，并被派往民主德国驻北京大使馆接受进一步语言培训

（1965/1966），是为数不多在中国亲历“文化大革命”开端的德国人之一。1966年托玛拉返回民主德国，<sup>97</sup>同年与波兰德国问题专家米西亚拉夫·托玛拉（1921-2014）成婚，并随丈夫移居华沙。她的丈夫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外交家和译员身份于一身，1970年12月在威利·勃兰特访问华沙期间曾任首席翻译，也因此成为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跪拜的见证者。米西亚拉夫·托玛拉任波兰华沙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多年，2001年德国总统约翰内

---

<sup>96</sup> 更多细节见尹虹：《梅蕙华七秩华诞贺词》，载于罗梅君、达严思（主编）：《中国文学：梅蕙华七秩华诞贺寿文集》，《柏林中国读本》第27卷，2004年明斯特出版，第3-8页；姚军玲：《红楼梦的德译本》，柏林自由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2009年博士论文，第238-247页，[https://refubium.fu-berlin.de/bitstream/handle/fub188/11571/Doktorarbeit\\_JunlingYao.pdf?sequence=1&isAllowed=y](https://refubium.fu-berlin.de/bitstream/handle/fub188/11571/Doktorarbeit_JunlingYao.pdf?sequence=1&isAllowed=y)（2019年6月10日查阅）。在一篇汉语文章中梅蕙华本人也对此作了描述：《梅蕙华，一辈子献身于中国文学：两个世界的媒介——德国女汉学家口述实录》，2011年北京出版，第11-29页，<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201656/>（2019年6月30日查阅）。

<sup>97</sup> 更多细节见凯琳·托玛拉：《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中国》，载于玛丽-露易丝·内特（主编）：《回首共产主义中国：东欧汉学家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15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等地联合出版，第159-183页。

斯·劳授予他联邦十字勋章，表彰其在促进德波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方面作出的贡献。

1987年凯琳·托玛拉在波兰科学院非欧洲国家研究所获博士学位，后在华沙大学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她在科学院非欧洲国家中心工作多年，1995年获得（由时任总统的莱赫·瓦文萨授予的）教授头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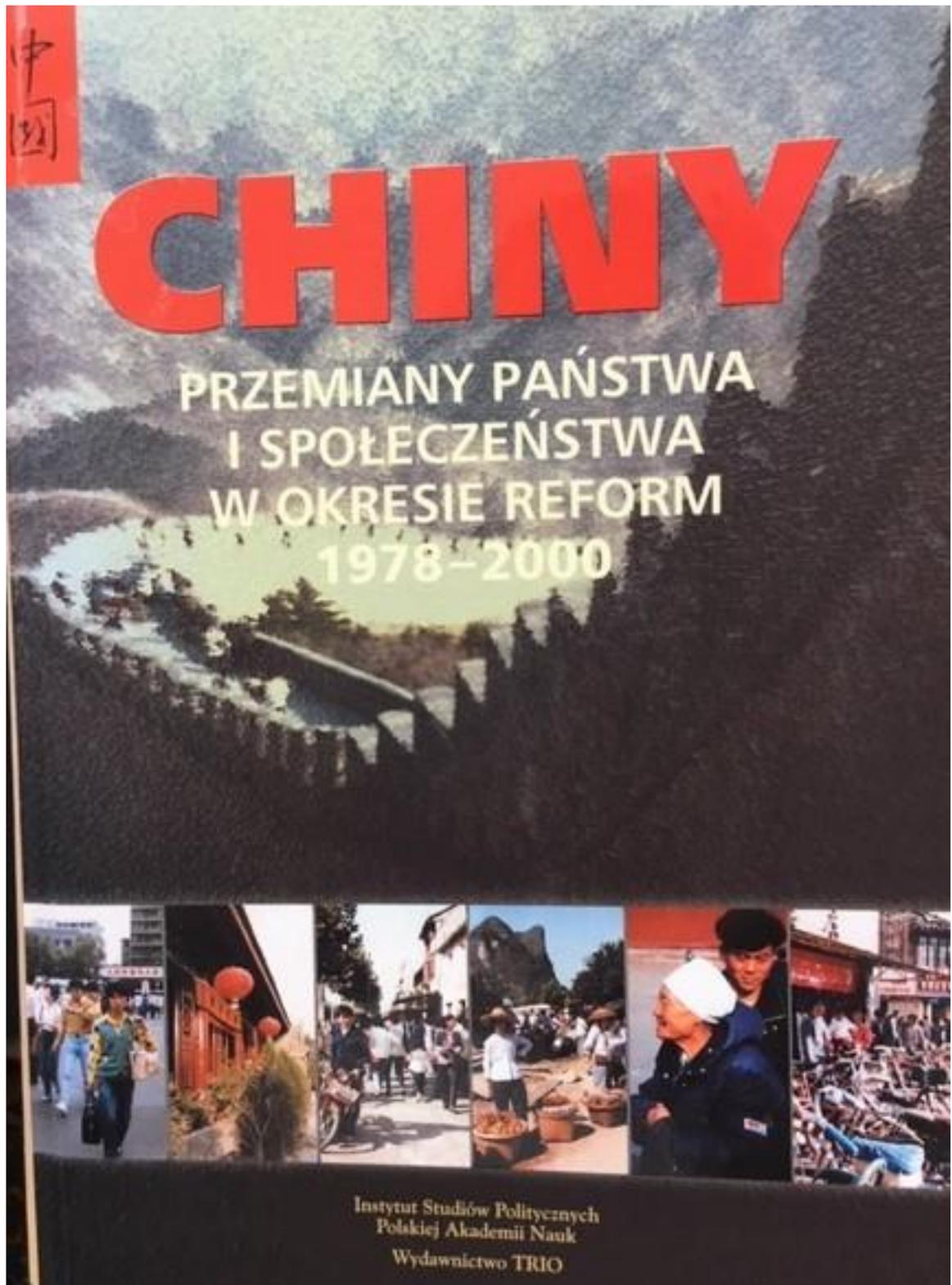
凯琳·托玛拉撰写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人口发展和人权问题，以及跨文化对话的文章。此外，转型与全球化问题也是她主要兴趣所在。20世纪90年代初，她受聘为美因茨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大学客座教授，她希望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报告让听众走近中国。与此同时，托玛拉夫妇还致力于推动德波和解与理解，1994年他们成立“纪念”基金会，用于修建和维护波兰的德国士兵墓园。

为完成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个科研项目，我曾于2002年前往华沙，凯琳·托玛拉为我安排了对波兰中国问题学者的拜会与访谈。<sup>98</sup>直到她去世，我都与她保持着频繁的学术联系和活跃的交往，她还曾向我约稿两篇，收录于她主编的波兰语《中国》一书中。<sup>99</sup>

---

<sup>98</sup> 这次调研的成果见托马斯·海贝勒等：《中东欧东亚研究综述》，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编辑出版，第48卷（2003）。

<sup>99</sup> 凯琳·托玛拉：《中国：1978-2000改革背景下国家与社会的变迁》，2001年华沙出版。



托玛拉教授主编的波兰语《中国》

- ▶ 法学家、汉学家米和伯（1885-1966）出生于贡宾嫩，在波恩就读时曾师从法律人类学家约瑟夫·科勒和汉学家葛禄博，并旁听过语言

学与民族学课程。1908年硕士毕业，191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随后在柏林民俗博物馆担任著名东方学学者缪勒的助手。在此期间，他参与了1912至1914年在中国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并为博物馆搜集民俗陈列品，为此曾前往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sup>100</sup>此外，他还受命为德国皇家图书馆（后称国家图书馆）购置汉语书籍。<sup>101</sup>回到德国以后，米和伯呈文申请在北京建立“里希特霍芬研究所”，为德国学者在当地开展研究提供机会，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这个设想未能付诸实施。在拓展汉学在德国的发展方面，米和伯也身体力行，尤其活跃在柏林地区。<sup>102</sup>战争期间，他任职于外交部东方新闻社，这是一个由参谋总部和外交部共同负责的在近东地区从事宣传及情报工作的机构。<sup>103</sup>

1924年米和伯接受了一份法兰克福报驻北京通讯员的工作，1934年供职于德国驻华北与蒙古通讯社。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米松林，还曾以此名发表诗歌。米和伯的另一个身份是在中国从事艺术品贸易的商人，本人也收藏古董。1946年一个设在上海的美国军事法庭以战争罪判处他10年徒刑，对他的指控是在德国投降后仍继续与日本人合作，从事对美国不利的间谍活动。米和伯多次否认这些指控，其传记作者瓦拉拉温斯对此也予以驳斥。<sup>104</sup>但是，米和伯

---

<sup>100</sup> 哈尔特穆特·瓦拉拉温斯（主编）：《米和伯的中国考察之旅 1912-1913：根据档案及往来信件重新整理，并增补历史图片》（《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第49卷），2017年威斯巴登出版。米和伯还曾深入“罗罗族”，现称“彝族”人聚居地开展研究，笔者也曾于1981年，1986年，1987年，1999-2002年和2012前往其聚居的中国西南省份四川（凉山自治州）进行田野考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笔者曾拜读过米氏的《对罗罗民族志学的贡献——柏林帝国民俗博物馆魏司藏品目录》一文，收录于《贝斯勒档案》，3/1913，第38-68页。2006年笔者曾在杜伊斯堡城市历史博物馆组织过一场关于彝族的展览，展出了笔者本人收藏的彝族物品以及弗瑞兹·魏司领事的藏品（由慕尼黑与柏林的民俗博物馆提供）。

<sup>101</sup> 柏林国家图书馆一批数量可观的汉语古籍均由米和伯在中国购置。见哈尔曼·胡勒关于米和伯为柏林皇家图书馆收集图书的报道，出自哈尔特穆特·瓦拉拉温斯：《米和伯（1885-1966）：汉学家、艺术品商人、法学家和记者——生平梗概》，1992年柏林出版，第50-56页。

<sup>102</sup> 参见瓦拉拉温斯（2017）书中相应的文字记载，第167-177页。

<sup>103</sup> 见瓦拉拉温斯，出处同上，第214页。

<sup>104</sup> 瓦拉拉温斯（1992），第8-10页。

还是被驱逐出境，并不得不将全副家当，包括他的中国太太和收养的两个孩子留在中国，此后再也没能回到这片土地。他在兰茨贝格监狱被囚禁至 1950 年，<sup>105</sup>出狱后无法继续从事学术工作，以自由记者为职。<sup>106</sup>艺术史学家、东亚学专家奥托·福克斯（1886-1948）曾经这样描述米和伯：“他是一个天赋极高，浑身充满艺术气质的聪慧的人，一个诗人和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他深深扎根于华夏大地，让自己完全适应了中国的节奏和中国的生存方式。”<sup>107</sup>

- 赫尔默特·维廷霍夫博士 1944 年出生于东普鲁士的阿伦施泰因，退休前任科隆大学“古代汉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思想史和哲学。<sup>108</sup>
- 菲利普·谢费尔（1894-1943）也是一位名人，他出生于柯尼斯堡一个军官家庭，是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第一位博士生，曾在圣彼得堡和海德堡两地研习汉学、藏文与梵文，1924 年在内卡之城（指海德堡——译者注）获得博士学位。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因龙树菩萨《六十颂如理论》的梵文版本已经失传，谢费尔将此论著由中文和藏文译成德语。龙树菩萨出生于南印度一个婆罗门家族，转投佛门后凭借自己的学说开创了佛教的一个重要时代。谢费尔后来的工作是在柏林做图书馆管理员，并在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纳粹掌权后，谢菲尔因参与抵抗活动多次被捕入狱，1943 年作为“红色乐队（也称红色歌唱团）”成员的他在柏林鳊鱼湖监狱被纳粹分子斩首。

109

---

<sup>105</sup> 和他一同被判刑关押的还有外交官菲利克斯·阿尔滕堡（又译阿登伯，1889-1970）。阿尔滕堡出生于柯尼斯堡，1921 至 1945 年先后任驻华总领事和参赞，他被判在兰茨贝格服刑 8 年。见瓦尔拉温斯（2017），第 150 页。

<sup>106</sup> 其发表作品概况见瓦尔拉温斯（1992），第 12-35 页

<sup>107</sup> 出处同上，第 1 页。

<sup>108</sup> 见弗兰西丝卡·艾姆克、马丁·穆勒（主编）：《间隙中的旅行——文化学的跨文化性》，《赫尔默特·维廷霍夫六十五华诞贺寿文集》，《东南亚文化研究论文》第 2 卷，2012 年维尔茨堡出版。

<sup>109</sup> 谢菲尔的生平见 <https://www.berlin.de/stadtbibliothek-mitte/bibliotheken/bezirkszentralbibliothek-philipp-schaeffer/namensgeber/artikel.145660.php>（2019 年 1 月 2 日查阅）。

➤ 虽非直接意义上的汉学家，但出生于柯尼斯堡附近诺伊豪森的卡拉·维歇特-施滕贝格（本姓维歇特，1924-2014）仍是这里有必要提到的一位女性。卡拉的父母来自东普鲁士的拉斯腾堡（今波兰肯琴——译者注），如其传记所述<sup>110</sup>，她与东普鲁士作家恩斯特·维歇特（又译魏舍特，1899-1950，出生于桑斯堡县克雷因奥特）是亲戚。恩斯特·维歇特在中国非常出名，<sup>111</sup>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受欢迎的德语作家之一，其小说发行量高达数百万册。虽然他是一位民族主义保守派作家，但却是纳粹政权的反对者，曾被纳粹投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关押数月，还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作家遭到封禁，不允许写作和发表公开演说。<sup>112</sup>

作为记者，卡拉·施滕贝格早在1957年便有机会对执政台湾的国民党主席蒋介石（1887-1975）夫人宋美龄（1897-2003）进行私人采访。在当时的报道中维歇特-施滕贝格这样描述与宋女士的谈话：

“这样一位女士的开场白，显然不会是通常陌生人见面时那种礼貌而疏远的闲聊。‘西德是你的家乡吗？’这是她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是东普鲁士！’——‘那是属于俄国还是波兰？在柯尼斯堡上的学？那可以说是饱受康德精神的浸润啊。您知道Kant用中文怎么讲吗？在中国他的名字是康德——“健康的道德”，就像我们称德国为“道德之国”一样[……]普鲁士的传统美德：宽

---

<sup>110</sup> 《年复一年，岁月渐沉——回忆卡拉·维歇特-施滕贝格》，未经出版的手稿（由其养子提供，谨表谢忱）。

<sup>111</sup> 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1%A9%E6%96%AF%E7%89%B9%C2%B7%E7%BB%B4%E6%AD%87%E7%89%B9>（2019年5月4日查阅）：恩斯特·维歇特。

<sup>112</sup> 参见贝尔博·博依特纳、汉斯-马丁·普雷斯特（主编）：《永恒不灭：恩斯特·维歇特和他的作品》，2002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在战后的波兰，维歇特的大量作品被译成波兰语，作为具有民族情怀的马祖里作家，他也是波兰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其出生地桑斯堡（今波兰姆龙戈沃）还建有恩斯特·维歇特纪念馆。

容，守信，忠诚，守时，秩序，这些都是我们所珍视的’ ……”<sup>113</sup>

卡拉·施滕贝格（笔名）1972 至 1974 年在台湾台北市中国文化学院（1980 年更名为中国文化大学——译者注）做讲师，教授德语文学与修辞学。1978 年她与养子胡翔凡（1948 年出生于北京）在斯图加特共同创立“竹桥书苑”，通过展览、文化之夜、报告、出版书籍和健身课程（太极拳），母子二人努力让中国文化与思维方式走近德国民众。<sup>114</sup>他们联合出版了一系列书籍，还对《道德经》作了新的诠释。<sup>115</sup>

施滕贝格无数次游历东南亚、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不过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她才得以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中国人对德国抱有的友善态度令她惊讶，她曾这样描述初到中国的一次经历：

“在古老的省会城市南京的一座公园里，许多人或聚或散，做着五花八门的体操和呼吸运动。我加入了打太极的人群，练完拳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士冲我走过来，‘您是德国人吗？您在德国也打太极？——哎哟，要是德国人开始练太极，那他们最后可是会征服全世界的！’我说：‘是吗？单是本世纪上半叶我们德国就输掉了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了这一切您还这么认为？’‘没错啊，就是因为那时候你们还没有练太极！’”<sup>116</sup>

又及：

---

<sup>113</sup> <http://www.webarchiv-server.de/pin/archiv03/0103ob28.htm>（2019 年 5 月 2 日查阅）：《一位来自中国的普鲁士女性》。

<sup>114</sup> 见“竹桥书苑”网站，<http://www.bambusbruecke.de/show26d5.html?pid=2>（2019 年 5 月 2 日查阅）。

<sup>115</sup> 胡翔凡、卡拉·施滕贝格：《兰与梅》，2001 年坎普豪森出版；《中国——天地之间的国度》，2001 年坎普豪森出版；《竹桥书苑：微缩的中国》，2001 年坎普豪森出版；《哲学与智慧初探》，2008 年坎普豪森出版；《茶的秘密》，2009 年坎普豪森出版。《道德经》是奠定道家思想基础的一部典籍，传说为生活在公元前 6 世纪的中国思想家老子所作。

<sup>116</sup> 《年复一年，岁月渐沉》，未经出版的手稿。

“后来当我询问德语系的学生为何偏偏选择了德语时，不少人的回答是：‘我爸爸说学习任何一门西方语言都会对我们的未来有好处，但如果能读歌德、席勒，尤其是德国诗歌的原文，了解那些德国歌曲，将受用终生！’”<sup>117</sup>

卡拉·施滕贝格的传记虽未最终完成，但从她的文字中我们已经能读出那份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敬重钦慕之情，在中国人身上她学到了许多惠及一生的东西，而她也必将传承自身所学视为毕生的使命。

## 第二节 东普鲁士传教士及其在华影响

在来华传教布道的人当中，也活跃着许多东普鲁士人。

- 威利·马扎特，中文名马维立（1893-1930）是其中比较出名的一位。他出生于梅梅尔县的哥茨霍芬，其父是贡宾嫩市立园圃的一名雇工。他曾在东普鲁士约翰尼斯堡县（今波兰皮什——译者注）做牧师，1912年加入德国信义会（又称巴陵会），1922年受教会派遣携夫人马多加（本姓魏德曼）前往中国。马维立最初在即墨县（今青岛的一个城区）传教，后在路德宗教堂做牧师，再后来成为差会在山东地区的负责人。1930年他猝然离世，其遗孀带着四个儿子继续留在青岛在中国妇女中传教，1946年她在青岛城内被一辆汽车撞伤离世。

---

<sup>117</sup> 出处同上。



马维立和夫人、孩子们在青岛<sup>118</sup>

- 马维立四子之一威廉·马扎特（后继承其父亲的中文名马维立——译者注）1930年在青岛出生，后来成为波恩大学地理学教授。一直到2016年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始终关心着自己出生地青岛的发展，1998年还参与了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为纪念青岛开埠100周年举办的《青岛：德国殖民历史的中国篇章1897-1914》展览目录的编撰。
- 威廉的兄长赫尔穆特（1927-2010）曾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1955-1961）传教，后来在哈姆和明斯特做牧师。

---

<sup>118</sup> 照片由马氏家族提供，谨表谢忱。



在青岛上中学时的威廉·马扎特（1946）<sup>119</sup>

- 亚当·克罗茨克（1826-1872，中文名公孙惠——译者注），出生于内登堡县的涅德瑙，1860至1872年间作为福音教派传教士受礼贤会（成立之初称巴冕差会——译者注）委派在华任职。他主要在中国南部的少数民族（苗族）地区传教，还曾用德文和英文发表过关于这些少数民族的文章，后在香港去世。
- 弗里德里希·里德瓦尔特（1860-1947）出生于东普鲁士，身为作家曾使用笔名尼史可夫斯基。作为礼贤会传教士他曾长期在华活动（自1888年起在东莞，塘厦和阜英[音]等地），并撰写有关其所在地基督徒

---

<sup>119</sup> 照片由马氏家族提供，谨表谢忱。

遭受迫害，以及汉语语言和他本人游历中国情况的文章。此外，他还对中国的祖先崇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基督教融合的问题有过研究。<sup>120</sup>

➤ 赫尔曼·阿西巴尔特·格鲁尔（1863-1945）出生于莫龙格县的格尔葛嫩，曾在柯尼斯堡攻读神学，1907年至1922年任信义会中国区宣教会督查。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女传教士伊蕾娜·坤斯特（1861年出生，1934年在湖南去世，中文名樊贵英——译者注）。她出生于柯尼斯堡一个商人家庭，1904年受福音教派立本责会（也称立本责信义会——译者注）委派前往中国。她的首个任职地是湘潭，位于当年尚属偏远之地的湖南省东部，在华期间她学会了中文，于1910年接管位于省会长沙的“瞽目学校”（一所为盲女提供教育、培训和工作机会的机构——译者注）。但是，在这一年屡屡发生的长沙平民暴动中，学校被暴民破坏，所有设施被洗劫一空。与许多其他传教士不同的是，樊贵英致信差会请求放弃赔偿，她写道：“我希望，我们的差会不要向中国索求和接受赔偿，[...]因为这样只会让贫穷百姓在沉重的赋税下被压榨，对改善大众的情绪毫无裨益。如今的长沙依然米价昂贵，苦难深重，数以千计的人备受煎熬，却不能也不许得到帮助”。<sup>121</sup>最终差会接受了她的请求，没有要求赔偿，并在一次表彰中这样肯定了樊贵英的付出：“她已经完全变成中国人眼里的中国人。”1934年，因常年为穷苦百姓和有需要的人殚精竭虑，无私忘我地付出，樊贵英积劳成疾病逝于湖南。<sup>122</sup>

---

<sup>120</sup> 关于里克罗茨克和尼史可夫斯基见孙立新：《19世纪德国基督教传教士眼里的中国形象：跨文化交往与接受问题的案例研究》，2002年马尔堡出版。

<sup>121</sup> 恩斯特·布德贝格：《我是否被牺牲：樊贵英》，巴特利本采尔出版，日期不详，第10页。

<sup>122</sup> 出处同上，第31页。以上资料与照片由立本责会提供，在此谨表谢忱。



女传教士樊贵英

卡尔·居茨拉夫（1803-1851），（中文名郭士立，又称郭实腊、郭实猎等——译者注），也是一位有着特殊地位的传教士，不过他的出生地并不是东普鲁士，而是与之相邻的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省皮利兹（今波兰佩日采）。郭士立属路德会，是该会首位来华的传教士，之前曾在泰国和韩国任职。在华期间，他曾在中国的宁波、舟山两市（均在浙江省境内）任法官以及港英政府二等秘书。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1839-1842），郭士立担任英国外交使团翻译，通过这场战争，英国人迫使中国接受其对华出口鸦片。此外，郭士立还是首批穿着中式服装的新教传教士之一（见下附照片）。

1826 年受荷兰传道会委派前往爪哇岛期间郭士立学习另中文，但仅两年后他便脱离传道会，先去了新加坡，后又到了曼谷（泰国），并在那里将《圣经》译成泰文。他还曾与自己的原配夫人一道编撰柬埔寨语和老挝语词典。原配去世后，他于 1834 年迎娶英国人玛丽·温斯蒂。后来温斯蒂曾负责管理澳门的瞽目学校（瞽目之家）。



穿着中式服装的郭士立

在澳门和香港期间，郭士立同其他传教士一起着手将《圣经》译成汉语，在此过程中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翻译的这一版《圣经》对洪秀全，具有革命性的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的领袖，以及这场运动所宣扬的吸收了部分基督教教义的世界观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郭士立以翻译为职，同时培训当地华人传教士。1851年他在香港去世，并被安葬在那里。<sup>123</sup>

---

<sup>123</sup> 郭士立生平参见赫尔曼·施吕特：《赴华传教士郭士立和他背后的支持力量：西方国家为何对赴华先锋郭士立的使命感兴趣及作为传教先觉者郭氏付出的努力》，1976年隆德出版；温弗雷德·沙劳（主编）：《郭士立1831-1833年间三次中国沿海省份之行的报告》，1997年汉堡出版；托拉尔夫·克莱茵、雷因哈特·左尔勒（主编）：《郭士立（1803-1851）与基督教在东亚：穿行在不同文化间的传教士》，2005年圣奥古斯丁出版。

郭士立是一位语言和组织天才，也是“开中国内地传教先河之人”。据说，他甚至影响到卡尔·马克思中国观的形成，后者不仅在伦敦聆听过他的报告，还阅读过他关于中国的文章，甚至以其中的信息为基础为英美多家报刊撰文论述有关中国的问题。<sup>124</sup>

---

<sup>124</sup> 参见卡尔·马克思：《论中国：英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1972年柏林出版。

## 第七章 回忆文化与康德、赫尔德对中国的接受：中国与 中国形象

无论在东普鲁士的记忆文化，德国的集体记忆和中国的接受认知里，还是在对中国的哲学和文化历史研究与评鉴方面，出生于柯尼斯堡的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和出生于莫龙格的诗人、神学家和哲学家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1744-1803）都占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国，他们二人跻身最负盛名的哲学大师之列，谈及“东普鲁士”这个概念时，始终都是最先被提及的。

但是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康德与赫尔德却截然不同。康德将中国视为“世界上最知礼的”国度，<sup>125</sup>但在赫尔德眼里中国却是一具“周身涂有防腐香料，绘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对木乃伊”，他想以此隐射人们所臆想的中国发展停滞不前的状况。那么对于中国和在中国对东普鲁士的接受过程中，以及对德国人眼里的中国形象，他们二位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 第一节 伊曼努尔·康德：“中国——世界上最知礼的帝国”

---

<sup>125</sup> 康德：《讲座》第三卷，《自然地理学讲座》，2009年柏林、纽约联合出版，第198页；亦见夏瑞春：《欧洲文学里的中国形象》，2010年维尔茨堡出版，第48页。



伊曼努尔·康德

维尔纳·史塔克提到一部奇幻短篇小说，语言学家埃里希·舒勒贝克（1884-1966）正是在这篇小说的基础上对“少年康德生活的最初阶段有了一些具体的想象”。1946年舒勒贝克发表《少年康德的故事》，对康德如何对地理学产生兴趣作了这样一番勾勒：

“这时，小男孩发现一朵开在田边的红花，他立刻松开母亲的手，笨拙地迈开小细腿跨了过去，摘下那朵花递给母亲。‘这么漂亮

是什么花啊，母亲？’ ‘这是虞美人，小曼努，是之前在博利乌斯医生那儿，我指给你看过的灰色的东方罂粟的兄弟，医生先生可以用它制成罂粟糖浆。如果你的小肚子疼了，有时候我就得给你喝这个。但是在中国，人们却用它们做鸦片。’ ‘中国是一座城市吗？’ ‘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和普鲁士一样大吗，母亲？’ ‘那可大上百倍呢，小曼努。’ ‘中国在哪儿，母亲？’

‘很远很远，在那后面，太阳升起的地方，在亚洲。’ ”<sup>126</sup>

康德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视其为“世界上最知礼的国度”（见上文），赞赏它的社会结构特征，肯定中国人“极为冷静本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对中国文化及其国民表达了非常负面的看法，比如他将中国人形容为“有强烈报复欲的”，“胆小怯懦的”，谈到审美观，他认为中国人以肥胖高大、小眼宽额、塌鼻大耳为美。<sup>127</sup> “他还谈到中国人‘爱撒谎’的特点，甚至连他们的绘画都是‘怪诞可笑的，描绘那些奇怪而做作的形象’；至于他们的法令条款，“只是为了安抚百姓，让他们对帝王保持恭顺，完全不考虑道德观念”。<sup>128</sup>

在其《自然地理》一书中，康德专门对现在属于中国的西藏发表了看法：

“对亚洲西藏地区的准确认识当是最重要的认识之一。通过它[···]我们将得到解锁全部历史的钥匙。这里是最高地方，或许也曾经有其他人居住过，甚至可能是所有文化、科学的发源地[···]这

---

<sup>126</sup> 维尔纳·史塔克：《康德对亚洲知多少？康德对地理学问题的兴趣缘起何处以及对此的思考》（2009），[https://archiv.ub.uni-marburg.de/es/2010/0007/pdf/09\\_kld\\_b.pdf](https://archiv.ub.uni-marburg.de/es/2010/0007/pdf/09_kld_b.pdf)（2018年11月28日查阅）。

<sup>127</sup> 康德：《讲座》，第3卷，出处同上，第200页。确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都不以大鼻子为美，胖比瘦好，大耳垂至今还被视为长寿的象征，对这些背景康德显然并不了解。

<sup>128</sup> 康德：《讲座》，第3卷，出处同上，第200页。关于康德的负面中国形象亦见艾瑞克·S·纳尔逊：《中国、自然与康德的崇高论》，载于庞思奋（主编）：《培育人性：康德与亚洲哲学》，2010年柏林、纽约联合出版，第333-348页；作者同上：《康德与中国：美学、种族与自然》，载于《中国哲学季刊》，2011年第4期，总第38期，第509-525页。与绝大多数作者不同，纳尔逊将康德的道德思想与中国的道家思想作比较。

样一处艺术与科学——我甚至想说——人类的发源地，值得人们花费心思做更仔细的研究。”<sup>129</sup>

康德为何认为西藏是“所有文化和科学的发源地”，原因不详，也可能和当时关于西藏的文献极为匮乏有关。

谈到日常问题，康德也喜欢用中国举例。有一次，他在解释数秘术及其影响力时就用下面这个故事来打比方：“据说中国皇帝拥有一支由 9999 艘船组成的船队，看到这个数字有人悄悄地问：为什么不再多一艘呢？而答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数量的船只足够他用了。”康德想以中国君王的行为为例，暗示主动为人类欲望设限<sup>130</sup>的可能。

中国对康德的接受史始于 19 世纪，哲学家、文学家王国维（1877-1927）将康德介绍到中国，也是解读其著作的第一人，而且他尝试用康德关于伦理道德和美学的论述对中国文化与思想史作新的解读。<sup>131</sup>不过，对康德及其哲学思想的认知并非直接来自欧洲，而是由日本传入中国的。<sup>132</sup>

张君勱（1887-1969），中国最著名的现代哲学家之一，是最早发掘出儒家思想与康德哲学间相似之处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康德的观点，道德源自人的内心法制，与儒家学说中君子内省式的精神修养是相通的。两家学说都认为，人的道德行为建立在人的天然本性之上。<sup>133</sup>

---

<sup>129</sup> 伊曼努尔·康德：《自然地理讲座》，出自卡尔·罗森克朗茨，弗里德里希·W·舒伯特（主编）：《康德全集》，第 6 卷，1839 年莱比锡出版，第 509 页。

<sup>130</sup> 伊曼努尔·康德：《实用人类学》，普鲁士科学院版，1900 年柏林出版，科学院版第 7 卷，第 196 页。

<sup>131</sup> 胡秋华（音）：《王国维与伊曼努尔·康德：中国晚清跨文化交流的开端》，载于《华裔学志》第 53 期（2005），第 337-360 页。

<sup>132</sup> 见李明辉（编著）：《康德哲学在东亚》，2016 年台北出版，第 2 页。

<sup>133</sup> 见张君勱：《新儒家思想史》，两卷本，1957-1962 年纽约出版。关于张君勱的观点亦见鲁道夫·奥伊肯（旧译倭铿或倭伊铿——译者注）、张君勱合著的《中国与欧洲的生命问题》，1922 年莱比锡出版。

学者程 S.L. (音) 曾指出, 在中国康德常被称为“哲学大师”, 而孔子则是“先师”。<sup>134</sup>他如此表述是想强调, 与孔子相比, 康德更被看重。他还写道, 康德被视为“百世之师, 黑暗时代之救世主”,<sup>135</sup>“虽然与我们的时空距离如此遥远, 但他的某些思想我们却并不那么陌生。那句表达康德核心思想世界的名言: ‘头顶的星空, 心中的道德法则’也完全可以作为(儒家——作者注)思想家孟子<sup>136</sup>或者宋代(新儒家——作者注)学者朱熹<sup>137</sup>的话去理解。而且康德本人极有规律的生活方式也会让我们想起中国的古代先贤。”<sup>138</sup>

中国哲学家将康德思想与孔子思想和儒家规范进行比较的尝试, 引发对康德哲学与儒家哲学之间存在“哲学亲合力”的观点。对此, 20 世纪早期中国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梁启超(1873-1929)是这样解释的:“若我们将康德与东方先哲作比较, 那么他的理论分析与释迦牟尼[佛陀]所求相似; 而他关于实践理性的论述, 则与孔子所言类同。”<sup>139</sup>他甚至将康德称为“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sup>140</sup>

---

<sup>134</sup> 程 S.L.: 《德国的东方与中国》, 载于《柯尼斯堡阿尔贝图斯大学年刊》, 1960 年卷, 第 270 页。孔子(公元前 551-479), 政治哲学家, 儒家思想的重要创始人(“儒家学说”在许多语言里都是以孔子命名的, 译作“孔子学说”或“孔教”——译者注)。儒家思想是一套政治哲学、道德伦理学说体系和教育修养理论。1911 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覆灭前, 儒家思想是支撑国家运转的正统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其基本观点至今仍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区民众的思想行为之中。参见林语堂:《吾国吾民》, 托马斯·海贝勒编辑并作导论(德文版——译者注), 第 3 版, 2019 年埃斯林根出版。

<sup>135</sup> 参见程 S.L.: 《中国人对康德知多少》, 载于《柯尼斯堡阿尔贝图斯大学年刊》, 1954 年卷, 第 156 页。

<sup>136</sup> 孟子(公元前 317-290 前后)是孔子最重要的传人, 他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参见卫礼贤译《孟子》, 1994 年慕尼黑出版。

<sup>137</sup> 朱熹(1130-1200)是最伟大的新儒学思想家。参见《朱熹: 中国人的自然与宗教哲学》, 2014 年柏林出版。

<sup>138</sup> 程 S.L. (1954), 第 155 页。关于欧洲与中国的哲学基础(也涉及康德)问题, 前文提到的鲁道夫·奥伊肯与张君勱合著, 1922 年出版的书稿对此作出了很有意思的阐述。

<sup>139</sup> 同上; 李恩珍(音):《“反欧洲”: 启蒙运动以来的儒家和儒家社会接受史》, 2003 年明斯特等地联合出版, 第 273 页。

<sup>140</sup> 黄克武:《梁启超与康德》, 载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998 年第 30 期, 第 101-148 页, [http://www.mh.sinica.edu.tw/MHDocument/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Detail\\_686.pdf](http://www.mh.sinica.edu.tw/MHDocument/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Detail_686.pdf) (2018 年 11 月 28 日查阅)。梁启超对康德的解读明显遵循中国传统哲学范畴, 并不断将康德纳入儒学讨论, 相关内容见李明慧(音):《儒家人文主义——跨文化的文本》, 2013 年比勒菲尔德出版, 第 54 页起。



梁启超

中国哲学家牟宗三（1909-1995）曾经写道，东西方哲学的结合只有在康德哲学的框架下才是可能和可以想象的。<sup>141</sup>

1979年著名哲学家李泽厚（1930年出生）出版《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掀起一轮“康德热”，并再次引发一场关于“西哲”与中哲之间关系的讨论。<sup>142</sup>

执教清华大学的中国文学评论家和哲学家汪晖（1959年出生）也曾撰文称康德就是“中国人”。<sup>143</sup>当然这样的联系尚待商榷，因为在关于道德的问题上，儒家和康德哲学虽有相似之处，但从根本上看二者其实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康德提倡尊重道德准则，并宣称恪守这些准则是实践信念和道德行为自由支撑之下的义务，人们应当遵从个人理智。虽然背后的价

---

<sup>141</sup> 引自马妮科·V.·苏里：《从康德的和平观看中国》，载于《哈佛国际法杂志》，第54卷，2013年冬季第1期，第219页。

<sup>142</sup> 同上：第241-242页。

<sup>143</sup> 汪晖：《他是中国人》，载于《伊曼努尔·康德留下了什么》，《时代》网络版，2015年，<https://www.zeit.de/2015/49/philosophie-immanuel-kant-vermaechtnis-philosophen/seite-6>（2019年2月18日查阅）。

价值观表现出相似之处，但儒家学说最终并未提及“个人理智”的作用，而是强调自觉遵守儒家道德规范。而且，在儒家守则体系里，个体行为被置于等级制度之下，与康德所说的自我决定和自我反省的个体无法契合。<sup>14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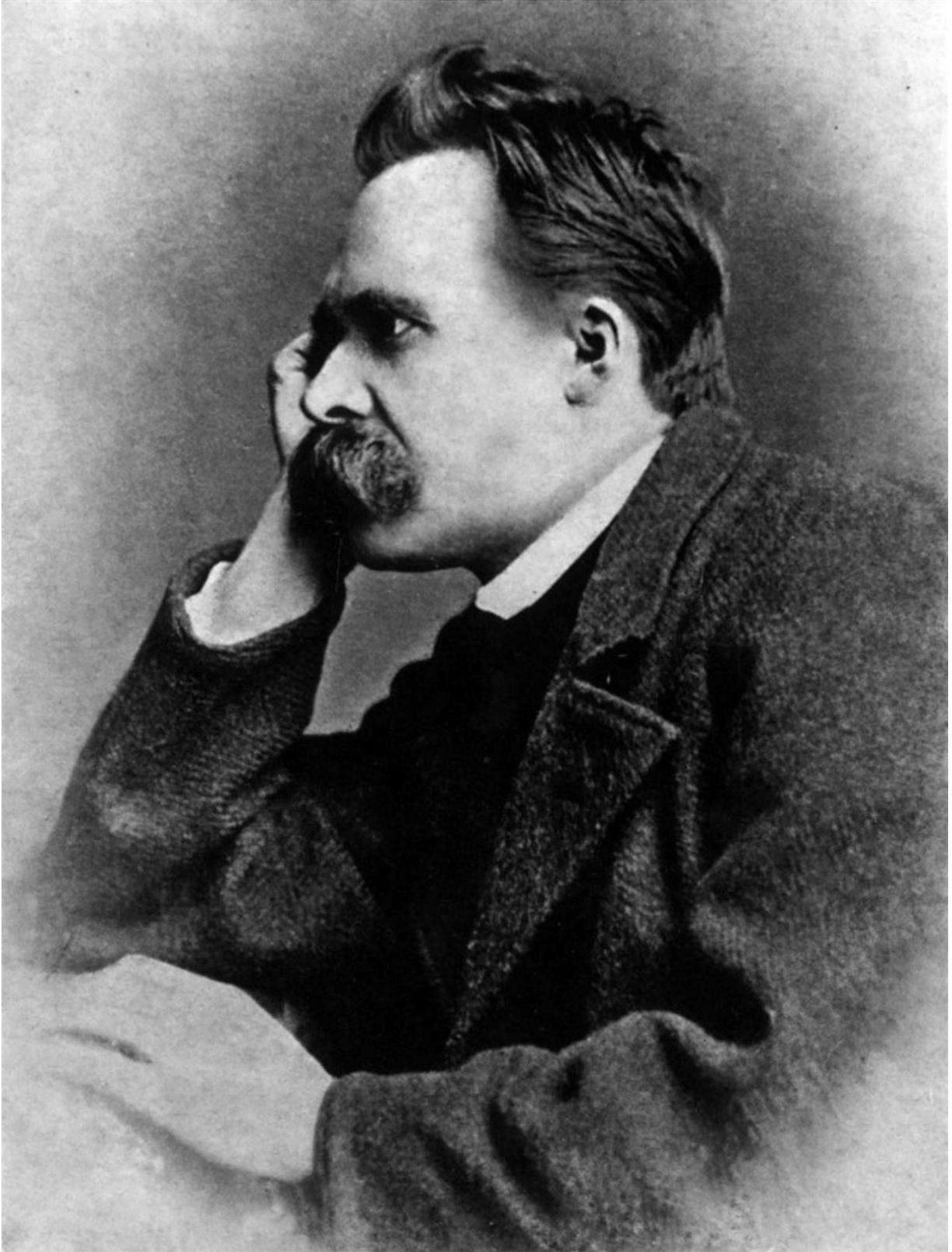
有意思的是，弗里德里希·尼采在《超越善与恶》中也将康德称为“柯尼斯堡的中国人”，并且谈到“柯尼斯堡的中国精神”。尼采认为，康德和孔子是批评家，不是哲学家；“批评家是哲学家的工具，正因为被当作工具，其本身还远算不上哲学家！哪怕是柯尼斯堡那位伟大的中国人，也仅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sup>145</sup>

---

<sup>144</sup> 庞思奋主编的合集《培育人性：康德与亚洲哲学》对康德与亚洲哲学关系作了很有意思的介绍，2010年柏林、纽约联合出版。

<sup>145</sup> 弗里德里希·尼采：《超越善与恶》，载于《尼采著作全集（第三卷）》，1900年慕尼黑出版，第662页。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的庞思奋教授在《康德有多中国化？》

（<https://philarchive.org/archive/PALHCWv1>，2019年3月1日查阅）一文中认为（第2页），尼采此语并不一定是对康德及其著述的批评，反倒更应当被视为赞赏，但即便尼采称康德是“柯尼斯堡伟大的中国人”，可他是否真的就是以此作出正面评价，有待商榷。



弗里德里希·尼采

对此，前文已引述过的学者程 S.L.也写道：“如果尼采[···]要称康德为柯尼斯堡伟大的中国人，我一点也不奇怪。”<sup>146</sup>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贵族和哲学家赫尔曼·凯泽林伯爵（1880-1946）或许提供了解读尼采对康德评价的钥匙。1911 至 1912 年间他曾游历亚洲，并在之后撰写了多篇游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我意识到必须要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儒家哲学，[···]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自成体系的哲学，而是一个从活生生的，或者有待被赋予活力的现实世界里抽象出来的框架，[···]是人赋予了儒家学说活力；迄今为止我所理解的理论先决条件，对他们而言是其存在的形式。”<sup>147</sup>

凯泽林在此想表达的是，儒家学说更多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他称之为“道德特权”），而不是一套以理论为指导的哲学。尼采恰恰也有类似的观点，康德哲学宣传的是一种“道德的”生活方式，故而不能被视作哲学原理。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康德哲学在中国始终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1868-1940），也是 20 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1924 年在（1544 年建立的）柯尼斯堡大学康德诞辰 200 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演讲时，就曾言及康德备受中国知识分子的敬重和康德对中国的意义。<sup>148</sup>

---

<sup>146</sup> 程 S.L.: 《中国人对康德知多少》，出处同上，第 155 页。

<sup>147</sup> 赫尔曼·凯泽林伯爵：《哲学家游记》，第 2 卷，第 4 版，1920 年达姆施塔特出版，第 464-465 页。

<sup>148</sup> 有关蔡元培对康德的接受与解读见李明慧：《儒家人文主义》，出处同上，第 56-58 页。亦见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蔡元培的教育生涯》（2018）展览册。2019 年 9 月 27 日，在北京大学政治学 120 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言时，我曾谈到蔡元培的这场演讲，以及他对康德的接受和如何在北京大学践行其理念。借这个机会，我也有幸同其孙女蔡磊珂就蔡元培在柯尼斯堡这场演讲的内容进行了交流。



蔡元培教授

1907年在莱比锡攻读哲学、心理学、艺术史和民族学的蔡元培，凭借研究康德思想的论文获博士学位。他的观点是，“西方”本质上是以宗教为特征的，而中国却以表现为“仪式、艺术和伦理结合体”的美学为特征，后者是宗教在中国的替代形式。因此，他呼吁现代中国要“以美育代宗教”。<sup>149</sup>

此观点贯穿于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内部争论：究竟什么是“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如何一方面保持中国本色，另一方面又能吸纳西方的先进事物？时至今日，这依然是中国关于现代化讨论的核心问题。

作为北京大学，这所迄今仍跻身中国顶尖大学之列的高等学府的校长，蔡元培遵循康德的理念来管理它，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为最高治校原则。因此，在他的引领下这所大学发展成新思想的汇聚地，最终也成

---

<sup>149</sup> 参见卜松山：《文化的同一性与糅合性——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与美学：跨文化美学》，载于安东·范·登·布雷姆布舍等主编：《跨文化美学：全球视野》，2009年柏林、纽约联合出版，第87-103页，[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6517644\\_Identity\\_and\\_Hybridity\\_-\\_Chinese\\_Culture\\_and\\_Aesthetics\\_in\\_the\\_Age\\_of\\_Globalization](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6517644_Identity_and_Hybridity_-_Chinese_Culture_and_Aesthetics_in_the_Age_of_Globalization)（2019年3月16日查阅）。卜松山在此文中特别提到刘纲纪《德国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文（德译本——译者注），载于卜松山主编：《特里尔文集：特里尔大学教学研究成果汇编》，1996年7月（特刊第10期），第8-13页。

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中心。<sup>150</sup>北京大学还是首个设立康德哲学教席的中国大学，并将康德哲学规定为哲学系学生的经典必修课。<sup>151</sup>

就连毛泽东也曾在同民主德国作家冈特·魏森博恩（1902-1969）的谈话中，以及对大学生的一次讲话里提到，他青年时代是康德学说的追随者，其思想对自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up>152</sup>他还对魏森博恩解释说，为了让中国人更好地理解康德和黑格尔，必须设立专门研究他们的教席。<sup>153</sup>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毛泽东还曾同赫尔穆特·施密特探讨过康德。<sup>154</sup>



1975年毛泽东与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北京

---

<sup>150</sup>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上街游行，抗议《凡尔赛和约》。按照该和约日本将接管前德国殖民地青岛，而不是将其归还中国。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场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为中国寻求政治、社会及文化新出路的文化批判运动。参见周泽宗（音）：《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1915-1924》，1963年（马萨诸塞）剑桥出版；薇拉·施瓦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1919年五四运动的遗产》，1986年伯克利、洛杉矶、伦敦联合出版；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1973年麦迪逊出版。最有分量的相关德语文献见傅吾康：《中国的文化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1957年慕尼黑出版。

<sup>151</sup> 程 S.L.：《中国人对康德知多少》，出处同上，第157页。

<sup>152</sup> 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5-104.htm>（2018年11月26日查阅）。类似的话他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次深入采访时也说过。见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毛泽东与中国革命》，1974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费舍出版社出版，第140-142页。

<sup>153</sup> 引自马妮科·V.·苏里：《看中国》，出处同上，第241页。

<sup>154</sup> 赫尔穆特·施密特：《人民与权力》，1987年柏林出版，第359页。

中国对康德的重视始于 19 世纪末。两次“鸦片战争”和 1894/95 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外国日益增长的控制势力凸显了中国的软弱和落后，这首先在知识分子中引发了一场关于软弱原因的辩论。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化及其未来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人们也在寻求新方案。

对康德的普遍兴趣可能与他所思考的核心问题有关：首先，所有事物都是矛盾的，但这一矛盾可以在更高的综合层面得到消解，这种万物二元性与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非常接近；其次，康德提倡运用自己的理智，即独立思考（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少知识分子受此启发）；第三是康德关于“永久和平”的学说。在其《永久和平论——一部哲学的规划》（1795）<sup>155</sup>一文中，他探讨了国家之间是否存在，以及如何保障永久和平的问题，这是他最著名的论著之一，甚至对后来的《联合国宪章》都产生了影响。康有为（1858-1927），近代中国最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也受到康德“永久和平”思想的启发，在其代表作《大同书》中，康有为设计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世界社会，“永久和平”的概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56

---

<sup>155</sup> 伊曼努尔·康德：《永久和平论——一部哲学的规划》，2016 年柏林出版。

<sup>156</sup> 见康有为：《大同书》，2002 年北京出版，第 230 页；德译本 1974 年杜塞尔多夫、科隆联合出版，第 190 页。关于康有为与康德思想的相通之处亦见王斑：《人性美学与大同世界：康德与康有为》，载于《范式》，2015 年 1 月 15 日，<https://stateofthediscipline.acla.org/entry/aesthetic-humanity-and-great-world-community-kant-and-kang-youwei>（2018 年 12 月 26 日查阅）。文学研究学者王斑认为，在当时那个以殖民主义与民族国家彼此竞争为特点的世界，存在滋养康有为式与康德式愿景的共同土壤，即寻求世界新秩序的“美学化政治愿景”，出处同上，第 3 页。



康有为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庞思奋认为，在思想行为上中国人与康德之间是存在相似之处的，孔子与康德有许多共同的信念，与“康德式”的立场极为契合：在“孝道”上（康德认为作为自己有长兄照顾弟妹的责任），在对鬼神的某种信仰上，在其独特的逻辑性等方面，庞思奋认为都有类似的地方。<sup>157</sup>但最终他还是对此观点有所限定：

“康德有多‘中国化’？其实也不是**特别**‘中国化’。但作为服务于潜在的极富意义的文化间际对话的基础，他的‘中国化’已经足够。这是一种可以让我们洞察一个**世界**的对话，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哲学家——其实是所有人——都能在理论与实践，权力与义务，经验和超验，东方和西方之间找到先验的平衡。”<sup>158</sup>

康德一生都没有到过家乡柯尼斯堡 30 公里以外的地方，但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思想的代表。庞思奋还提到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要素，即在这座位于联通西欧与远东的商路上的繁华港口城市，康德接触到了居住于此

---

<sup>157</sup> 庞思奋，同上，第 5 页起。

<sup>158</sup> 同上，第 13 页。

的中国商人。他指出康德曾在文稿中提到：“这些中国商人在他们店铺的牌匾上写着烫金大字‘本店无欺’。”<sup>159</sup>



作者在柯尼斯堡康德墓前（2017）

历史学家沃尔夫·勒佩尼斯（1941 年生于东普鲁士阿伦施泰因）2012 年曾撰文谈及他同中国哲学教授甘阳（1952 年出生）的一次对谈，这是德国在北京举办《启蒙的艺术》展览期间，同步进行的论坛（《启蒙之对话》）上的一场讨论，他在文中详细引述了甘阳的发言。甘阳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政治哲学专业，是中国“新左派”<sup>160</sup>的代表人物。勒佩尼斯写道：

<sup>159</sup> 加布里埃尔·拉贝尔：《康德》（译本），1963 牛津出版，第 289 页；同上，庞思奋，第 14 页（脚注 5）。庞思奋还提到威利巴尔德·柯林科著，迈克尔·布洛克翻译（伦敦，1952）的《普通人读康德》一书，对此该书也有述及。

<sup>160</sup> “新左派”指一股知识分子思潮，其代表人物批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不断加剧的贫富差异等新资本主义元素在中国占优势地位的状况，要求对市场及私营经济加以限制，通过一个强大的国家

“甘阳教授表示，如果又要谈康德和他的《什么是启蒙》，他会感到厌倦。”在此他引用教授本人的话：

“如果我们问，中国现在需要什么样的启蒙，那么我们首先要问中国现在最大的迷信是什么？中国现在最大的迷信就是对西方的迷信，特别是对西方第二次启蒙的迷信。正是这种现代迷信，实际使得现代中国人几乎不会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因为他们认为必须求助‘西方人的理智’，我的结论因此是，现代中国人如果要‘用自己的理智’而‘不需要别人的指引’，就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特别是对西方第二次启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sup>161</sup>

近几年来，甘阳致力于儒学在中国的复兴和建立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sup>162</sup>毫无疑问，他的世界观是决定他对康德思想持批判态度背后的原因。但在记录《启蒙之对话》论坛内容的书中，甘阳的表达要温和些，他一方面谈到自己的看法在中国社会不具有代表性，发言仅仅只是阐发个人观点，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对康德是非常尊重对。<sup>163</sup>

在这次论坛对话中，对康德启蒙思想的批评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学者、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王歌。她援引出生于柯尼斯堡的哲学家约翰·格奥尔格·哈曼（1730-1788）对观点，提出质疑：“引导他人的独立思考，甚至强迫他们这样做，是否也是一种约束？那么启蒙岂不是退化成反启蒙了吗？”<sup>164</sup>

---

实现更大的分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新左派”的代表们倡导回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重新评估文化大革命。

<sup>161</sup> 见沃尔夫·勒佩尼斯：《康德没有到中国》，载于《世界报》，2012年1月19日。

<sup>162</sup> 关于甘阳，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8%E9%98%B3/14810?fr=aladdin>（2019年5月25日查阅）。

<sup>163</sup> 更多详细内容见甘阳：《启蒙与迷信》，载于《启蒙之对话：中德之间的一次彼此靠近》，墨卡托基金会编辑，2013年埃森出版，第32-37页。

<sup>164</sup> 王歌：《启蒙的晦暗》，载于《启蒙之对话》，第13-17页。

不过，德国古典哲学常识依然被纳入 2019 年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内容，这里还特别提到了有关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谢林和费尔巴哈的知识点。<sup>165</sup>

## 第二节 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 中国，“涂着防腐香料的木乃伊”



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

赫尔德的中国观受到其新教圣经教义熏陶下形成的世界观的影响，尽管他心中的中国形象偏向消极，某些部分甚至带有不少偏见，但如果因此就简单地将他归入“东方主义”的范畴，未免过于片面。“东方主义”这

---

<sup>165</sup> 2019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常识备考技巧——德国古典哲学，  
<http://m.shantou.huatu.com/2018/0731/1564540.html>（2019 年 3 月 16 日查阅）。

一概念是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和优越感，对非西方社会（此处指对中国及其社会）的一种贬低。<sup>166</sup>而且，赫尔德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其实非常矛盾，一方面他赞赏耶稣会的使命及其在中国所发挥的作用，认为他们向欧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关于中国的认知，而且不仅在中国承担传教的宗教使命，还致力于传播科学与艺术，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同时也批评罗马方面对中国和耶稣会使命的粗暴干预，以及梵蒂冈面对关于中国文化不恰当的“过于正面”的描述时所采取的态度。谈到中国帝王对基督教所持的保留态度，赫尔德表示理解，他认为中国君主当中也有“开明王侯”，他赞赏儒家的“中庸”之道<sup>167</sup>，从中看到了维系世界所需的某种力量平衡。<sup>168</sup>另一方面，关于中国及其文化，赫尔德又有极为负面的表达，比如他曾经写道：

“科学上的那种自由而伟大的发现才能在他们身上，[···]仿佛已颓败于自然。相反，大自然却毫不吝惜地赋予他们小眼睛、圆滑世故、狡猾的钻营和精明以及对凡是于他们的贪婪有利的便进行仿造的艺术才能。

[···]

他们的医术就像他们做买卖那样，是些精明的、骗人的把戏，充分地暴露出他们虽然精明透顶却愚昧无知的秉性。在历史上保持自己显著的特点是该民族的标志，因为事实表明，它靠自己高度发展的政治文化从蒙古种族脱胎出来，而没有或者说不可能被其他民族所同化。他们除了为自己在世界一隅像犹

---

<sup>166</sup> 见罗尔夫·J·戈贝尔：《中国，经过防腐处理的木乃伊：赫尔德的东方主义诗学》，载于《南大西洋评论》，第60卷，1955年第1期，第111-129页；关于东方主义的概念参见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1981年法兰克福等地联合出版。

<sup>167</sup> 参见《孔子：中庸》，2018年斯图加特出版。

<sup>168</sup> 关于赫尔德观点的矛盾性见安娜·勒希特一部很有意思的书稿《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理念、关于人性的通信与〈阿德刺斯忒亚〉杂志中的文化理论与人性观》，2005年维尔茨堡出版，尤见第192页及其后数页；亦见夏瑞春：《欧洲文学里的中国形象》，出处同前，第451-455页。

太人那样因未受其他民族的同化而感到自负骄傲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值得骄傲的东西。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获得了一些零碎知识，他们的语言结构、国家政体、社会机构以及思维方式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正如他们不喜欢树木嫁接那样，他们在与其他民族的接触中至今仍还保持着自己的特点。这是一个在世界一隅形成了中国式奴隶制文化的蒙古人后裔。”<sup>169</sup>

赫尔德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印象，与当时流传的文献和其中所包含的偏见有关，这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形象的一部分。

迄今为止，赫尔德在中国的接受很有限，这可能与他对这个国家及其文化的负面描述有关。虽然对中国当代民族话题的讨论影响力有限，但最近仍不乏关于赫尔德的“民族”定义的讨论，较早也有针对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的研讨。<sup>170</sup>

上海历史学家许纪霖前不久谈到构建世界新秩序的问题时提出一个观点，认为赫尔德早就指出存在多样、独特和平等的文化；没有哪个民族会被选中，必须是所有人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共同寻找真相。在他看来，为避免国家与文化之间的残杀，需要一个康德式的普遍、永久的和平秩序，不能以西方文明的游戏规则为准则，也不能从对抗性的反西方逻辑之中获得，新的普遍性应该是天下人所共享的普遍性，是不同国家与文化之间所获得的“重叠共识”。<sup>171</sup>许纪霖的论述表明，赫尔德与康德这两位东普鲁士思想家，在当前中国关于世界新秩序，以及中国在其中所处地位的论辩中，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

<sup>169</sup> 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人类历史的哲学观念》，出自《全集》第6卷，1989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435-436页。

<sup>170</sup> 庞文薇：《论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论语言起源〉一文中若干概念的中文翻译》，载于《文学之路》（中德语言文学文化研究年刊），第16卷（2015），海德堡出版，第443-450页。

<sup>171</sup> 许纪霖：《新天下主义：重建中国的内外秩序》，

<http://www.gongfa.com/html/gongfazhuanti/zhonghuazhengdao/2015/0826/2853.html>（2018年12月28日查阅）。在中国传统中，“天下”即指万物共存的世界。在其他文章中，许纪霖还曾论及哲学家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及其将现实视为矛盾与对立事物统一体的辩证的现实观。

### 第三节 记忆文化的矛盾：康德、赫尔德与欧洲人眼里的中国形象——理想化与妖魔化

康德与赫尔德的观点是德国对中国的接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至少部分基于那些来自海员、商人和传教士的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见闻，而他们的讲述通常传达的是个人观点，缺乏对其他文化的认知和理解。

事实上，欧洲人眼里的中国形象一直在理想化与妖魔化之间摇摆。尤其自16世纪末期起，有关中国的新认识通过耶稣会士传到西方。康德对中国的赞美之词主要都是基于这些传教士的见闻。意大利人利玛窦，16世纪耶稣会中国教区的奠基人，向因常年战乱（尤其是三十年战争）而陷于贫瘠荒凉的欧洲传递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形象。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强大帝国，有一位恪守千年道德习俗的贤明统治者，关心其子民疾苦；这个帝国将和平、道德和人民富裕视为最高价值，有着高度发达的文化。<sup>172</sup>

新的世界展现在眼前，这在欧洲学者，尤其是启蒙学者身上产生了连锁效应，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以及法国的伏尔泰、卢梭等17、18世纪的哲学家们被中国哲学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政治社会体系深深吸引，在各自的论著中不吝笔墨将其理想化。莱布尼茨就在1691年出版的《中国近事》一书中写道：“设若选一位贤明的人来做裁判，[...]判定哪一国的人民最优秀的话，那他一定会把金苹果扔给中国人的”，他很笃定地认为，“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今天终于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

---

<sup>172</sup> 参见文森特·克罗宁：《西方智者：利玛窦和他的中国使命》，1955年伦敦出版。关于早期德国人眼里的中国形象参见熊伟：《早期中德文化交往》，载于郭恒钰、罗梅君（主编）：《19世纪至今的中德关系》，1991年慕尼黑出版，第13-22页。

即欧洲和中国”。<sup>173</sup>他甚至提到有必要将中国传教士请到欧洲，以终止道德沦丧的现状。<sup>174</sup>

在物理学家、哲学家格奥尔格·克利斯托夫·利希滕贝格（1742-1799）眼里，中国是“上帝的领地上最智慧、最公平、最有思想和最幸福的民族”。<sup>175</sup>如前文所述，康德的部分看法也与他有相似之处。

但这股中国热并非在任何地方都受到追捧，尤其是天主教会为了巩固自己的合法性，拒绝正面的中国形象，更倾向于把中国描绘成“异教淫秽的滋生地”，成千上万“疯癫的异教徒”身处其中困顿挣扎。在这样的背景下，前文提到过的哲学家，莱布尼兹的学生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因为在哈勒的一次演讲中赞美中国的哲学和文化，将孔子与耶稣、摩西和穆罕默德相提并论，遭到天主教会的排挤，被驱逐出萨克森。<sup>176</sup>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晚年也表现出浓厚的中国情结。和其他许多人不同，他更多强调德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共性，而非陌生与疏离。他曾经对自己的密友，作家约翰·彼得·艾克曼（1792-1854）说，中国这个民族，其实“与德国人非常相似”，“人们（指中国人——作者注）的想法与行为和我们几乎并无二致，大家很快会觉得彼此是一样的人，只是一切事物在他们那里更清晰，更纯粹，更道德”。<sup>177</sup>

尽管当时中国在许多方面看起来强于欧洲，但无可否认，中国的现实情况被夸大和理想化了。而耶稣会士们偏又喜欢这样一种形象，以巩固他们在教会内部争斗中的地位。

---

<sup>173</sup>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中国近事》，海因茨-冈特·内塞尔拉德、赫尔曼·雷因波特编辑评介，1979年科隆出版，第19页。

<sup>174</sup> 出处同上。

<sup>175</sup> 格奥尔格·克利斯托夫·利希滕贝格：《论中国人的武馆与斋堂：除了那些新鲜事》，收录于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1985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103页。

<sup>176</sup> 参见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关于中国伦理学的演讲》，载于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1985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42-72页。

<sup>177</sup> 约翰·彼得·艾克曼：《歌德晚年谈话录》，1948年苏黎世出版，第227页；亦见熊伟：《早期中德文化交往》，载于郭恒钰、罗梅君（主编）：《19世纪至今的中德关系》，1991年慕尼黑出版，第19页；又见德博、夏瑞春（主编）：《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1996年海德堡出版。

可是这种对中国的理想化最终为陷入另一个极端的观点所取代，并通过水手、传教士、商人和旅行者散播开来。一方面是业已展开的对殖民地的抢夺，凭借技术与军事优势对世界的征服和欧洲各皇室巨额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法国大革命和人类精神文化根植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信念，导致一种史无前例的优越感在欧洲蔓延。受此影响，赫尔德与黑格尔勾勒出他们心目中劣等的中国形象，其走向没落的文化远逊于欧洲，而康德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可了这种观点。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曾反复以蔑视的笔触论及过中国人的“愚钝乏味”，他断言：“臣服于欧洲是亚洲帝国的必然命运，中国必然也要接受这样的命运。”<sup>178</sup>

效仿国家理论家孟德斯鸠（1689-1755），黑格尔也谈到了“东方专制主义”和作为群体的中国人及其个体的毫无价值。他认为，中国实际上没有历史，因为它几千年来就没有经历过大的变化。

在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眼里，中国属于“永恒静止的民族”之列，中国在他笔下“只剩废墟”。<sup>179</sup>就连卡尔·马克思所持观点也与黑格尔类似，他认为是英国人的大炮将中国从麻木状态（原文：“从世代相传的愚钝”）中唤醒，推动它进步。<sup>180</sup>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也隐晦地谈到过“可怜无用的中国人”，在他的观念里，这个概念是与缺乏创造性的大众，随大流，依赖本能联系在一起的。<sup>181</sup>

以上都是举足轻重的德国学者，他们的论述直到 20 世纪都还影响着和中国相关的记忆文化以及德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

---

<sup>178</sup>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历史哲学》，收录于《全集》第 12 卷，1970 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 179 页。

<sup>179</sup> 利奥波德·冯·兰克：《世界史（第一卷）：最古老的历史族群和希腊人》，1886 年莱比锡出版。

<sup>180</sup> 卡尔·马克思：《论中国：英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1972 年海德堡出版，第 30 页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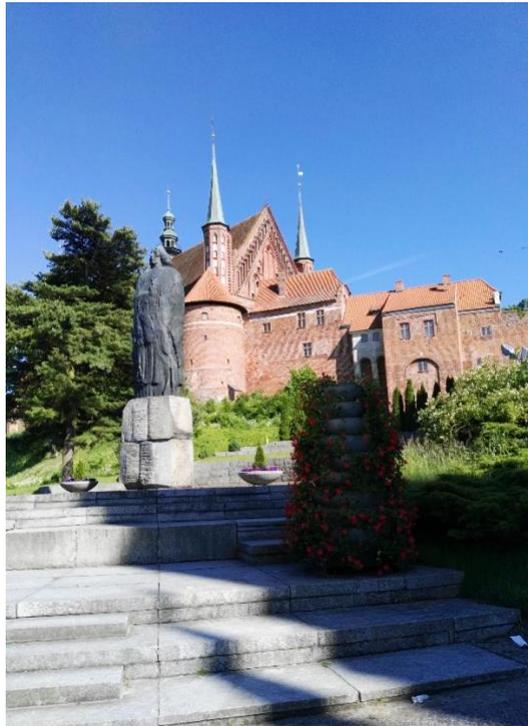
<sup>181</sup> 弗里德里希·尼采：《看哪这人》，出自弗里德里希·尼采：《全集》第 4 卷，1990 年慕尼黑出版，第 571 页。



## 第八章 东普鲁士与中国关系中丰富多样的记忆形象

### 第一节 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地球围绕太阳运行

著名天文学家、制图学家、医生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虽然出生在当年西普鲁士境内的托伦市，但直至离世他一直在东普鲁士弗劳恩堡的艾门兰采邑主教区做牧师。他提出“日心说”，认为地球是众行星之一，它们在绕轴心自转的同时都围绕太阳运行。哥白尼死后被葬在弗劳恩堡（弗龙堡）大教堂（旧属布劳恩斯贝格县）。耶稣会传教士，伽利略的学生邓玉函（1567-1630），也是一位博学家，将哥白尼的理论及其他自然科学知识和世界观带到中国（如日心说），哥白尼及其学说由此名扬中国。<sup>18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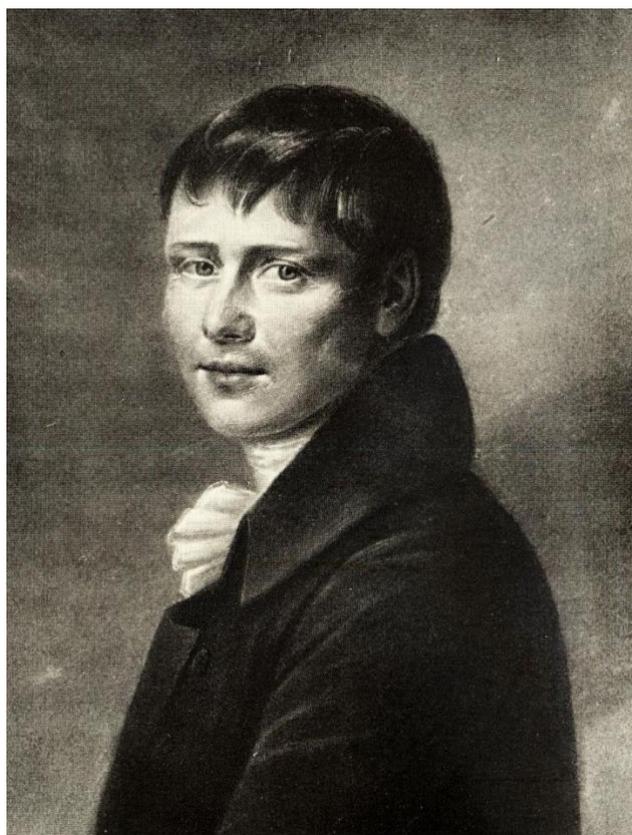
弗龙堡大教堂前的哥白尼雕像（2017）

<sup>182</sup> 参见莱纳·K·拉格勒：《哥白尼在紫禁城——耶稣会士邓玉函如何将异教徒的学说传到中国》，2007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亦见席文：《中国古代科学——研究与反思》，第四章“哥白尼在中国，或是好心误入歧途”，1995年奥尔德肖特出版，第63-122。

[https://www.sas.upenn.edu/~nsivin/from\\_ccat/cop.pdf](https://www.sas.upenn.edu/~nsivin/from_ccat/cop.pdf)（2019年2月17日查阅）。

## 第二节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和托马斯·曼在东普鲁士：文坛巨匠

在东普鲁士留下印记的伟大短篇小说家和作家中，有著名的戏剧家、小说家、诗人和政论家贝恩德·海因里希·威廉·冯·克莱斯特（1777-1811）和托马斯·曼（1875-1855）。冯·克莱斯特虽然不是出生在东普鲁士，但 1804 至 1807 年曾在柯尼斯堡做候补公务员，并在此期间创作完成多部重要作品，如《破瓮记》，喜剧《安菲特律翁》，悲剧《彭忒西利亚》，以及《米迦勒·寇哈斯》、《智利地震》等短篇小说。也正是在这里，他决定放弃公职，从此以写作为生。在中国克莱斯特被视为文学大师，为人熟悉和尊重，其多部作品被译成中文。<sup>183</sup>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

<sup>183</sup> 参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5%9B%A0%E9%87%8C%E5%B8%8C%C2%B7%E5%86%AF%C2%B7%E5%85%8B%E8%8E%B1%E6%96%AF%E7%89%B9>（2019年5月7日查阅）。

托马斯·曼，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在库尔斯沙嘴上的尼达小镇建了一幢小屋。1930至1932年，在这片原属梅梅尔地区，一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划归立陶宛的土地上，他和家人共度了夏日时光。他是应柯尼斯堡歌德协会之邀来此作报告，在当地游览时认识并爱上了这里，进而决定按照当地风格在此修建一幢度假屋。出生于吕贝克的托马斯·曼在此创作了长篇小说四部曲《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的一部分，完成杂文《我的夏屋》等一系列作品。沙洲风光留给他的印象深深影响了《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这部作品里的风景描写。但是，当托马斯·曼及其家人1933年被迫离开德国之后，他们再也不曾回到尼达。1955年立陶宛政府在此建立“托马斯·曼文化中心”，1966年起才有了“托马斯·曼博物馆”。<sup>184</sup>

---

<sup>184</sup> 参见《尼达的托马斯·曼度假屋》，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编撰，<http://www.bpb.de/geschichte/zeitgeschichte/geschichte-im-fluss/135669/das-thomas-mann-haus-in-nida?p=all>（2019年4月12日查阅）；莱昂诺尔·马丁：《“建筑师莱斯曼丝毫未被遗忘……”——尼达托马斯·曼夏屋的建造者赫尔伯特·莱斯曼》，[https://www.verlagvopelius.de/cms/pdf.php?&lan=ger&journal=1&name=2\\_12&article=201202107](https://www.verlagvopelius.de/cms/pdf.php?&lan=ger&journal=1&name=2_12&article=201202107)（2019年4月12日查阅）；弗里多·曼：《尼达的三个夏天》，载于：《世界报》，2012年3月18日，<https://www.welt.de/print/wams/reise/article13928530/Drei-Sommer-in-Nidden.html>（2019年4月12日查阅）。



位于库尔斯沙嘴尼达小镇的托马斯·曼度假屋（2017）

托马斯·曼的大部分作品被译成中文，因此这位文坛巨匠在中国广为人知。<sup>185</sup>像王安娜所介绍的那样（见第七章第九节），托马斯·曼还曾是“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sup>186</sup>

### 第三节 尼达艺术家之村

20 世纪初，在库尔斯沙嘴上的尼达小镇（旧属梅梅尔领地，今属立陶宛）形成了一处艺术家聚居区（艺术家之村），库尔斯沙嘴令人印象深刻

---

<sup>185</sup> 参见百度百科词条托马斯·曼，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98%E9%A9%AC%E6%96%AF%C2%B7%E6%9B%BC/1361605>

（2019 年 4 月 12 日查阅）。孙长山（音）所著《托马斯·曼在中国的接受》对托马斯·曼与中国作家的联系，其在中国的影响及其作品的汉译情况作了非常精彩的概述，1995 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sup>186</sup> 参见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 171 页。“保卫中国同盟”由中国首位总统孙中山的遗孀创建，其宗旨是成为中外慈善机构之间的桥梁，超越党派筹募慈善物资和资金，用于救助贫困地区和那里的民众。除托马斯·曼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赛珍珠等也都是委员会成员，王安娜本人积极参与了该组织的工作。参见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 170-172 页。

的沙丘景观是吸引艺术家前来的因素之一。不仅是柯尼斯堡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还有大量拥有国际声望的著名艺术家也在此停留，让旖旎风光激发灵感，潜心创作。直到上世纪30年代，布罗德基金会还提供相关奖学金，尼达也因此被视为“东部的沃尔普斯韦德”。<sup>187</sup>许多在那里被创作出来的作品，其灵感都源自沙嘴上的风光。



今尼达的赫尔曼·布罗德博物馆

两位“桥社”<sup>188</sup>成员，闻名世界的德国表现主义画家马克斯·佩息斯坦（1881-1976）和卡尔·施米特-鲁特勒夫（1884-1976），还有曾求学于柯尼斯堡艺术学院的德国印象派主要代表之一，其后期画风转向表现主义的油画家、版画家洛维思·科林特（1858-1925，出生于塔皮奥）都曾有过一段在此生活和创作的时期。<sup>189</sup>三位艺术家在中国也都享有盛誉。<sup>190</sup>

<sup>187</sup> 沃尔普斯韦德是不莱梅附近一处著名的艺术家聚居村落。

<sup>188</sup> “桥社”是一个由表现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组成的艺术家团体，是早期现代派先驱。“桥社”1905年由恩斯特·路德维格·基尔希纳、弗里茨·布莱尔、埃里希·赫克尔和卡尔·施米特-鲁特勒夫创建，1913年在柏林解散。马克斯·佩息斯坦、奥托·米勒和库诺·阿米耶也曾是该团体成员。

<sup>189</sup> 关于尼达艺术家之村亦见约恩·巴尔福德：《尼达——库尔斯沙嘴上的艺术家汇聚地》，农舍工作室，2005年费舍胡德出版；贝尔特·施穆普克：《尼达——令人向往的风景》，2012年汉堡出版。

<sup>190</sup> 关于马克斯·佩息斯坦生平的中文详细介绍见 [http://www.sohu.com/a/246769210\\_653045](http://www.sohu.com/a/246769210_653045)（2019年4月13日查阅）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A9%E5%B8%8C%E6%96%BD%E6%B3%B0%E5%9B%A0>（2019年4月13日查阅）：“马克斯·佩息斯坦 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其中也介绍了他在东普鲁士尼达度过的时光。有关卡尔·施米特-鲁特勒夫的生平参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f6f65610101f443.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7f6f65610101f443.html)

#### 第四节 融入中国接受记忆的东普鲁士作家

东普鲁士浪漫主义作家和作曲家 E.T.A.·霍夫曼（1776-1822，出生于柯尼斯堡），小说家和剧作家赫尔曼·苏德曼（1857-1928，出生于海德克鲁格县马其肯）的多部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后者的小说《名誉》和《忧愁夫人》在中国，特别在中国现代女性运动中引起了巨大反响。<sup>191</sup>



立于希卢泰（立陶宛，旧称海德克鲁格）的赫尔曼·苏德曼纪念胸像，

---

（2019年4月13日查阅）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1%E5%B0%94%C2%B7%E6%96%BD%E7%B1%B3%E7%89%B9-%E9%B2%81%E7%89%B9%E5%8B%92%E5%A4%AB>（2019年4月13日查阅）：“卡尔·施米特-鲁特勒夫 德国画家”。洛维思·科林特的生平见 [http://www.sohu.com/a/215735537\\_359249](http://www.sohu.com/a/215735537_359249)（2019年4月13日查阅）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cac020102e8a9.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cac020102e8a9.html)（2019年4月13日查阅）：“德国印象派画家 Lovis Corinth 油画作品欣赏”。

<sup>191</sup> 参见冯平，刘东岳，牛江涛（编著）：《中欧现代著名作家》，2006年北京出版；亦见罗福林（编）：《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争议》，2005年纽约、霍德米尔联合出版，第44页。

诗人和短篇小说家约翰内斯·波勃罗夫斯基（1917-1965，出生于蒂尔西特）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中文。<sup>192</sup>战后波勃罗夫斯基长期生活在民主德国，直到去世，在他蒂尔西特的故居挂有一块德俄双语的纪念牌。在立陶宛的威尔基斯基（旧称威尔基什肯，属梅梅尔）有常设的波勃罗夫斯基生平展，那里还陈列着他柏林工作室的家具，之所以在此地设展是因其小说《立陶宛的科拉维耶雷》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纪念诗人约翰内斯·波勃罗夫斯基百年诞辰的诗集

---

<sup>192</sup> 参见 <https://www.douban.com/note/187097827/>（2019年5月11日查阅）：波勃罗夫斯基（Johannes Bobrowski）诗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6%E7%BF%B0%E5%86%85%E6%96%AF%C2%B7%E6%B3%A2%E5%8B%83%E7%BD%97%E5%A4%AB%E6%96%AF%E5%9F%BA/4613968?fr=aladdin&fromid=11194036&fromtitle=Johannes+Bobrowski>（2019年5月11日查阅）：“约翰内斯·波勃罗夫斯基”；  
[https://de.wikipedia.org/wiki/Johannes\\_Bobrowski](https://de.wikipedia.org/wiki/Johannes_Bobrowski)（2019年5月11日查阅）：“Johannes Bobrowski”。

与中国相关的还有在中国备受推崇的西格弗里德·伦茨（1926-2014，出生于东普鲁士吕克）的作品，以及女作家和女民谣诗人阿格涅·米盖尔（1879-1964，出生于柯尼斯堡）的作品，在叙事诗《中国歌谣》（1907）里她化身中国皇太后，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追忆往昔岁月。<sup>193</sup>纳粹倒台后米盖尔受到猛烈批评，因为她不仅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而且在第三帝国灭亡后对于同纳粹政府的瓜葛全无自我反省和批评。

最后要提到的是同样来自柯尼斯堡的作家，现代旅游文学的创始人之一奥伊根·蔡博（1851-1924）。1903年西伯利亚铁路通车后他乘火车从德国前往中国游历。在1904年出版的《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去中国》一书中，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向读者描述了这个国家和人民，以及那里的风俗习惯。<sup>194</sup>

## **第五节 数学家克里斯蒂安·哥德巴赫（1690-1764）、大卫·希尔伯特（1862-1943）、赫尔曼·闵可夫斯基（1864-1909）和“柯尼斯堡桥问题”**

数学家克里斯蒂安·哥德巴赫 1690 年出生于柯尼斯堡，1764 年这莫斯科去世，因其提出的“哥德巴赫猜想”使他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哥德巴赫猜想的内容是任一大于 2 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质数之和，这是迄今仍未被证明的重要数字理论之一。哥德巴赫被沙皇彼得大帝任命为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彼得二世的教师。中国有许多知名数

---

<sup>193</sup> 参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A0%BC%E5%BC%97%E9%87%8C%E5%BE%B7%C2%B7%E4%BC%A6%E8%8C%A8>（2019年5月9日查阅）；谭晋复（音）：《1949-1989中德文化关系的发展》，1997年雷根斯堡出版，第246页；张毅（音）：《德语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史——从开端到当代》，2007伯尔尼等地联合出版，第122页。

<sup>194</sup> 2014年此书由埃因贝克科学出版社重新出版。原版参见：

<https://archive.org/stream/aufdersibirisch00zabegoog#page/n11/mode/2up>（2019年2月25日查阅）。

学家都曾对他提出的这个猜想展开研究，其中就包括陈景润，1966年他完成了至今最接近哥德巴赫猜想的论证。<sup>195</sup>

大卫·希尔伯特（1862-1943）也来自柯尼斯堡，在其研究领域算得上是现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和数学基础理论家之一，对20世纪的数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人眼中，希尔伯特是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数学大师之一，其多部著作以及生平传记都已被译成中文出版。<sup>196</sup>

数学家赫尔曼·闵可夫斯基（1864-1909）出生于亚力克索塔斯（当时位于波兰境内，今属立陶宛）一个犹太家庭，其父母因害怕针对犹太人的迫害于1872年流亡至柯尼斯堡。闵可夫斯基在这座普列戈利亚河畔的城市长大，15岁便中学毕业获得大学入学资格，进入柯尼斯堡大学数学专业学习。他创立和发展了几何数论，并运用几何学的方法解决数论、数学物理和相对论领域的问题。在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任教期间，他曾是爱因斯坦的老师。获得哥廷根大学教席之前，闵可夫斯基先后被聘为波恩、柯尼斯堡和苏黎世大学教授，后来他一直在哥廷根大学任教，直至因阑尾穿孔过早离世。<sup>197</sup>

和柯尼斯堡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的还有“柯尼斯堡桥问题”。1736年著名数学家伦哈德·欧拉（1707-1783）利用此数学谜题来解答一个数学问题，并最终揭开谜底。

这个谜题涉及到柯尼斯堡城内普列戈利亚河上的七座桥。欧拉的问题是：是否可以经过所有七座桥，但不重复经过任一座桥，穿过城市回到起点，最终他成功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并由此催生了新的数学研究领

---

<sup>195</sup>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3月19日）：“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与哥德巴赫猜想”：[http://www.cssn.cn/ddzg/ddzg\\_ldjs/ddzg\\_wh/201003/t20100319\\_812703.shtml](http://www.cssn.cn/ddzg/ddzg_ldjs/ddzg_wh/201003/t20100319_812703.shtml)（2019年2月24日）。

<sup>196</sup> 见<http://xuewen.cnki.net/CJFD-SSJS198303015.html>（2019年2月24日查阅）：数学家传《希尔伯特》中译本已出版；此网页还可查询到希尔伯特多部被译成中文的著作。

<sup>197</sup> 关于赫尔曼·闵可夫斯基的生平参见：马克斯·博扬：《赫尔曼·闵可夫斯基逝世50周年回忆录》，《自然科学》第46卷，1959年出版，第500-505页；中文页面对其的褒扬见<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7%B5%E5%8F%AF%E5%A4%AB%E6%96%AF%E5%9F%BA/10734>（2019年4月4日查阅）：闵可夫斯基。

域（图论和拓扑学）。<sup>198</sup>在中国，熟知“柯尼斯堡桥问题”的不仅仅是专业人士，在校学生也对此津津乐道，这无疑促进了人们对柯尼斯堡的认知，提升了这座城市的知名度。<sup>199</sup>中国的互联网上与此相关的条目多达 50000 多条，其中有些还专门针对中学生，下图便是一例（图片文字首先对柯尼斯堡作了简要介绍）：<sup>200</sup>



用图示向中学生解释“柯尼斯堡七桥问题”

## 第六节 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阿诺德·索末菲：量子物理学与相对论

<sup>198</sup> 对此明了易懂的解释可参见蕾娜·鲍尔：《数学的传统问题——柯尼斯堡桥问题》，马尔堡大学，[http://www.mathematik.uni-marburg.de/~bschwarz/Sem\\_09W\\_files/02%20Lene%20Baur%20-%20K%C3%B6nigsberger%20Br%C3%BCckenproblem%20-%20Ausarbeitung.pdf](http://www.mathematik.uni-marburg.de/~bschwarz/Sem_09W_files/02%20Lene%20Baur%20-%20K%C3%B6nigsberger%20Br%C3%BCckenproblem%20-%20Ausarbeitung.pdf)（2019年4月1日查阅）。

<sup>199</sup> 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3%E6%A1%A5%E9%97%AE%E9%A2%98/2580504>（2019年4月1日查阅）：七桥问题。

<sup>200</sup> 参见 <https://www.doc88.com/p-4009051634986.html>（2019年4月1日查阅）：柯尼斯堡七桥问题。

卓越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阿诺德·索末菲 1868 年出生于柯尼斯堡，1952 年在慕尼黑去世。作为理论物理教授他最后的执教之地是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慕尼黑大学，并主持该校“理论物理中心”的工作。在量子物理和相对论领域，他是与马克斯·普朗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尼尔斯·玻尔齐名的伟大物理学家，虽然其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次数（81 次）远超其他物理学家，却始终和这项荣誉失之交臂。但是，他却造就了沃纳·海森堡、沃尔夫冈·泡利等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22/23 年间索末菲作为大学教师出国研讨交流，曾到访过中国、印度和日本。<sup>201</sup>至今中国互联网上仍不乏盛赞其在理论物理方面贡献的内容，他的绝大部分著述也都刊登在中国的网络上，部分还被译成中文。<sup>202</sup>

---

<sup>201</sup> 更多关于阿诺德·索末菲的内容参见迈克尔·艾卡特：《阿诺德·索末菲传——原子物理学家和文化使者 1868-1951》，2013 年哥廷根出版；阿夫里尔·麦克唐纳：《二十世纪著名科学家阿诺德·索末菲》，1995 年底特律出版。

<sup>202</sup> 如 <http://book.kongfz.com/14170/1131194560/>（2019 年 3 月 12 日查阅）：《热力学与统计学》。



阿诺德·索末菲教授

### **第七节 阿瑟·齐默尔曼：被免职的外交官**

阿瑟·齐默尔曼（1864-1940）出生于马祖里省的奥莱茨科，曾就读于柯尼斯堡大学法律专业，1893年进入外交领域工作，职位升至国务秘书。1896年他受外交部委派赴德国驻广州领馆履职，1900年就任领事，是“义和团运动”的时代见证者。1902年齐默尔曼返回德国，后卷入爱尔兰和印度的暴动以及俄国革命等事件（包括1917年列宁借道德国返俄事件）。此外，他还曾允诺墨西哥政府，一旦该国对美国发起进攻将提供支持，并助其收回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和德克萨斯州。他的出名主要是因为1917年那

份所谓的“齐默尔曼电报”，在电文里他表示德国（和日本）将向墨西哥提供经济与政治上的援助。这份电报落到美国政府手中，成为导致美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因素之一，也因为这次事件齐默尔曼不得不引咎辞职，中断了自己的外交生涯。<sup>203</sup>

## 第八节 汉娜·阿伦特（1906-1975）：伟大的政治哲学家

近现代还有一位来自东普鲁士的女性对中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她就是汉娜·阿伦特，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她来自柯尼斯堡一个特殊的犹太家庭，出生于汉诺威，后随父母回到柯尼斯堡并在那里长大，直至获得中学毕业文凭和普通大学入学资格。她先后在马尔堡、弗莱堡和海德堡师从多位著名哲学大师（马丁·海德格尔、尼古拉·哈特曼、埃德蒙德·胡塞尔和卡尔·雅斯贝斯）研习哲学和新教神学。纳粹政权上台后，阿伦特流亡法国，后来去了美国，1939年她又设法将母亲从柯尼斯堡救出。有关阿伦特的生平和论著这里不再赘述，<sup>204</sup>我想更多谈谈她与中国的渊源。

---

<sup>203</sup> 阿瑟·齐默尔曼，全历史网站，<http://totallyhistory.com/arthur-zimmermann/>（2019年3月14日查阅）。

<sup>204</sup> 关于汉娜·阿伦特的生平与著述见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汉娜·阿伦特——生活、著作与时代》，2015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汉娜·阿伦特

1949 年秋，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完稿，她在书中论述说，极权主义概念首先适用于像纳粹和苏联斯大林统治这样的体制。<sup>205</sup> 尽管其分析后来也被运用到对毛泽东极权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反思中，但她并不认为中国实行的是极权主义制度。由于对毛泽东时代“敷衍含糊”的分析，令阿伦特日后遭到批评。<sup>206</sup>

2015 年《阿伦特手册》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同年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来自德国、中国和台湾地区的专家们就汉娜·阿伦特对现代中国

---

<sup>205</sup>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1986 年慕尼黑出版。

<sup>206</sup> 彼得·贝尔：《中国例外：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与中国》，载于：《欧洲政治理论期刊》，第 9 卷第 3 期（2010），第 267-286 页，[http://peterbaehr.99scholars.net/uploads/9/0/5/3/9053324/arendt\\_ejpt.pdf](http://peterbaehr.99scholars.net/uploads/9/0/5/3/9053324/arendt_ejpt.pdf)（2018 年 12 月 8 日查阅）。

和欧洲的意义进行了讨论。此前不久，她所著《康德政治哲学讲稿》<sup>207</sup>也译成中文出版。对此，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这样报道：

“对有兴趣探究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平庸之恶’，公民思考与行为的道德责任和极权主义本质，希望吸取过去血的教训，避免未来悲剧的中国读者而言，毫无疑问这本书[...]是很有吸引力的。”<sup>208</sup>

该文引用译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寅丽的话说，“探究极权主义的起源是汉娜·阿伦特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两种类型的政府：好政府和坏政府。如果一个政府是为了共同利益，那么它就是一个好政府，反之亦然。但极权主义却宣称自己是历史的代理人，摧毁了个性、法律、道德等一切。[...]让我们回想一下文革期间（1966-1976）的那些野蛮罪行，人人被迫去迫害他人。[...]而思考与理智正是康德哲学的核心要素。”<sup>209</sup>

上海复旦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洪涛也补充说：“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来自柯尼斯堡，阿伦特对康德有着特殊的尊重。所有哲学家都鄙视政治，唯独康德例外。[...]当我还在读大学时，就试图通过汉娜·阿伦特的著作去理解康德，但后来却发现，阿伦特解读的并不是康德，而是她自己的理论。”<sup>210</sup>

之所以作如此详实的引述，是因为它们表明，在中国等多个国家，东普鲁士哲学家的影响力至今尚存，而柯尼斯堡作为康德、阿伦特等人伟大哲学思想的孕育之地也同样受到关注。汉娜·阿伦特自己也曾写道：“从思维和判断方式上看，我始终都还是柯尼斯堡人”<sup>211</sup>，这里她想表达的应

---

<sup>207</sup> 德文版：汉娜·阿伦特：《判断——康德政治哲学讲稿》，1998年慕尼黑出版。

<sup>208</sup> 黄源凡（音）：《中国读者对汉娜·阿伦特思想的解读》，载于《环球时报》，2014年1月13日，<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837220.shtml>（2018年12月8日查阅）。

<sup>209</sup> 同上。

<sup>210</sup> 同上。

<sup>211</sup> 克劳斯·威格尔特：《文学与艺术——颠沛的生活：40年前汉娜·阿伦特抵达最终的驿站》，东西文化门户网站，<https://kulturportal-west-ost.eu/korrespondenzen/literatur-und-kunst-288>（2019年11月3号查阅）。

该是德意志、犹太人以及其他当地和外来群族的影响掺杂在一起，都在她的身上留下了印记。

### 第九节 王安娜（1907-1990）：两个世界的生活

王安娜本名安娜丽斯·冯·克莱斯特，出生于德国东部地区，也有资料显示她出生于东普鲁士，<sup>212</sup>但她本人未曾亲口提及自己的出生地。她在柏林攻读历史和语言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求学期间王安娜就热衷政治活动，反对纳粹主义，曾多次因此被捕。

在柏林，王安娜结识了共产党人王炳南（1908-1988），一位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在政治大学学习社会学。王炳南还是德国共产党（KPD）中国语言组书记和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他们于1935年在伦敦结婚，1936年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到中国，之后不久王安娜便诞下他们的儿子王黎明。

---

<sup>212</sup> 将东普鲁士视为王安娜出生地的有托马斯·坎普：《中德伉俪廖、王、吴、肖》（音），[https://www.uni-heidelberg.de/fakultaeten/philosophie/zo/sinologie/shan/nl-archiv/2011\\_NL53.html#4](https://www.uni-heidelberg.de/fakultaeten/philosophie/zo/sinologie/shan/nl-archiv/2011_NL53.html#4)（2019年3月19日查阅）；揭秘：八路军中唯一外籍女少校，<http://mip.nxing.cn/article/14701055.html>（2019年4月13日查阅），该网页还刊出了王安娜的八路军证件复印件；张路亚：《王安娜：嫁给革命的中国》，载于：《联合时报》，2009年8月31日，<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4810/node4851/node4864/userobject1ai36359.html>（2019年4月13日查阅）。也有其他资料认为她出生在但泽或是东波美拉尼亚（参见托马斯·坎普：《两个德国人在西安：1936年12月的王安娜与赫伯特·旺斯》，[https://www.zo.uni-heidelberg.de/sinologie/shan/nl-archiv/2007\\_NL08.html#6](https://www.zo.uni-heidelberg.de/sinologie/shan/nl-archiv/2007_NL08.html#6)，2019年3月19日查阅）。在维尔纳·舒德编辑出版的《库尔希纳德国文学日历（1973）》中（年刊第56期，1974年柏林、纽约联合出版，第606页），又提到她出生于当年和东普鲁士（柯尼斯堡大区）接壤的西普鲁士马林韦尔德大区（斯特拉斯堡县古日诺镇）。本书仍将王安娜的故事收录，概因绝大部分资料均提到她的东普鲁士出身，或者至少认为她来自与此地相邻的西普鲁士大区。Hier ein eindeutiger Hinweis auf Anna Wangs Geburtsnamen von Kleist: [https://books.google.de/books?id=vegnAQAAQBAJ&pg=PT109&lpg=PT109&dq=anna+wang,+von+kleist&source=bl&ots=BUIZ3IOxG3&sig=ACfU3U3vsKiIf09MDtaR66xo6Bkmp\\_ZbAg&hl=de&sa=X&ved=2ahUKewjXlqfVi6\\_pAhWQqaQKHaaCSwQ6AEwA3oECAkQAQ#v=onepage&q=anna%20wang%2C%20von%20kleist&f=false](https://books.google.de/books?id=vegnAQAAQBAJ&pg=PT109&lpg=PT109&dq=anna+wang,+von+kleist&source=bl&ots=BUIZ3IOxG3&sig=ACfU3U3vsKiIf09MDtaR66xo6Bkmp_ZbAg&hl=de&sa=X&ved=2ahUKewjXlqfVi6_pAhWQqaQKHaaCSwQ6AEwA3oECAkQAQ#v=onepage&q=anna%20wang%2C%20von%20kleist&f=false)



王安娜、王炳南和他们的儿子王黎明

回国后王炳南主要担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并作为候补委员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也曾在中共中央外事部门的多个领导岗位任职。

王安娜用自己的行动支持共产党，甚至还被授予红军少校军衔。抗日战争期间，她在重庆投身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以及中华民国首任总统的遗孀宋庆龄亲密共事。<sup>213</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炳南在外交领域的多个岗位任职，肩负各类外交使命，还曾就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sup>214</sup>上世纪50年代，二人结束了婚姻关系，从此天各一方。<sup>215</sup>1955年王安娜离开中国回到阔别20年的德国，在当时的民主德国定居。1950年代末期中苏矛盾爆发后她选择支持中国，1961年移居联邦德国，并组建了新的家庭。写作出版《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又译《嫁给革命的中国——译者注》）一书令她

---

<sup>213</sup> 更多关于王安娜生平的内容见中文文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5%AE%89%E5%A8%9C/936613>（2019年3月19日查阅）：王安娜；[http://agzy.youth.cn/zt/2017828kszt/sqldc125\\_135956/09/201801/t20180122\\_11319239.htm](http://agzy.youth.cn/zt/2017828kszt/sqldc125_135956/09/201801/t20180122_11319239.htm)（2019年3月19日查阅）：《八路军德籍女少校：亲历西安事变，追随宋庆龄》，“西安事变”所指事件是两位将领在西安城挟持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要求其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王炳南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http://www.china.com.cn/book/txt/2010-01/15/content\\_19242943.htm](http://www.china.com.cn/book/txt/2010-01/15/content_19242943.htm)（2019年3月19日查阅）：《王安娜：嫁给革命的中国》。

<sup>214</sup> 具体任职情况见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ziliao\\_665539/wjrw\\_665549/lrfbjbztl\\_665553/t40525.shtml](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ziliao_665539/wjrw_665549/lrfbjbztl_665553/t40525.shtml)（2019年3月19日查阅）：王炳南。

<sup>215</sup> 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5%AE%89%E5%A8%9C/936613>（2019年3月19日查阅）：王安娜；<https://www.wenjiwu.com/doc/hhnoni.html>（2019年3月19日查阅）：篇二，王炳南、王安娜的儿子王黎明。

知名度大增，书中她描述了 1936 年至 1949 年自己在中国以及投身中国革命的生活。<sup>216</sup>她在书的序言中写道：

“我在中国度过了 20 年，这是最有意义的 20 年光阴。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是从一种社会形式向另一种的过渡，从旧到新，从僵化到变革。我经历了旧社会的灭亡，千百万人所陷入的混乱以及他们对非人道现状的反抗；我经历了残酷战争带来的恐惧与痛苦，内战之下的劫掠蹂躏，以及中国革命最终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过去几十年发生在中国的一切，将作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中国革命是发生在亚洲国家的第一场大规模现代革命，还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地球上最多的人口，中华民族是最古老的文化民族之一，书写了绵延千载的历史。

在日常琐事的框架之外，世界各个地方的人都应通过了解而不单是假设去搞清楚那些貌似突然发生的改变的背景，进而尝试理解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以及那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sup>217</sup>

王安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娓娓道来，她在中国共产党从农民革命者到 1949 年夺取政权的发展道路上一路相随，是旧中国社会和新中国早期发展的重要时代见证者。

作为当年德中友协联合会主席（至 1990 年），我与王安娜（友协名誉主席）交往颇多，包括和她的前夫王炳南，直到去世他一直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同时也是德中友协名誉会员。

---

<sup>216</sup> 王安娜（1973）。

<sup>217</sup> 王安娜（1973），第 8-9 页。

## 第十节 来自东普鲁士的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亚瑟·埃韦特与亚瑟·伊尔纳（别名理查德·施塔尔曼）

埃韦特 1890 年出生于原东普鲁士北部艾尔西低地大区海恩里希斯瓦尔德镇（今斯拉夫斯克）的一户小农家庭，1959 年在（勃兰登堡州）埃伯斯瓦尔德市一家精神病医院去世。1908 年他加入德国社民党，一战前移民加拿大，并在那里从事社会主义运动。1920 年返回德国后加入德国共产党，1928 至 1930 年在德国国民议会任德共议员，还短期担任过德共议会党团副主席。<sup>218</sup>1932 至 1934 年，埃韦特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和远东局书记被派往上海，肩负秘密任务的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政治指导。不过，在中共当时关于党的工作重心是继续放在组织无产阶级和城市武装起义，还是发动农民在农村地区建立“解放区”的路线斗争中，他所发挥的影响力有限，最终毛泽东所代表的后一种立场占据上风。虽然埃韦特本人并不赞同毛泽东的观点，但依然为他提供了保护，因为经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层批准，毛泽东“在江西省苏维埃中央根据地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维埃共和国及其政府主席”。<sup>219</sup>

在巴西执行下一项任务时，埃韦特与夫人伊丽莎白·萨博洛夫斯基（1886 年出生于波尔茨米，后称波尔什门，旧属东普鲁士吕克大区，1939 年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牢房里去世）被巴西警察逮捕，遭受严刑拷打，埃韦特甚至亲眼目睹妻子被强奸和受刑。由于这件事的刺激，

---

<sup>218</sup> 详见 <https://www.bundesstiftung-aufarbeitung.de/wer-war-wer-in-der-ddr-%2363;-1424.html?ID=4261>（2019 年 8 月 10 日查阅）：亚瑟·埃韦特，生平摘自《德国共产主义者手册》，德国统一社会党（SED）独裁统治研究联邦基金会编写。

<sup>219</sup> 罗纳德·弗里德曼：《亚瑟·埃韦特（1890-1959）——一位德国共产主义者在三大洲的生活与磨难》，（为申请哲学博士学位）向波茨坦大学哲学学院提交的博士论文，2015 年波茨坦，第 290 页，有关埃韦特在中国的情况详见第 274-301 页，[https://publishup.uni-potsdam.de/opus4-ubp/frontdoor/deliver/index/docId/7302/file/diss\\_friedmann.pdf](https://publishup.uni-potsdam.de/opus4-ubp/frontdoor/deliver/index/docId/7302/file/diss_friedmann.pdf)（2019 年 8 月 9 日查阅）。

他精神失常。<sup>220</sup>在中共党史里，埃韦特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顾问在中国期间的工作至今仍受到高度评价。<sup>221</sup>



民主德国发行的亚瑟·埃韦特纪念邮票

亚瑟·伊尔纳（理查德·施塔尔曼，1891-1974）出生于柯尼斯堡一个木匠家庭，曾在柏林接受并完成木工培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伊尔纳成为柯尼斯堡士兵委员会成员，同年加入德国共产党，是东普鲁士地区领导层成员。1923年德共起义失败后他移民苏联并加入苏联国籍，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改名理查德·施塔尔曼。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派，他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许多国家工作，1927/28年间还曾到过中国。1927年“统一战线”，即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与中共的合作破裂后，斯大林要求建立共产主义武装，通过一系列城市武装起义暴力夺取政权。在此背景下施塔尔曼被派往中国，为计划在中国南方大都会广州（今广东省省会）发动的起义提供支持。作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他与其他苏联特工一道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制造和筹措武器，并进行有针

---

<sup>220</sup> 详见弗里德曼（2015）；亦见大卫·P·霍尔斯坦：《亚瑟·埃韦特：献给共产国际的一生》，1993年兰厄姆，纽约，伦敦联合出版。

<sup>221</sup> 参见王进：《李德是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http://www.mzfxw.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6&id=114053>（2019年8月9日查阅）；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24/c\\_114128324\\_2.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24/c_114128324_2.htm)（2019年8月9日查阅）：《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龙去脉》，载于《北京日报》，2012年12月24日。

对性的宣传，以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此外，他的任务还包括培训共产党人，让他们掌握内战策略和战术。1927年12月11日起义爆发，参与者达30000之众，但仅两天便被血腥镇压，6000多名共产党员牺牲。施塔尔曼暂时隐匿，后接到莫斯科的命令，要求其将周恩来（后出任共和国总理，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及另外几位共产党领袖安全转移出城，并护送他们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对此《纪念理查德·施塔尔曼》一书是这样记载的：

“他（施塔尔曼——作者注）该怎样进入‘中国居民区’呢？[...]中国同志将他乔装成流动摊贩，戴着大大的宽檐平顶帽，穿上适合小贩身份的衣服，胸前还挂着一个装货的托盘，化妆后几乎与中国人无异。凭借这身装束他成功进入‘中国居民区’，向周恩来传达了来自莫斯科的讯息。随后理查德又乔装成外国富豪，坐在周恩来和其他中国同志拉着的黄包车上出了城。在他的护送下，中国同志们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途。”<sup>222</sup>

后来施塔尔曼曾经写道，周恩来对这一幕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1953年访问民主德国时在一次会见活动上“立刻认出”了他，并“愉快地拥抱”了他。<sup>22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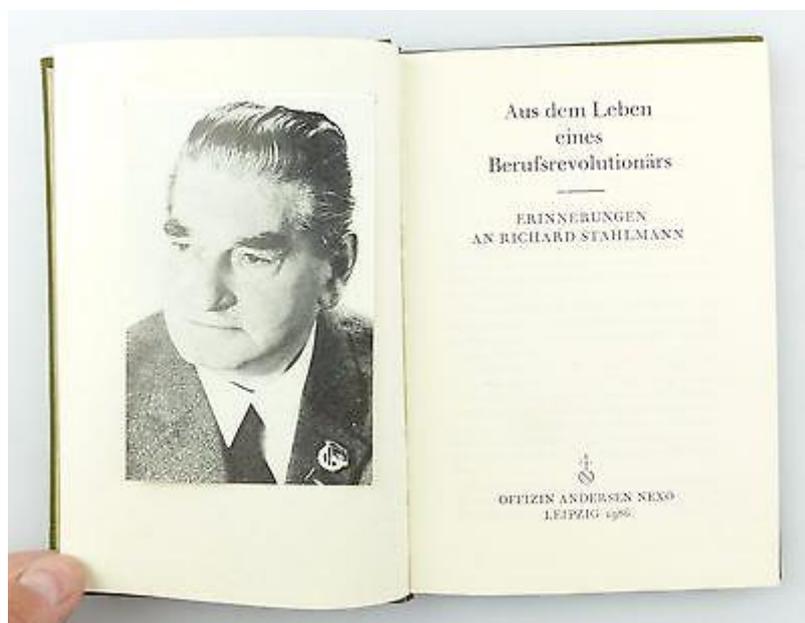
作为国际纵队营长施塔尔曼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同赫尔伯特·维勒一道在瑞典领导共产主义者反抗纳粹政府的运动。二战结束后他在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领导岗位任

---

<sup>222</sup> 《职业革命家的一生——纪念理查德·施塔尔曼》，1986年莱比锡出版，第32-33页。

<sup>223</sup> 参见马提亚斯·乌尔：《理查德·施塔尔曼（1891-1974）——受德国统一社会党秘密委派的世界革命帮凶》，收录于迪特·克鲁格、阿明·瓦格纳（主编）：《密谋为职——冷战中德国情报部门的首脑们》，2003年柏林出版，第84-110页；《职业革命家的一生——纪念理查德·施塔尔曼》（1986）。

职，并作为对外情报局副局长负责民主德国的海外谍报工作。<sup>224</sup>1960  
年以上校军衔退休。<sup>225</sup>



### 第十一节 来自东普鲁士的女政治家及作家利亚·拉宾

利亚·拉宾，1995 年被刺杀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的夫人，1928 年出生在柯尼斯堡，原名利亚·施洛斯伯格，2000 年拥有和平活动家、政治家和作家多重身份的她在以色列提克瓦去世。利亚·拉宾的祖父母 19 世纪从俄罗斯移民到德国，在柯尼斯堡经营一家纺织品商店。1933 年他们一家离开德国，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停留一段时间后迁居至巴勒斯坦。利亚及丈夫伊扎克·拉宾均有亲戚曾经在中国东北部城市哈尔滨生活，去世后被安葬在那里的犹太人公墓，其墓地保存至今，人们可前往参观。<sup>226</sup>

<sup>224</sup> 见联邦启蒙基金会：“理查德·施塔尔曼（亚瑟·伊尔纳）”，《生平手册：在民主德国谁曾经是谁？》，<https://www.bundesstiftung-aufarbeitung.de/wer-war-wer-in-der-ddr-%2363;-1424.html?ID=3356>（2019 年 8 月 27 日查阅）。

<sup>225</sup> 参见乌尔（2003），《职业革命家的一生》（1986）。

<sup>226</sup> 对此中文资料里有不同的说法。2009 年 11 月 4 日《环球时报》刊登的《哈尔滨不可磨灭的犹太遗产》一文提到，公墓安葬有利亚·拉宾的亲属，见 [http://www.china.org.cn/travel/2009-11/04/content\\_18827151.htm](http://www.china.org.cn/travel/2009-11/04/content_18827151.htm)（2019 年 3 月 12 日查阅）；其他部分资料则认为安葬的是其丈夫家族的亲



利亚·拉宾

## 第十二节 建筑师福尔克温·玛格与中国现代城市建设

建筑师福尔克温·玛格教授（荣誉博士）1936年出生于柯尼斯堡，是当代最负盛名的建筑师之一。玛格的建筑师事务所 gmp（格康、玛格及合伙人首字母缩写）作为中国业务最为成功的欧洲建筑事务所分别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设有分部，负责中国各类大型项目的设计，包括（广西省省会）南宁和中国南方大都会深圳的国际会展中心，上海浦东展览馆，重庆和（山东省）青岛大剧院，以及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展馆设施和（广东省）佛山、东莞等地的体育场、运动中心，还有上海附近效仿“汉堡中心湖”设计的可容纳 80 万人口的临港新城。

---

属，见《清明节期间哈尔滨皇山公墓管理处修缮犹太墓地》，来源人民网 2015 年 4 月 5 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5/0405/c136657-26801755.html>（2019 年 3 月 12 日查阅）。



建筑师福尔克温·玛格在中国<sup>227</sup>

### 第十三节 雕塑家和装置艺术家胡拜图斯·凡·登·高兹在黄浦江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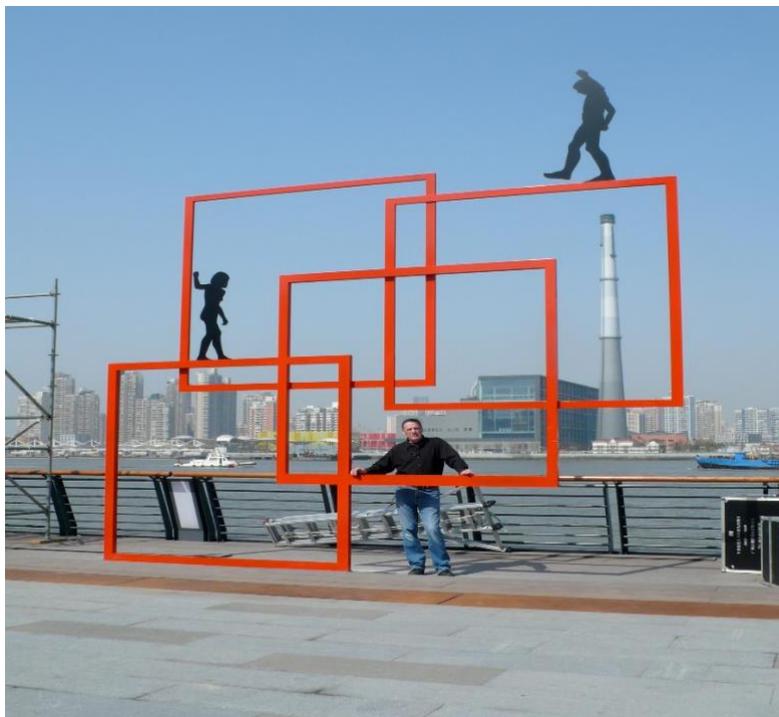
胡拜图斯·凡·登·高兹和前文提到的陆军元帅科尔马·凡·登·高兹（又译科尔马·冯·德高兹——译者注）来自东普鲁士的同一个家族。他 1941 年出生在旧属东普鲁士莫龙格县的大贝斯滕多夫，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德国雕塑家和装置艺术家。他在柏林、波茨坦两地工作生活，曾获得多项国际大奖，其室外金属装置作品令人印象深刻，在国际上具有颇高知名度。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上，凡·登·高兹也凭借一项装置设计获奖。这座名为《保持平衡》的金属雕塑由他在北京的 BB 画廊提交，从一千多件参选作品中脱颖而出，被收购用于世博会“滨江绿化带雕塑工程”，从那时起这件艺术装置作品（6.50m x 6m）便永久立于上海的黄浦江畔。

---

<sup>227</sup> 此照片由玛格教授提供，谨表谢忱。

凡·登·高兹的多个雕塑设置都围绕着个体在思想、行为和生活中的平衡这一基本思想。由于熟悉的周遭环境里突然冒出的这些雕塑，促使人们抛开一切国家、文化和世界观的桎梏，去静心思考自身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sup>228</sup>

伫立于黄浦江畔的高兹作品正象征着这种永远存在的平衡努力。雕塑呈现了试图保持平衡的一男一女的侧面形象，寓意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共处共存，就像人们在世博会上所见到的那样。



雕塑家和装置艺术家胡拜图斯·凡·登·高兹  
立于上海黄浦江畔的雕塑作品（2010）<sup>229</sup>

#### **第十四节 现代欧洲神话的批判者：**

##### **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奥斯卡·内格特**

奥斯卡·内格特 1934 年出生在东普鲁士卡普凯姆农庄一个小农和工人结合的家庭，旧属塔皮奥县。他是家里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1945 年 1

---

<sup>228</sup> 2019 年 4 月 13 日至 10 月 6 日，位于吕讷堡的东普鲁士国家博物馆举办了题为《平衡与视角》的胡拜图斯·凡·登·高兹作品展。

<sup>229</sup> 此照片经艺术家本人同意刊出，谨表谢忱。

月他和两个姐姐一道经柯尼斯堡和哥丁根逃往丹麦。在其 2016 年出版的自传中他这样概述自己在东普鲁士的生活经历：

“在东普鲁士村庄的生活[...]家里没有教育的概念，因为始终都必须以劳动为核心——艰苦的重体力劳动，即便如此全家也仅可糊口；然后战争来了——父母不在身边的逃亡[...]数次命悬一线。”<sup>230</sup>

高中毕业后，内格特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师从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研习社会学、哲学，1962 年完成以《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与奥古斯特·孔德在实证主义和辩证法上的矛盾》为题的博士论文，获博士学位。1962 至 1970 年内格特作为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助手在海德堡和法兰克福大学工作，1970 年被汉诺威工业大学聘为社会学教授，并一直在那里从事教学与研究直至 2002 年退休（退休后不再承担教学任务，但继续开展学术研究，保留教授头衔——译者注）。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的学生运动中，内格特是议会外部反对派的代言人。在以后的时间里，他一直以公知身份积极参与公开辩论，并主要研究工会工作存在的各种问题。

在中德文化合作协定的框架下，奥斯卡·内格特 1980 年首次随团前往中国。几年后（1988），经过一番对在华经历和所获认知深入彻底的思考，他出版了《龙的现代化——中国与现代欧洲神话：旅行日记与思维实验》<sup>231</sup>一书。封面上引用的这段话彰显了全书的中心思想：

“作为当代对历史最严重的挑衅之一，我认为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一个现代精神之光似乎正黯淡下去，许多地方已在为它早应到来的毁灭润饰悼词的时刻，地球上人口最多的那个国家发出呼声，宣告了自己的**现代化纲领**<sub>[内格特特别标注]</sub>。”

<sup>230</sup> 奥斯卡·内格特：《关于生活之幸——自传溯源》，2017 年哥廷根出版，第 2 版，第 13 页。

<sup>231</sup> 费舍尔出版社，1988 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这本书并不是对中国现状的报道，而是反思在短暂的中国之行中获得的认知，通过谨慎解读对现代化有别于欧洲的理解，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对这些认知进行梳理归类。内格特自我批判式地谈到旅行团成员们“充满矛盾的现代化概念”，新兴中国理智的现代性让观察者们感到陌生，他们更希望那些“腐朽、脆弱和古老的东西”能够保持下去。不过关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内格特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即一方面有必要总结自身历史，另一方面有必要向西方的普遍现实学习。<sup>232</sup>他考量“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概念”（173 页起），认为民主“显然是一个社会最困难的集体学习过程”，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让“儒家，马克思和法国革命的思想相互结合”（506 页）。

他在书中所谈到的问题，至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如果我们不能向中国人学习，那么学习过程就会从根本上受到干扰。消除这些干扰的可能途径就是当我们研究中国社会时，要考虑到中国的发展情况，检视所使用范畴的有效范围和承载能力。”<sup>233</sup>

将中国的发展现状和规划设计纳入“西式”的解释模型令西方社会科学家感到为难，因为那些（中式）概念常常无法与其在西方话语体系内的翻译对应，两个概念世界带有各自不同的思想史和文化传统（如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或佛教）印记，概念定义上的差异，导致必须在其特有的语境下才能理解它们。<sup>234</sup>

上世纪 80 年代奥斯卡·内格特首次到访中国，当时中国的开放和改革才刚起步，但他所思考的问题时至今日仍具有高度的现实性。2002 年再次

---

<sup>232</sup> 奥斯卡·内格特：《龙的现代化——中国与现代欧洲神话：旅行日记与思维实验》，1988，第 105-107 页。

<sup>233</sup> 奥斯卡·内格特：同上，第 11 页。

<sup>234</sup> “大同”的概念便是一例，这是中国古代对理想世界的设想，对此可以有“大同盟”、“大一统”、“世界主义社会”、“大和谐”、“大的共同利益”、“大平等”、“理想国家”等多种理解，毫无疑问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表达。

来到中国的内格特感到无比震惊，因为第二次旅途所见和首次来华时相比，“有着如此根本性的不同，让人开始怀疑是不是同一个社会”。<sup>235</sup>

第二次中国之行让内格特看到了这个国家 1980 年以来极速的转变进程，他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正走向全球化的世界社会里，向中国的力量转移真是既危险又令人叹服。”<sup>236</sup>。此言无疑又回到这个问题，既当前（西方社会）对待中国发展的态度如何极端地摇摆：一边陷入威胁论，另一边是慨叹赞赏，这完全与第七章第三节所勾勒的欧洲固有的充满矛盾的中国形象不谋而合。

此外，他的《政治的人：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一书现已译成中文出版。<sup>237</sup>在中国的学术出版物里，奥斯卡·内格特主要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或是“新康德主义者”。<sup>238</sup>2008 年新华社还曾报道过奥斯卡·内格特谈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特殊形式的消息。<sup>239</sup>

## 第十五节 演员、音乐家、画家和作家阿明·缪勒-斯塔尔

---

<sup>235</sup> 内格特二次访华后的若干思考见《龙的现代化——中国与现代欧洲神话》，《合集》第 7 卷，2016 年哥廷根出版。很遗憾他仅在“2007 版序言”中（第 15-29 页）简短述及对第二次旅行的看法，与 1988 年版相比全书内容基本未作改动，增补了克里斯汀·摩根罗特的“2002 年 9 月中国之行日记摘要”，可惜其中富有洞见的内容并不多，读者其实更希望读到内格特本人对 21 世纪之初亦或是第二次旅行之后的形势评判。

<sup>236</sup> 奥斯卡·内格特：《当代最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载于《论点》268 期（2006），本期重点《巨大的矛盾体中国》，第 20 页。在同亚历山大·克鲁格的对话文章《中国的热月》中，他所讲到的中国问题包括 1980 年的旅行和“对文化陌生性的探究”，以及发生在中国和法国的类似事件：即倒台的罗伯斯庇尔——他在 1793/94 法国大革命期间主导施行恐怖统治并因此被处决；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社会混乱的关键性因素，极左派领导团伙“四人帮”——他们妄图在毛泽东去世后夺权，但最终被打倒；收录于奥斯卡·内格特、亚历山大·克鲁格：《被低估的人——共同的哲思（两卷本）》，第 1 卷，第 139-147 页。内格特对 1989 年 6 月北京天安门广场系列事件的看法见《中国的伤痕——谈谈悼念、死亡和时间的政治意义》，收录于奥斯卡·内格特、亚历山大·克鲁格：《被低估的人——共同的哲思（两卷本）》，第 1 卷，第 805-819 页。

<sup>237</sup> 《政治的人：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2015 年桂林（漓江出版社）出版。德文版：《Der Politische Mensch. Demokratie als Lebensform》，2010 年哥廷根出版。此书在中国网上有售。

<sup>238</sup> 参见谢永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康德主义关系辨析》，载于《南京大学学报》，2017 年 6 月 26 日，[http://www.gmw.cn/xueshu/2017-06/26/content\\_24897708.htm](http://www.gmw.cn/xueshu/2017-06/26/content_24897708.htm)（2019 年 8 月 1 日查阅）。

<sup>239</sup>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288751/>（2019 年 8 月 1 日查阅）。据推测内格特的原表达应为，身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家们尚不知“如何能够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发展独一无二的中国民主形式”（见内格特【2016】，第 543 页），这并非中国新闻报道里所称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殊形式”。

阿明·缪勒-斯塔尔来自蒂尔西特（1930 年出生）。他的母亲出生于波罗的海地区一个德国家庭，在俄国彼得格勒长大，1918 年随家人一起从那里逃亡至蒂尔西特。缪勒-斯塔尔曾说过，他的家族历史说明早在那个年代东普鲁士与其周边地区就已经有了密切的人员和文化交往。<sup>240</sup>

缪勒-斯塔尔是唯一一位在两德（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和好莱坞都饱受赞誉的德国演员，是德国好莱坞巨星之一，凭借其演艺成就曾多次获“奥斯卡”奖项提名。

20 世纪 50 年代，他在西柏林就读于小提琴和音乐学专业，后转行进入演艺圈。因事业在东柏林发展顺利，他怀着社会状况将有所改善的期冀留在了民主德国。1976 年，因在一封反对驱逐民主德国音乐家沃尔夫·比尔曼出境的公开信上签名，他不再有出演角色的机会，1980 年获准前往西柏林。

2011 年 12 月，缪勒-斯塔尔在 1938 年离开后首次回到故乡蒂尔西特，也就是今天的苏维埃茨克，2011 年该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明镜周刊》称，他本来再也不愿踏上那片土地，可为什么还是去了呢？周刊引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穷尽一生都在努力地向西，向西：蒂尔西特、普伦茨劳、柏林、汉堡、洛杉矶——东普鲁士、民主德国、西德、美国……到这里应该是西方世界的尽头了。只要人们西行的愿望不止，这个世界就是有问题的。只有行程的方向调转了，是向着莫斯科去了，这个世界才归于正常。”<sup>241</sup>

面对苏维埃茨克市长尼古拉·沃伊思切夫，缪勒-斯塔尔表示，艺术家们必须要搭建桥梁，“跨越被政治撕裂的鸿沟的桥梁”。<sup>242</sup>他向我提到，

---

<sup>240</sup> 此言出自笔者与他 2019 年 5 月 26 日的电话交谈。克里斯蒂安·尼夫在《圣彼得堡的小号手——涅瓦河畔的德国人沉浮录》中就以圣彼得堡这座城市为背景，对这种纷繁交织的关系做过深刻描述，阿明·缪勒-斯塔尔的母亲家族也身处其中。

<sup>241</sup> 克里斯蒂安·尼夫（2019）。

<sup>242</sup> 克里斯蒂安·尼夫：同上。

在曾经的蒂尔西特，有为数不少的人希望用回之前的地名，“蒂尔西特很有名，但没人知道苏维埃茨克”，人们这样对他说。<sup>243</sup>

缪勒-斯塔尔时常提携有天赋的音乐人，才华横溢的中国钢琴家金麦克就得到过他的帮助。金麦克 1984 年在中国出生，4 岁学习钢琴，多次在全国性赛事中获奖，包括两次全国比赛金奖，在中国各大城市都举办过音乐会，还曾师从著名钢琴家周广仁。<sup>244</sup>缪勒-斯塔尔举办朗诵会，金麦克也常常与汉堡小提琴演奏家莎拉·斯皮策联袂献演。这位明星为来自中国的钢琴演奏家提供串场独奏的机会，是在用这种方式提升其身价，帮助他发展。<sup>245</sup>2009 年德国前外长施泰因迈尔还曾盛赞此“卓越的中德合作形式”。<sup>246</sup>目前金麦克在杭州浙江音乐学院任教。

在中国，阿明·缪勒-斯塔尔也并不非常出名，<sup>247</sup>可惜他本人还从未有机会去中国，这令他倍感遗憾。他很想去看上海，这个“对那些（纳粹统治时期——作者注）得以逃脱的犹太人而言重要的避风港”。<sup>248</sup>缪勒-斯塔尔被中国观众所熟知得益于他在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导演的影片《罗拉》（1981）中饰演的角色，一位坚守道德原则，不被收买，揭露市政府阴谋诡计的建筑局长，这很顺应广大中国民众要求打击公务人员贪腐的心声。2011 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他被授予终身成就奖，此消息也曾见于英文版《中国日报》。<sup>249</sup>

---

<sup>243</sup> 2019 年 5 月 26 日电话交谈。

<sup>244</sup> 周广仁，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教授，1928 年出生在德国。认识周教授是通过她的姐姐周玉英（1927 年出生于汉诺威），我在《北京周报》（1977-1981）工作期间曾与她有过密切合作，至今我们仍是往来密切的好友。

<sup>245</sup> 2019 年 5 月 26 日电话交谈。

<sup>246</sup> 参见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de/newsroom/090208-bm-mueller-stahl/218134>（2019 年 5 月 13 日查阅）：致敬阿明·缪勒-斯塔尔。

<sup>247</sup> 参见 <https://www.zhihu.com/topic/20213896/intro>（2019 年 5 月 9 日查阅）；关于他的生平见传记《阿明·缪勒-斯塔尔：历经三个德国再归来》，2014 年汉堡出版；福尔克·希尔卡：《阿明·缪勒-斯塔尔传》，2015 年汉堡出版。

<sup>248</sup> 2019 年 5 月 26 日电话交谈。

<sup>249</sup> Armin Mueller-Stahl was decorated with the Honorary Golden Bear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阿明·缪勒-斯塔尔被授予终身成就荣誉金熊奖》），载于 2011 年 2 月 21 日《中国日报》；中文报道见 <http://ent.sina.com.cn/m/f/2010-12-17/22123180653.shtml>（2019 年 5 月 11 日查阅）。

哈根·缪勒-斯塔尔（1926-2019）是阿明的兄长，也出生在蒂尔西特，是一位演员兼戏剧、电视剧导演，却一直被其弟的锋芒掩盖。中德首次在华合作拍摄的七集电视连续剧《上海的早晨》（1987）也让他走进了中国大众的视野。

## **第十六节 来自蒂尔西特的电子（蓝调）摇滚音乐家们：埃德加·弗勒泽的“橘梦乐团”和约翰·凯（约阿希姆·弗里茨·克劳雷达特）的“荒原狼”乐队**

*埃德加·弗勒泽*

出生在蒂尔西特的埃德加·弗勒泽（1944-2015）集音乐家、作曲家与艺术家于一身，是一位多面天才。他被奉为电子音乐的先驱之一，是蜚声国际的团体“橘梦乐团”的创始人。他出生于蒂尔西特一个商贾之家，其父被纳粹杀害，出生仅数月便随母亲在红军压境前逃到柏林投奔亲戚，小埃德加在那里长大。由于他们一家财物尽失，弗勒泽年仅15岁便不得不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18岁时，凭借其艺术天赋他获得一份资优生奖学金，在柏林艺术学院的版画、雕塑和绘画专业学习了四年。此外，他对哲学很感兴趣，完成研究康德“绝对命令”的博士论文，获博士学位。不过，弗勒泽对音乐的兴趣更加浓厚，他学习了吉他演奏，并于1967年创立“橘梦乐团”。为行为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作暖场表演，以及多场因得到著名西班牙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青睐而在其庄园举办的花园音乐会，令这个团体名声大噪。这群音乐家的天赋被伦敦一家唱片公司发现，在他们的帮助下，乐队终于享誉国际。橘梦乐团共发行了80多张唱片和影视原声专辑，埃德加·弗勒泽是唯一一位由始至终从未离开的乐队成员，他第二支个人单曲《马来西亚的苍白世界》的灵感来自1975年在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巡演期间的感悟。弗勒泽对哲学和心灵方面的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包括佛教，

甚至还以“禅宗”风格布置自己的花园。<sup>250</sup>1999年橘梦乐团为一部关于中国万里长城的纪录片配乐（2000年发行原声CD），而早在1980年他就曾借用中国古老的拼图游戏“七巧板”之名，发行同名专辑。<sup>251</sup>遥远的东方元素影响着弗勒泽，激发着他的创作灵感，这在他自己和橘梦乐团的音乐里都有所体现。关于弗勒泽，曾流传着这样一则趣闻：2014年柏林市长沃维莱特访问中国之际，他恰好在柏林开音乐会，其间调侃说市长将从北京带回一份合同，（建设艰难，工期漫长的）柏林首都机场用地会因此而派上新用场，他听说沃维莱特在北京为柏林机场建设立了功，“2015年世界上最大的中国蘑菇种植场将在那里开张”，就在原定修建机场的位置上。<sup>252</sup>1999年其子耶罗梅（1970年出生）加入乐团，担任乐手直至2006年。

253

在中文网页上，不仅可查阅到关于埃德加·弗勒泽和橘梦乐团，以及关于他东普鲁士出身和生平的信息<sup>254</sup>，也有对他去世的报道和评论。<sup>255</sup>

### 约翰·凯（约阿希姆·弗里茨·克劳雷达特）

美国著名蓝调摇滚乐团“荒原狼”的台前人物，德裔加拿大籍主唱，艺名约翰·凯，原名约阿希姆·弗里茨·克劳雷达特，1944年4月出生在蒂尔西特。克劳雷达特是一个源自立陶宛语的外来词简化形式，原始姓氏

---

<sup>250</sup> 见《脑海里的图像：埃德加·弗勒泽的艺术——比安卡·弗勒泽-阿克瓦耶访谈录》，收录于《进化》，<https://www.evolve-magazin.de/blog/froese>（2019年6月21日查阅）。

<sup>251</sup> Tangram，中文《七巧板》。

<sup>252</sup> 马库斯·何塞曼：《橘梦乐团柏林演唱会上大揭秘——埃德加·弗勒泽所知道的柏林机场和沃维莱特》，载于《明镜日报》，2015年1月24日，<https://www.tagesspiegel.de/berlin/enthuellung-bei-berlin-konzert-von-tangerine-dream-was-edgar-froese-ueber-den-ber-und-wowereit-wusste/9973252.html>（2019年6月21日查阅）。

<sup>253</sup> 见埃德加·弗勒泽自传：《橘梦乐团——天命难违：1967-2014》，2017年柏林出版；[https://de.wikipedia.org/wiki/Edgar\\_Froese](https://de.wikipedia.org/wiki/Edgar_Froese)（2019年6月21日查阅）：埃德加·弗勒泽。

<sup>254</sup> 如<https://baike.baidu.com/item/Tangerine%20Dream>（2019年6月21日查阅）；台湾网站也可见相关内容：<https://digilog.tw/posts/922>（2019年6月21日查阅）。

<sup>255</sup> <http://m.youxiguancha.com/hangyezixun/10977.html>。

应为克劳雷戴提斯。<sup>256</sup>和许多东普鲁士儿童的命运一样，克劳雷达特的父亲弗里茨·克劳雷达特在他出生前几星期在东线战事中阵亡，母亲艾尔思贝特，本姓齐默尔曼，1945年初赶在红军入城前带着他逃往图林根的阿恩施塔特，1948年继续逃难至汉诺威，这段逃亡经历后来被他写入歌曲《魔毯之旅》。在汉诺威的日子里，这个小男孩常常收听美国海外驻军电台（AFN），尤其迷恋美国摇滚歌手小理查德。对摇滚乐的喜爱也激发他去学习一门乐器，这为其日后的摇滚生涯奠定了基础。<sup>257</sup>克劳雷达特的母亲后来再婚，1958年年中举家移民加拿大，后又去了美国。<sup>258</sup>

乐队的名字“荒原狼”取自赫尔曼·黑塞的同名小说，乐队凭借经典影片《逍遥骑士》的主题歌《天生狂野》名扬世界。《逍遥骑士》（1969）由彼得·方达担纲主演，当年也是一部令我着迷和思潮澎湃的影片。如今，这位音乐家和来自汉堡的夫人尤塔（本姓玛尔）共同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sup>259</sup>他们二人不仅在肯尼亚建立了一所大象孤儿院，还热衷各类社会福利事业。尤塔·玛尔后来皈依佛门，这也成为约翰·凯生活中具有亚洲风情的一面。<sup>260</su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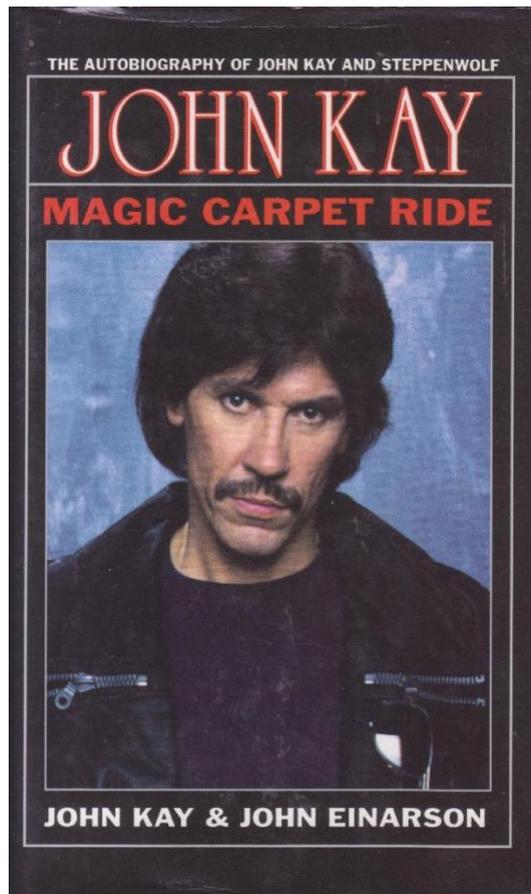
<sup>256</sup> 克劳斯·瓦尔特：《1968和流行乐——反抗的声音》，德国文化广播电台，2018年7月23日，[https://www.deutschlandfunkkultur.de/1968-und-die-popmusik-der-sound-der-revolte.2177.de.html?dram:article\\_id=423621](https://www.deutschlandfunkkultur.de/1968-und-die-popmusik-der-sound-der-revolte.2177.de.html?dram:article_id=423621)（2019年6月24日查阅）。

<sup>257</sup> 这正是与笔者自身经历产生交集的地方，14岁时（1961）我便创立了“奥芬巴赫小理查德歌迷俱乐部”。这位音乐人对我的触动如此之大，使我1964年又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高中毕业前夕还曾很认真地考虑过，是应该去做一名职业乐手，还是去念大学。

<sup>258</sup> 参见其约翰·凯与约翰·艾纳森合著传记《魔毯之旅：约翰·凯与“荒原狼”自传》，1994年马萨诸塞贝弗利出版；更多细节见丹尼斯·德纳博：《在加州造访“荒原狼”主唱约翰·凯：“我对政治家很恼火”》，载于音乐杂志《滚石》，2014年4月7日，<https://www.rollingstone.de/ortsbesuch-beim-steppenwolf-saenger-john-kay-in-kalifornien-ich-bin-wuetend-auf-die-politiker-364406/>（2019年5月11日查阅）；约翰·凯：《我是在废墟中长大的，妈妈》，<http://www.achromatopsia.info/john-kay-achromatopsia/>（2019年5月11日查阅）。

<sup>259</sup> 参见马提亚斯·格雷弗拉特，载于《时代》杂志生活版，2008年第8期。

<sup>260</sup> 《荒原狼：隔壁的野蛮人》，《时代》2008线上版，<https://www.zeit.de/2008/08/Born-to-be-wild/seite-4>（2019年5月12日查阅）。



约翰·凯的传记

无论是影片《逍遥骑士》，还是“荒原狼”乐队在中国都广为人知。<sup>261</sup>但约翰·凯曾在写给我的邮件中表示，由于刚出生不久就被迫随母亲逃离东普鲁士，或许他的名字不应该出现在这本书中。<sup>262</sup>

## 第十七节 中国对东普鲁士接受认知的多极化

### 概括而言……

此书无法论及所有为中国人所知的东普鲁士名人。在新兴社交媒体（中国的互联网）上，我们可以找到大量对东普鲁士作家、诗人、作曲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详尽介绍，他们在中国知名度很高，这不能不令人感到

---

<sup>261</sup> 关于《逍遥骑士》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8D%E9%81%A5%E9%AA%91%E5%A3%AB>（2019年5月2日查阅）；关于“荒原狼”见 <https://baike.baidu.com/item/SteppenWolf/13838654>（2019年5月2日查阅），这里也提到了凯的东普鲁士出身。

<sup>262</sup> 2019年5月6日电子邮件。

惊讶。下文将要出现的各位名人，都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被反复提及的，他们是中国对东普鲁士其地、其人认知储备与接受历史的一部分。在此仅列举一些最具分量人物：

犹太裔生物化学家弗里茨·阿尔伯特·李普曼（1899-1986）出生于柯尼斯堡，1939年移民美国，1953年因其在细胞代谢领域的研究获诺贝尔医学奖；犹太裔化学家奥托·瓦拉赫（1847-1931，出生于柯尼斯堡）凭借在有机化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被授予1910年诺贝尔化学奖；外科医生约翰·弗里德里希·迪芬巴赫（1792-1847，也出生于柯尼斯堡）是整形外科和医学移植的先锋。除他们之外在中国广为人知的还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阿格兰德（1799-1875，出生于梅梅尔）和弗里德里希·威廉·贝塞尔（1784-1846，出生于柯尼斯堡）；来自梅梅尔的诗人西蒙·达赫（1605-1659）以及来自柯尼斯堡尤迪腾镇的作家、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戏剧评论家约翰·克里斯托夫·戈特舍德（1700-1766），其作品在中国至今影响力犹存；抒情诗人阿尔诺·霍尔茨（1867-1929，出生于拉斯腾堡），作为德国彻底的自然主义流派创始人，其部分诗作被译成中文；诗人哥特罗博·费迪南德·马克西米利安·哥特弗里德·冯·申肯多夫（1783-1817，来自蒂尔西特）以及作家、抒情诗人鲁道夫·博察德（1877-1945，出生于柯尼斯堡）；地理学家、极地探险家埃里希·冯·德吕卡尔斯基（1865-1949，出生于柯尼斯堡）；作曲家赫尔曼·葛茨（1840-1876）、阿道夫·延森（1837-1879）、奥托·尼古拉（1810-1849）、约翰·弗里德里希·莱夏特（1752-1814）以及魏玛共和国最著名的作曲家和指挥家之一沃纳·理查德·海曼（1896-1961），他们五位均出生于柯尼斯堡；历史学家和诗人费迪南德·阿道夫·格雷戈洛维乌斯（1821-1891，出生于内登堡；今尼济察——译者注）；来自东普鲁士奥斯特罗德县的哲学家、康德的学生克里斯蒂安·雅可布·克劳斯（1753-1807）。

中国人熟悉的东普鲁士名人还有曾引领电学研究的物理学家古斯塔夫·罗伯特·基尔霍夫（1824-1887，来自柯尼斯堡）和 191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威廉·维恩（1864-1925，来自菲施豪森的加弗肯）；聚落考古方法的创立者，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1858-1931，出生于蒂尔西特）；舞台表现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导演利奥波德·耶斯纳（1878 年生于柯尼斯堡，1945 年在好莱坞去世）以及跻身 20 世纪最著名导演行列的弗兰克·本迪克·威斯巴（原名弗兰克·威斯巴，1899 年出生于蒂尔西特，1967 年在美因茨去世）；<sup>263</sup>建筑师埃里希·门德尔松（1887 年出生于阿伦施泰因，1953 年在旧金山去世）和保罗·保尔加腾（1900-1984），蒂尔西特人，柏林艺术学院教授。门德尔松可称为 20 世纪最杰出的建筑师之一，其作品包括 20 世纪 20 年代在波茨坦建造的天文观测台“爱因斯坦塔”，被列为文物的柏林“摩斯塔”以及当年阿伦施泰因犹太墓园内的“灵柩安放厅”。1924 年他与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沃尔特·格罗佩斯共同创立了进步建筑师团体“指环”。纳粹分子攫取政权后他被迫流亡，先去了英国，后前往美国。<sup>264</sup>

---

<sup>263</sup> <https://baike.baidu.com/item/Frank%20Wisbar/18656863?fr=aladdin>（2019 年 5 月 11 日查阅）。

<sup>264</sup> 参见雷吉娜·史蒂芬（主编）：《埃里希·门德尔松：本质——作品——影响》，2006 年奥斯特菲尔德尔恩-鲁伊特出版。



阿伦施泰因（奥尔什丁）门德尔松故居墙上的铭牌

无论是门德尔松，还是他的作品在中国都享有大师级的声誉，互联网上亦可见大量相关词条。<sup>265</sup>

在中国为人熟知的东普鲁士名人还有免疫学家和血清学家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1854-1917），他出生在西普鲁士的罗森伯格县，该县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之前属东普鲁士，后划归新建立的西普鲁士省。1829至1878年间东西普鲁士两省合并为“普鲁士省”。1922年依照《凡尔赛和约》举行全民公决后，这一地区又重归东普鲁士省管辖。冯·贝林是抗毒素被动免疫的创始人，发明了治疗和预防白喉以及破伤风的方法，

<sup>265</sup> 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3%E9%87%8C%E5%85%8B%C2%B7%E9%97%A8%E5%BE%B7%E5%B0%94%E6%9D%BE/4085143?fr=aladdin>（2019年11月9日查阅）：埃里希·门德尔松。

获 1901 年首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动物学家、原生动物研究者弗里茨·理查德·邵丁（1871 年出生于罗森宁肯，原达克门，又称安哥拉普县境内；1906 年去世）在中国也是一位名人，1905 年他在柏林夏利特医院发现了梅毒病原体。同样知名的还有医学家和遗传学家阿诺·莫图尔斯基（1923-2018），他出生于东普鲁士菲施豪森一个犹太家庭，是药物遗传学奠基人之一，曾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遗传学医院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一家人流落各地，直到战争结束才在美国重聚，阿诺·莫图尔斯基也成为一位在国际上备受尊敬的科学家。医学世家海因里希·罗伯特·赫尔穆特·古底克（1876-1961）来自普鲁士埃劳，1927 至 1933 年曾在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任细菌学教授，其间还担任过医学院院长。他和其他六位医学家一同受聘于这所高校，致力于将其医学专业提升至世界水平，所用专业教学资料均为德语，连病历也以德语书写。<sup>266</sup>不过古底克是一位存在争议的人物，二战期间他在被占领的波兰进行了大量致人死亡的人体实验，战后却并未被追究责任，反倒在 1945 年受聘为法兰克福大学（美茵河畔）流行病学教授。<sup>267</sup>

最后要提到的是埃伯哈德·冯·金海姆（1929 年出生于巴尔滕施泰因县尤迪腾城堡），1970 至 1993 年他一直担任宝马公司董事长，对宝马公司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他也很出名，<sup>268</sup>在丁戈尔芬格工厂为他举办的 90 寿诞庆典上，他也希望听到关于中国的专题报告，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关乎这家大型车企集团未来的最重要的国家。<sup>269</sup>

在中国受到关注的还有历史学家罗塔·盖尔（1936 年出生于东普鲁士勒岑；今波兰吉日茨科——译者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历史学教授，研

---

<sup>266</sup>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2640390102v0ka.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2640390102v0ka.html)（2019 年 6 月 29 日查阅）：《柏尔诺阿博士及德国医学流派对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影响》。

<sup>267</sup> 其生平见 [https://de.wikipedia.org/wiki/Robert\\_Kudicke](https://de.wikipedia.org/wiki/Robert_Kudicke)（2019 年 6 月 29 日查阅）：罗伯特·古底克。

<sup>268</sup> 参见 <http://cf-topure.com/qcxw/2016-03-27/85.html>（2019 年 6 月 3 日查阅）。

<sup>269</sup> <https://www.ovb-online.de/meinung/kommentare/sehe-vorstandsvorsitzender-1970-1993-eberhard-kuenheim-einem-weltunternehmen-geformt-10395942.html>（2019 年 6 月 3 日查阅）：我之所见：作为董事长的埃伯哈德·冯·金海姆如何在 1970 年至 1993 年之间将宝马公司打造成一家跨国企业。

究重点为德国与欧洲史；文学研究者、文化理论家和作家克洛斯·特韦莱特（1942年生于埃本罗德/斯塔卢波嫩）在中国也是公认的文化评论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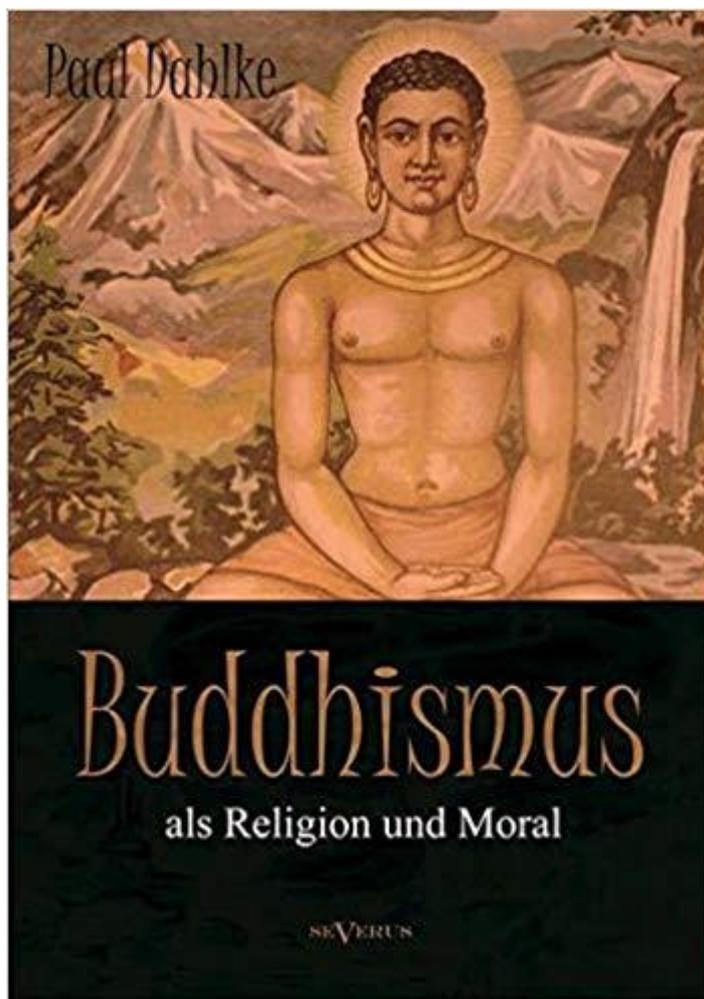
尤尔根·冯·德·温泽（1894-1966），出生于东普鲁士澳特尔斯堡，今什齐特诺（波兰），是一位德国作家、翻译家、作曲家和博学家。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将欧洲之外的文学译成德语，还因此学习了中文，以完成重译老子《道德经》<sup>270</sup>的工作。翻译过程中，冯·德·温泽将直译和意译版本并列对照，最终将两个版本都付梓出版。1927年他着手此项工作，1942年完成新版，此版他摒弃“Lau Dsi”亦或“Laotse”的写法，而选择了“Lau Dan”（老聃）这个名字，1965年又发行了此书新的简短版。<sup>271</sup>

医学家、佛学家，也是德国的佛学先驱保罗·达尔克（1865-1928）出生于东普鲁士奥斯特鲁达。在1898年为期一年的环球旅行中，他在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接触到佛教并被深深吸引，于是1900年再次前往锡兰学习巴利语，这是一种（类似教会拉丁语的）宗教语言文字。达尔克翻译了大量佛教典籍，并出版了许多关于佛教的书籍和文章，创立了至今仍存续的柏林“佛学之家”（欧洲首创），后来还曾游历过中国及东亚、东南亚其他国家。

---

<sup>270</sup> 见脚注 78。

<sup>271</sup> 老聃：《道德经》，收录于《著作合集》，第2卷《从腐朽到文明》，2005年法兰克福出版，第1120-1159页。



保罗·达尔克的代表作之一

谈到中国，达尔克认为宗教在这里不单是以救赎为核心的宗教，也绝不限于救赎和唯一神论，必须将中国的宗教视为一个“良序系统，其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相匹配”，即这样一个“为人而存在的世界，道存于其身，又因其自身即为道，故而世界有道”。<sup>272</sup>达尔克这里想表达的是，中国人通常不会是某一个宗教的信徒，而是有多重信仰（祖先崇拜，道教，佛教）。的确如此，在中国甚至都没有（西方世界里的——译者注）“宗教”概念，宗教在这里不过是诸多学说中的一个，作为学术观点或流派并不能享有唯一性和不可置疑性这样的特权；而且如果“超越性”指的是超出可

---

<sup>272</sup> 保罗·达尔克：《救赎的认知》，出自作者本人：《作为体验的佛教》，第7页，迪特·O.E. 博宁编辑，2013年柏林，[http://www.theravadanetz.de/studium/Dahlke\\_Buddh\\_Erlebnis.pdf](http://www.theravadanetz.de/studium/Dahlke_Buddh_Erlebnis.pdf)（2019年6月2日查阅）；又见保罗·达尔克：《作为宗教与道德的佛教》，2013年汉堡出版（1923年版本的再版）。

感知事物的界限，那么它也并没有那么重要，儒家关注的是现世，对儒道两家信徒而言死亡之后的生活并非其思考的对象。据传当孔子被问到死是怎么回事时，答曰“未知生，焉知死”。只有佛教对死后发生的事作出了阐释。<sup>273</sup>

追随达尔克脚步的露丝·丹尼森 1922 年出生在东普鲁士吕克县（今埃尔克——译者注）的维滕瓦尔德，2015 年她在位于南加州莫哈维沙漠中的达摩德纳内观修习中心去世。战乱中，甚至战争结束后，丹尼森饱受逃亡、暴力之苦，被强奸，还曾被投进苏联的劳工营。1957 年她移民美国，并在那里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心理学家亨利·丹尼森。夫妇二人被佛教教义深深吸引，多次踏上前往中国和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的漫长旅途。在日本她接受培训成为一名禅师。在欧美露丝·丹尼森作为佛教先驱人物非常有名，2007 年美国政府因其对佛教界妇女运动的贡献，对她予以表彰。丹尼森积极传播佛教教义，大力支持各类慈善机构，并致力于动物保护，呼吁审慎对待自然资源。<sup>274</sup>

医学家威廉·斯塔林格（1898-1956），后来也曾以政治作家为职，于 1933 年接管柯尼斯堡的圣伊丽莎白灰衣修女医院，同时他还被任命为当地大学内科医学特聘教授。1945 年该城被攻克后他奉苏联红军之命为滞留在此的德国人建立传染病医院，并负责管理。1946 年他因其反革命言行被判处服役 10 年，其间还曾被送往东普鲁士的一座劳工营。据斯塔林格自己推断，判刑的真实原因应该是有人认为他是苏联占领柯尼斯堡后所发生一切的见证者，企图将他灭口。<sup>275</sup>后来他曾在自己的一本书中提到，早在大学时代中国及其发展就已经引起他的兴趣，令他着迷。他还在《俄国背后的

---

<sup>273</sup> 事实上“宗教”概念是欧洲文化和宗教发展历史的产物。在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并没有一个与此相应的概念。

<sup>274</sup> 露丝·丹尼森：《归于宁静，敞开心扉：对内心充实的生活的忠告》，2017 年柏林出版；森迪·博西：《露丝·丹尼森——佛教先驱，来自东普鲁士的世界公民》，2006 年比勒菲尔德出版。

<sup>275</sup> 见蒙奇格网站-人物生平：威廉·斯塔林格，

<https://www.munzinger.de/search/portrait/Wilhelm+Starlinger/0/6456.html>（2019 年 6 月 10 日查阅）。

中国》一书中探讨过中国的崛起，以及俄国传统上对这个强盛起来的大国的畏惧。斯塔林格认为，长远来看苏联与中国之间必然出现冲突，时任联邦总理的康纳德·阿登纳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请斯塔林格对此观点作进一步阐述，而后认同了他的看法，也认为未来中苏之间将出现矛盾，而这一矛盾最终将导致莫斯科向西方靠拢。<sup>276</sup>

这位医学家还曾断言：“在中国，独立自主的民族共产主义发展（就像当年在俄国）是不可阻挡的，即便困难重重内部仍将日益稳固，不会真正受到已被赶走的国民党的威胁，对外出于多种原因则迟早会一如既往陷入与俄国的对立。”<sup>277</sup>

全书的结语是这样一段预言：“西方国家从来都不应该忘记，今天这个时代正迅速前行——不仅西方国家如此，自从中国决定不再花费数百年的时间去冥想，而是以年，以十年计，目标坚定地去行动，东方国度也会是这样一番景象！”<sup>278</sup>

“候任神职人员”，后来作了牧师的埃里希·布劳恩（1876-1945）出生于安格堡（今波兰文戈热沃），曾在爱尔兰根、格赖夫斯瓦尔德和柯尼斯堡学习神学。“义和团运动”时他自愿报名，作为红十字会护士在中国服务，后来他撰书记录了自己的那段经历。其父当年在家乡安格堡一所“残疾儿童养育院”做院长，这是一个免费收容和看护残疾孩童的机构。遵从父亲的意愿，埃里希·布劳恩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记录下来，希望能用出书所得缓解养育院的经费压力，后来他子承父业接管了养育院。

在出版前言中布劳恩这样写道：

“旅居中国的日子里，我如此频繁地想到家乡，许多不幸儿童的形象也总是浮现在眼前，为了照顾和教育他们，我亲爱的父亲呕

---

<sup>276</sup> 格罗·冯·格尔斯多夫：《阿登纳 1954 年对战胜国的外交政策：西德的武装与国际政治》，1994 年慕尼黑出版，第 61 页。1950 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印证了这一论断。

<sup>277</sup> 威廉·斯塔林格：《俄国背后的中国》，1957 年维尔茨堡出版，第 20-21 页。

<sup>278</sup> 同上，第 141 页。

心沥血，无微不至……来到中国，看到比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多的身体残疾，每一个受难者的目光都让我想起安格堡那许多在地上匍行的孩子……有一日我将部分积蓄从中国汇给父亲，用于帮助残疾孩童，他却不接受，他对我的期许远不止于此，认为我若能为了残疾儿童收容所，将有关我的中国之行，有关中国的文字集结成书，再配上照片，那么所得收益将可支付一部分高昂的建设费用（用于建一所新的，更好的养育院——作者注），这样我提供的帮助才更有力。”<sup>279</sup>

这便是布劳恩关于中国的书稿的成书原由（为了残疾孩童），尽管书中难免许多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偏见，但初衷可赞。其女后来还曾提及，纳粹时期埃里希·布劳恩是一位坚定的安乐死反对者，但最终他还是未能阻止他所保护的對象被杀害。<sup>280</sup>

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也译作云客乐——译者注）1938年出生于柯尼斯堡，退休前一直任柏林洪堡大学教授，他是当时最具声望的历史学家之一，主要从事德国以及西方当代史研究。2015年5月8日，他曾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在德国联邦议会发表演讲。因温克勒在西方和德国史研究方面成果斐然，他在中国也很知名，<sup>281</sup>其著作《西方通史》<sup>282</sup>被译成中文。<sup>283</sup>他在书中谈到“西方的极化对立”，俄罗斯与中国等问题，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及其对世界新秩序的探求是对西方的巨

---

<sup>279</sup> 埃里希·布劳恩：《中国之行与中国故事》，1901年柯尼斯堡出版（前言）。

<sup>280</sup> 关于安格堡教养院的历史见奥托·苏赫多尔斯基记录之下的“贝塞达慈善会”，<http://angerburg.net/bethesda1.htm>（2019年11月8日查阅）。有关纳粹时期在东普鲁士实施安乐死的内容见萨沙·托普的调查：《在东普鲁士对病患的谋杀——“朗格行动”与“T4行动”之比较》，收录于麦克·罗佐尔、格利特·霍恩多夫、碧德拉·福克斯、保罗·里希特、克里斯多夫·蒙特、沃尔夫冈·U.艾卡特（主编）：《纳粹的“安乐死”——T4行动，历史与今日之伦理后果》，2010年帕德博恩等地联合出版，第169-174页。在安格堡地区联盟的网站可见埃里希·布劳恩之女撰写的其父生平，见<http://angerburg.net/>（2019年10月21日查阅）。

<sup>281</sup> 参见景德祥：《“柏林共和国的史学家”云客乐》，载于中国经济史论坛网站，2013年4月，<http://economy.guoxue.com/?p=9182>（2019年6月1日查阅）。

<sup>282</sup>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西方通史》，四卷本，2009-2015慕尼黑黑出版。

<sup>283</sup> 《西方通史：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2019年北京出版。

大挑战。在人权问题上，温克勒认为需要区别对待：一方面西方不应放弃不可剥夺的全方位人权要求，另一方面又必须“抵抗将自身模式强加给那些存在文化差异的社会的诱惑”，<sup>284</sup>西方世界不是“道德引领民族”<sup>285</sup>。温克勒曾经多次接受中国媒体采访。<sup>286</sup>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亦可见对曾任《时代》周刊发行人的女伯爵玛丽蓉·德霍夫（1909-2002，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斯坦城堡）的介绍，她被视为反抗希特勒的战士和撰写了大量书籍介绍东普鲁士贵族生活的作家。<sup>287</sup>1954年她到访香港，曾在边境线上眺望“铁幕”另一边的中国，后来还撰文记述了此行留给她的印象。<sup>288</sup>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辛 1928年出生在东普鲁士海尔贝格县的沃尔弗斯多夫，曾任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院院长。他编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词典》1991年被译成中文，由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这令他在中国为人所知。民主德国解体后他对社会主义的历史进行了批判性研究，成果见于其2017年在柏林出版的著作《现实社会主义浮沉录——十月革命100周年记》。

最后要提到的是作家和哲学家莉塔·古金斯基，她1944年出生在东普鲁士内登堡。在与我的通信中她曾写道，对于出生地为何是内登堡，她自己知道得并不十分详细，有可能是母亲曾经提起，但她却没有认真听，其

---

<sup>284</sup> 见福尔克·乌尔里希 2016年在促进欧洲理解莱比锡图书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

[https://www.leipzig.de/fileadmin/mediendatenbank/leipzig-de/Stadt/02.4\\_De24\\_Kultur/41\\_Kulturamt/Literatur\\_und\\_Buchkunst/LBEV/Laudatio\\_von\\_Volker\\_Ullrich\\_auf\\_Heinrich\\_August\\_Winkler.pdf](https://www.leipzig.de/fileadmin/mediendatenbank/leipzig-de/Stadt/02.4_De24_Kultur/41_Kulturamt/Literatur_und_Buchkunst/LBEV/Laudatio_von_Volker_Ullrich_auf_Heinrich_August_Winkler.pdf)（2019年6月1日查阅）。

<sup>285</sup> 见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访谈，2019年4月17日《商业新闻》，

<https://www.handelsblatt.com/politik/international/europawahl/heinrich-august-winkler-im-interview-wir-sind-nicht-die-moralische-leitnation-historiker-sieht-europa-am-scheideweg/24231092.html?ticket=ST-993970-OnmyR1wtC7fzqtCbMuti-ap4>（2019年6月1日查阅）。

<sup>286</sup> 如《德国历史学家温克勒：一个后经典民族国家的诞生》，载于《南风窗》，2006年8月21日，<http://news.sina.com.cn/w/2006-08-21/162710786494.shtml>（2019年6月1日查阅）。

<sup>287</sup> 见陆大鹏：《昨日的世界与回不去的荣光：二战之后的德国贵族》，

<https://cul.qq.com/a/20170722/004425.htm>（2019年3月8日查阅）。

<sup>288</sup> 玛丽蓉·德霍夫女伯爵：《新中国——从香港远眺之所见》，载于《时代》，1954年第12期（3月25日），<https://www.zeit.de/1954/12/das-neue-china-von-hongkong-aus-gesehen>（2019年3月7日查阅）。

实她更希望出生在柏林，因为对自己柏林人的身份她深信不疑。古金斯基在东柏林长大，除其他专业外主攻哲学（1975 年完成关于黑格尔的论文获博士学位），曾作为研究员在民主德国科学院工作。其小说《但愿我不是一只小鸟》的中译本 2002 年获台湾享有盛名，影响广泛的《中华时报》文学奖“青少年文学”组大奖。<sup>289</sup>

本章提及的东普鲁士名人，在中国互联网上都能找到关于他们的详细介绍，而这些介绍通常都将他们与自己的出生地，当年的“东普鲁士”省联系起来，其首府柯尼斯堡及那里历史名人更是被特别强调。<sup>290</sup>的确，在中国东普鲁士被视为诸多德意志名人的出生地，故而对“东普鲁士”的接受和想象，作为中国人接受认知和接受记忆的一部分，都烙上了这些名人的印记。<sup>291</sup>某个地区（或者说某个地区概念）被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断提及，而事实上它（作为德国的一个省）早已不复存在，只留存在回忆里，一个历史性地域，就好似一处“记忆的锚地”，这真的很有意思。在本书中，所有这些人物的又被重新拉回到德意志和东普鲁士的集体记忆中，以东普鲁士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为背景，成为对东普鲁士的集体记忆以及与此相关的记忆文化的组成部分。

## 第十八节 东普鲁士商人和对华贸易

---

<sup>289</sup> 莉塔·古金斯基：《但愿我不是一只小鸟》，1991 年柏林出版，2001 年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她的另外一部小说《与黑格尔同在的夜晚：年轻黑格尔的哲学之路与生命之旅》，1984 年柏林出版，也被译成中文，2006 年在台湾出版。1972 年至 1998 年莉塔·古金斯基嫁于民主德国科学院经济史研究所的最后一任所长（1988-1991），经济史学家托马斯·古金斯基；托马斯的父亲，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尤尔根·古金斯基（1904-1997，又译作库钦斯基——译者注）是民主德国最富声望，最多产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其著作当中有一个 38 卷本的系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境况史》，该系列第 28 卷（1964 年在柏林出版）探讨的是 1949 年以前英国在华企业的工人境况。笔者上大学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多次拜读此卷书稿。

<sup>290</su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AF%E5%B0%BC%E6%96%AF%E5%A0%A1>（2019 年 6 月 15 日查阅）：柯尼斯堡。

<sup>291</sup> 参见《东普鲁士现在在哪个国家？德国人怀念东普鲁士吗？》，<http://www.52shijing.com/lsljm/68729.html>（2019 年 6 月 15 日查阅）。

在中国的土地上也曾活跃着来自东普鲁士的商人，最出名的有柯尼斯堡人菲利普·赫施菲尔德（1840-1896）。他不仅是德国的象棋大师，著名的国际象棋理论家，其名下企业“柯尼斯堡茶业公司”甚至把代表处设到了北京和汉口（今中国中部省份湖北省会武汉的一部分），从中国进口茶业，而负责监管茶业收购的是北京分公司的一位中国籍经理。

在经营中国茶业进口生意的商人中，还有马格努斯家族的萨缪尔和亚历山大两兄弟，以及尤里斯·伯伦特和罗伯特·博尔查特。说到中国茶业，其实柯尼斯堡的茶商们同俄国也有紧密的贸易往来。<sup>292</sup>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完成之前，柯尼斯堡凭借其设在中国的各分公司，是洲际茶业贸易的转运中心（汉娜·阿伦特的祖父也从事茶业批发生意）。

---

<sup>292</sup> 《20 世纪初柯尼斯堡的犹太人》，露丝·莱塞洛维茨主编，东普鲁士犹太人协会出版。《20 世纪初柯尼斯堡的犹太人》展览手册，加里宁格勒州历史与艺术博物馆，2017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月 10 日。



经营者将公司迁往柯尼斯堡。这家企业在上海、香港和东京均设有分公司。1899年企业被普鲁士王国收购。<sup>293</sup>

近年以来，情趣用品企业家贝亚特·乌泽（1919-2001）也曾在中国拓展业务，并因此而为众人所知。她原名贝亚特·科斯特林，出生在东普鲁士北部海滨度假圣地克兰茨县（泽列诺格拉茨克；又称“绿城”——译者注）附近的瓦格劳（今马林诺夫卡）。<sup>294</sup>而在中国互联网的相关页面，乌泽的东普鲁士出身是必定要被提及的内容。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乌泽是德国著名的女特技飞行员。她的飞行教官，也是第一任丈夫汉斯-尤尔根·乌泽 1944 年在一场重大事故中丧生。战争即将结束时她携子逃往德国北部，在弗伦斯堡成立了首家从事性启蒙教育，同时经营成人情趣用品的企业，这曾经是一家享誉世界（包括中国）的邮购公司。<sup>295</sup>

当前中国有建设“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英文 One-Belt-One-Road）的宏伟计划，这为当年的普鲁士地区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提供了新机会。在此背景下，罗斯托克计划开通至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柯尼斯堡）的船运，目的是在经波兰的陆运已超负荷的情况下实现与中国新丝绸之路的贸易联通。<sup>296</sup>汉堡也计划开通经加里宁格勒至中国的班列。中国还强调有意将克莱佩达港（梅梅尔）扩建成新丝绸之路上的又一端点，再从那里将来自中国的货品分运至欧洲各地。<sup>297</sup>2019 年 6 月，《柯尼斯堡快讯》曾报道称，州长安东·阿里查诺夫透露普拉夫金斯克（原东普鲁士弗里德兰）

---

<sup>293</sup> 参见理查德·克雷普斯：《琥珀和它的历史》，1889 年柯尼斯堡出版。

<sup>294</sup> 参见关于其生平的中文报道：

<https://wenku.baidu.com/view/410d9e39640e52ea551810a6f524ccbff121ca25.html>（2019 年 10 月 22 日查阅）；以及中国网上商城：<https://beateuhse.tmall.hk/>（2019 年 10 月 22 日查阅），<http://www.beateuhse.com.cn/>（2019 年 10 月 22 日查阅）。

<sup>295</sup> 参见贝亚特·乌泽与乌尔里希·普拉曼合著：《“我要给爱自由”：贝亚特·乌泽自传》，2001 年慕尼黑出版。

<sup>296</sup> 《向新丝绸之路全速进发》，<https://www.ostsee-zeitung.de/Nachrichten/MV-aktuell/Volle-Fahrt-in-Richtung-neue-Seidenstrasse>（2019 年 5 月 2 日查阅）。

<sup>297</sup> The Chinese „Silk Road“ – where does it lead?（《中国的“丝绸之路”——它通向何方？》）

<https://en.delfi.lt/politics/the-chinese-silk-road-where-does-it-lead.d?id=77075061>（2019 年 5 月 2 日查阅）。

生猪养殖公司将向中国大量出口猪肉。中国猪肉供应不足，存在约 250 万吨的需求缺口。“我们可以利用中德直达货运班列的物流优势”，阿里查诺夫称。加里宁格勒地区是俄罗斯唯一一个可以向这条铁路的集装箱班列提供本地货品的地区，这无疑将开启全新的前景。通过这条铁路线，可将冷藏或冷冻的优质猪肉运送到中国市场，而利用最新技术货物的保存时间可长达 52 天，这也是优势所在。<sup>298</sup>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还曾在中国为库尔斯沙嘴做宣传，称“大自然给俄罗斯以慷慨馈赠，库尔斯沙嘴便是这些自然奇观之一”。这是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面对他会向中国游客推荐哪些俄罗斯景点的提问时普金的回答，塔斯社也对此进行了报道。2018 年库尔斯沙嘴入选俄罗斯 100 个最美的自然景观。<sup>299</sup>

加里宁格勒市 1997 年与中国（辽宁省）大连市，2011 年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分别缔结友好城市关系。

### **第十九节 苏联将军在东普鲁士和中国：中国人认知储备与东普鲁士、中国和俄罗斯回忆文化的一部分**

一段特殊的历史，至少间接地同东普鲁士和中国都有关联且在中国被接受，其主角是一批苏军将领，他们一方面以指挥员的身份参与了攻占东普鲁士的行动，另一方面在欧洲战事结束后又投入了解放中国东北的对日作战。<sup>300</sup>有中文文献提到，苏联红军无论在东普鲁士，还是在中国东北和

---

<sup>298</sup> 《该地区可向中国出口猪肉》，载于《柯尼斯堡快讯》，2019 年 6 月，[www.koenigsberger-express.com/index.php?id\\_article=4241&kat=3](http://www.koenigsberger-express.com/index.php?id_article=4241&kat=3)（2019 年 6 月 5 日查阅）。

<sup>299</sup> 《普金在中国为库尔斯沙嘴做宣传》，载于《柯尼斯堡快讯》，2019 年 5 月，[http://www.koenigsberger-express.com/pdf/pdf.php?id\\_article=4232](http://www.koenigsberger-express.com/pdf/pdf.php?id_article=4232)（2019 年 6 月 5 日查阅）。

<sup>300</sup> 参见中国影像资料《二战苏军战斗故事之从东普鲁士到中国东北的苏军联络官勋章》，<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2733867/>（2019 年 6 月 29 日查阅）或《当苏联攻入东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灭亡在即》，<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9495168788458694&wfr=spider&for=pc>（2019 年 6 月 29 日查阅）。

其他国家都曾犯下罪行，<sup>301</sup>尽管苏联参与了将欧洲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争，也帮助中国东北摆脱日本的占领，但中国人民依然更多对东普鲁士平民的苦难和他们被驱逐的命运抱有同情，原因可能就在于此。这和部分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的行为给百姓带来负面体验是分不开的，在东北期间，苏军拆卸工业设施，抢劫银行，还存在大量掠夺和强奸行为，以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都曾正式向苏联提出抗议。<sup>302</sup>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东普鲁士和中国东北之间存在某些可以分享的记忆文化。

在攻克东普鲁士的战斗中功勋卓著，德国投降后又受命在中国东北对日作战的苏联将领之一是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元帅（1895-1977），1942至1945年任苏军总参谋长，后出任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1949-1953）。1945年2月他接掌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并于1945年4月9日攻占东普鲁士柯尼斯堡。德国投降后他出任在华苏军部队最高指挥官，并作为远东地区苏军总司令指挥了在中国东北满洲里（当时日本傀儡政权治下的满洲国领土）的“八月风暴”行动。

此外还有阿法纳西·帕夫兰季耶维奇·别洛博罗多夫上将（1903-1990），他是1945年4月9日“柯尼斯堡堡垒”的征服者。此战之后他被苏军统帅部任命为红旗第一集团军司令，隶属在华远东第一方面军，对日本关东军作战。1945年8月18日日本投降时，别洛博罗多夫要求日本将军

---

<sup>301</sup> 如《苏联战争罪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8%81%94%E6%88%98%E4%BA%89%E7%BD%AA%E8%A1%8C/291754>（2019年6月29日查阅）。

<sup>302</sup> 参见两部中国拍摄的关于苏军1945年在中国东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ksK8qGkZOE>，2019年6月29日查阅）和德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7G93rmp77o>，2019年6月29日查阅）所作所为的短片；亦见李建军：《苏军的性暴行与斯大林的态度》，

<http://www.21join.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5&id=1005>（2019年6月29日查阅）。西方相关资料见戴维·M·格兰茨：《八月风暴：苏联1945年在满洲里的战略进攻》，利文沃斯7号文献，利文沃斯战争研究所，1983年堪萨斯州出版，

[https://usacac.army.mil/cac2/cgsc/carl/download/csipubs/LP7\\_AugustStormTheSoviet1945StrategicOffensiveInManchuria.pdf](https://usacac.army.mil/cac2/cgsc/carl/download/csipubs/LP7_AugustStormTheSoviet1945StrategicOffensiveInManchuria.pdf)（2019年6月29日查阅）；同一作者：《八月风暴：苏联1945年在满洲里的战术作

战》，利文沃斯8号文献，利文沃斯战争研究所，1983年堪萨斯州出版，

[https://usacac.army.mil/cac2/cgsc/carl/download/csipubs/LP8\\_AugustStormSovietTacticalAndOperationalCombatInManchuria\\_1945.pdf](https://usacac.army.mil/cac2/cgsc/carl/download/csipubs/LP8_AugustStormSovietTacticalAndOperationalCombatInManchuria_1945.pdf)（2019年6月29日查阅）。

川越无条件投降，川越反驳说，在日语里没有与此概念相对应的词，这位苏联将领回应道，那苏联军队将用这个概念来丰富一下日本的语言。日本投降后，别洛博罗多夫受命在中国城市哈尔滨组建苏联卫戍部队，1947年任苏军驻中国（辽宁省）旅顺口集团军司令，<sup>303</sup>1955年卸任。<sup>304</sup>

伊万·伊里奇·柳德尼科夫上将（1902-1976）所辖部队负责陶拉格、皮尔卡伦和贡宾嫩地区的行动，参与了包围柯尼斯堡的作战计划。柯尼斯堡地区军事行动结束后，他的（第39）集团军被派往中国东北，为苏联进攻满洲里做准备。1945年8月，这支部队占领中国辽东半岛。战争结束后柳德尼科夫被任命为辽东半岛苏联驻军司令和旅顺港驻军司令。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元帅（1903-1972）曾任苏联第五集团军司令，其部队是东普鲁士战役的主力军。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后，他在中国东北指挥了与日本第三军团的战斗。1947年被任命为远东军区司令员。<sup>305</sup>

---

<sup>303</sup> 旅顺口，1950年以前称旅顺，为独立的市级行政区，今为中国东北（辽宁省）大连市的一个城区。1898年至1904年先为俄国，后1905年至1945年为日本的“租借地”，二战后至1955年又重归苏联管辖。西方国家长期将这座城市称为“亚瑟港”，此名称可追溯至英国军官威廉·C. 亚瑟，在英法联军向中国朝廷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期间，他负责镇守这座城市的港口。

<sup>304</sup> [https://de.wikipedia.org/wiki/Afanassi\\_Pawlantjewitsch\\_Beloborodow](https://de.wikipedia.org/wiki/Afanassi_Pawlantjewitsch_Beloborodow)（2019年4月22日查阅）：阿法纳西·帕夫兰季耶维奇·别洛博罗多夫。

<sup>305</sup> [https://de.wikipedia.org/wiki/Nikolai\\_Iwanowitsch\\_Krylow](https://de.wikipedia.org/wiki/Nikolai_Iwanowitsch_Krylow)（2019年6月28日查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

## 第九章 结语：作为集体记忆组成部分的记忆与接受文化

本书立足笔者的家族历史和职业背景，从记忆文化和文化的记忆的角度对东普鲁士与中国的关系史进行了一番梳理，试图增强对过往和当下那些“记忆形象”的记念，进而以这样的方式强化对东普鲁士的历史意识和集体记忆。它搭建起一座连通彼此认知的桥梁，让我们意识到，中国民众对东普鲁士的接受认知始终在这个国家的接受记忆里占据一席之地，这当然要归功于那些像康德、赫尔德和珂勒惠支一样的伟大思想家。中国人对他们的接受记忆，将对我们保留对东普鲁士的记忆，并从单纯接受同东普鲁士有关的个体人物，转而以关注这些“记忆形象”的整体性和差异性为重点大有裨益。这个愿望能否达成，最终还需要读者来评判。

## 关于作者：

托马斯·海贝勒博士（1947 年出生于美茵河畔的奥芬巴赫），中文名王海（译者注），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学院中国政治与社会专业资深教授，鲁尔都市孔子学院德方院长，国际公认的知名学者，埃本罗德东普鲁士地区联盟成员。为探寻先祖的足迹，2016 年他前往（奥地利萨尔茨堡州）蓬高，这是 1732 年其祖辈因宗教信仰被驱逐的地方；1992 年和 2017 年两次前往东普鲁士，后一次还造访了今属俄罗斯的东普鲁士北部地区，其中包括其外祖父的故乡，当年的埃本罗德县。此外，他还曾前往上海和当年德国的殖民地山东省青岛市，寻觅东普鲁士留下的痕迹。

更多关于托马斯·海贝勒的内容见其个人主页：

[https://www.uni-due.de/oapol/?page\\_id=625&lang=en](https://www.uni-due.de/oapol/?page_id=625&lang=en)

附录:



1918 年以前东普鲁士的城市和县郡

© 哈勒尔德·克雷尔 2019 年绘制



当年被分割给各国的东普鲁士城市和县郡（2019）

© 哈勒尔德·克雷尔 2019 年绘制